#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史纲

金羽






河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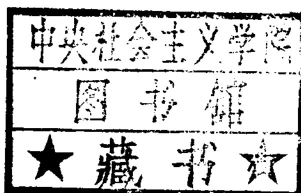
B17/3

513


*200104190*

#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史纲

金　羽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石家庄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过程的理论著作。书中结合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欧英、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科学和阶级斗争发展的历史状况，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革命实践活动为基本线索，通过剖析他们在这一时期所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重要文章著作，揭示了他们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萌芽逐渐发展直至公开问世的全过程，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历史必然性、规律性及其在哲学发展史中的划时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史纲**

金　羽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毫米1/32　7 3/8印张　180,000字　印数：1—7,500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2086·99　定价：0.67 元

# 前 言

本书是专门论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的。

在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尚是一门新兴的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问题的研究还非常不够，许多基本资料还没有全部翻译过来；有学术价值的专门著作和科学论文也较少；从事这个方面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专业人员也不多。但是，在国外，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却是一个“热门”。西方资产阶级各种哲学流派竭力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和他们以后的成熟著作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制造什么“两个马克思”的神话。他们故意抬高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把它们说成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把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成熟著作叫做“退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以此来歪曲、贬低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因此，加强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形成问题的研究，对于驳斥西方资产阶级各种哲学流派的歪曲和攻击，捍卫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十年动乱时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现代迷信，神化革命领袖，大肆鼓吹唯心主义天才论，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历史。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因此，加强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形成问题的研究，对于进一步肃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散布的唯心主义天才论的影响，建设一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部著作着重探讨和阐述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马克思主

义哲学和促使它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自然科学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它的理论来源之间的关系；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整个过程和重要特点；第四，马克思恩格斯参加社会实际斗争和理论研究工作对他们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第五，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有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六，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伟大意义。作者试图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和详细的论证，来阐明这些问题。但是，由于水平所限，这又仅是一次初步尝试，书中一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望请读者和专家不吝批评指正。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会过时，将永葆青春的活力，永远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明年3月14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作者愿以这部著作的出版，作为一个小小的礼物以志纪念。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经广泛地参阅了国内外关于这个题目的学术著作和科学论文，汲取了其中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出于本书体例的考虑，书中在采纳这些观点时，未加注明其出处，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作　者

1982年8月1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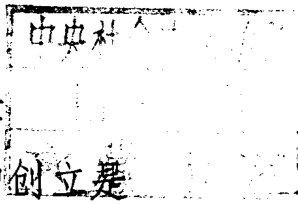
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社会历史条件…………（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自然科学基础…………（7）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理论来源………………（15）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活动和思想发展……………（23）
第一节　马克思的早期活动和思想发展…………………（25）
第二节　恩格斯的早期活动和思想发展…………………（36）
第三章　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50）
第一节　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50）
第二节　恩格斯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64）
第四章　马克思恩格斯彻底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72）
第一节　马克思彻底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72）
第二节　恩格斯彻底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85）
第三节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的影响……（91）

第五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雏形……………………………（101）
第一节 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时代的要求……（101）
第二节 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奠定了唯物辩证法的初步基础……………………………（104）
第三节 批判黑格尔唯心史观，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初步基础……………………………………（108）
第六章 《神圣家族》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唯物主义基础……………………………………………（121）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写作《神圣家族》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122）
第二节 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唯心主义，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些基本原理………（126）
第三节 《神圣家族》一书的意义……………………（144）
第七章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形成中的地位……………………………………………（150）
第一节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形成中的地位……………………………（152）
第二节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59）
第八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费尔巴哈和德国思辨哲学的唯心史观，全面制定和系统阐述唯物史观…………………………………………（171）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背景……………………………………（172）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批判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175）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制定和系统阐述唯物史观…………………………………………（183）
第四节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伟大意义………（190）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公诸于世………………（194）**
第一节　批判魏特林主义和德国真正社会主义，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195）
第二节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批判蒲鲁东主义，科学地表述新世界观……………………（199）
第三节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胜利………………………（208）
**第十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哲学领域中的伟大革命……………………………………………（220）**


中央社

# 第一章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创立的。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要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呢？他们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具备了哪些条件呢？为了弄清这些问题，就必须了解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情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情况；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情况以及当时哲学理论发展的一般情况。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社会历史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偶然的。和任何一种学说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发展的必然产物。毛泽东指出："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5页）这段话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形成是无产阶级日益觉醒的理论表现，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根源的。

十八世纪下半叶，由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和1789年开始的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使欧洲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世界市场已经建立起来了，封建关系迅速地破坏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突出出来了。以机器为主体的工厂制度的出现和扩展，给独立手工业者以沉重打击，大大加速了他们的破产，使他们纷纷加入了无产阶级的行列。机器耕种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发展，使许多小农变成了雇佣劳动者，从而壮大了城乡无产阶级队伍。整个社会阶级关系越来越简单化了，日益形成两大截然对立的社会集团：一方面是占有生产资料、剥削雇佣劳动者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则是一无所有的只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许多国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资产阶级业已在欧洲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等国）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造成了空前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当时这种发展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地步。例如，英国到十九世纪的三十——四十年代，工业就普遍资本主义化了，生产发展特别快。从1837——1847年这十年间，煤炭的开发量增加了47%，生铁的冶炼增加了67%，造船业增加了23%，蒸汽机的总能力从1840年的60万匹马力增加到1850年的125万匹马力，铁路的长度在1836年为251公里，到1848年就增加到了8203公里。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就已经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变成了“世界的工厂”。法国和比利时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先后发生了产业革命，机器工业大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从而引起了工农业生产的根本变化，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地向前发展。1830年，法国全国只有蒸汽机600多架，工业用煤为170万吨，到1847年增加到550多万吨，铁的开采量，1832年只有70万吨左右，到1847年增加到160多万吨。1830年全国铁路只有30多公里，到1847年增加到1500多公里左右。马克思恩格

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6页）

德国原来比英国和法国落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的政权还掌握在封建贵族手中，封建生产关系在国内仍然占据统治地位。这时德国尚未统一，正处于一种割据状态。1815年以后，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把原来360个左右的独立王国改为由38个大小封建王国组成的"德意志联邦"。每个王国都有自己的税卡、币制和度量衡制度。这种封建割据状态严重地阻碍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资本主义也逐渐发展起来了，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在的莱茵省。这个省在1794——1815年之间一直为法国军队所占领，在那里推行了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拿破仑帝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促使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地发展起来了。例如，1815年鲁尔的煤产量有250万担。同一时期，棉纺纱锭从10万纱锭增加到15万纱锭。公路从1818年的3200公里增加到1830年的4600公里。但是，同英国和法国相比，莱茵省的工业还是相当落后的。到1830年，该省还有12%的织布机是用人力开动的，80%用水力开动，只有6%使用蒸汽机，德国其他地方就不用说了。1834年德国建立了关税同盟。这是普鲁士为首的包括七、八个邦的统一市场。在农村，由于封建贵族和教会地产的出售，加速了两极分化，促进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法国销售市场的开放，进一步繁荣了德国和莱茵省的经济。资本主义比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造成了大量的社会生产力。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急剧地尖锐化起来。其明显的表现，就是开始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后每隔十年左右就要重复一次。三十年以后，经济危机就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现象。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很大局限性，它越来越不能容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变成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迅速明朗化、尖锐化起来。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已经成熟起来，走上了独立的政治舞台。

在资本主义初期，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带有分散的、自发的性质，而且其目的只限于改善经济状况。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资本主义工业在欧洲许多国家迅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成长和壮大。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更加深刻地暴露出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不断展开和深入，无产阶级日益提高，逐渐发展到自觉的、有组织的阶段。他们不仅提出了各种经济要求，而且还提出了政治要求；他们不仅反对个别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而且还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斗争形式也日益提高了，由捣毁机器和工厂，发展到组织工会，举行大规模的罢工，示威游行，以至武装起义。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已经由一个自在的阶级开始逐渐发展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欧洲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发生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重大斗争。这表明无产阶级已经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其中最著名的重大事件有：1831——1834年法国里昂的工人武装起义，1836——1848年英国宪章运动，以及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武装起义等。

在法国，1831——1834年，里昂丝织工人两次发动了武装起义。当时，里昂是法国最大的丝织工业的中心，丝织工人遭受工

厂主和包买商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劳动负担越来越沉重，大生产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工人的劳动负担。以前纺织工人看机器，一天要走45英里路，工资又十分低廉。1831年，工人们多次强烈要求增加工资。都被资本家无理拒绝。于是，工人们于1831年11月21日宣布罢工，举行游行示威。政府出动反动军警进行武装镇压。里昂丝织工人就进行了武装起义。他们在旗帜上写着："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经过三天激烈的战斗，终于击败了反动政府的军警，占领了里昂市政府，并且俘虏了当地的反动军政长官。武装起义的领导机构发表了告全市人民书，宣布成立普选的初级代表大会，组织公民保卫团。但是，这次工人武装起义还是被反动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了。1834年反动政府逮捕了工人领袖，颁布禁止工人集会、结社等反动法令。里昂工人又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工人们不但提出了改善生活的经济要求，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政治要求。里昂工人的这次武装起义得到了法国其他一些重要城市的响应，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由于反动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血腥镇压，经过几天血战，里昂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又遭到了失败。但是，法国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已经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马克思在评论里昂工人武装起义时指出："里昂的工人们以为自己追求的只是政治的目的，以为自己只是共和国的战士，可是事实上他们却是社会主义的战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6页）

在英国，1836——1848年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工人运动。这就是为实现"人民宪章"而斗争的宪章运动。宪章派要求给予全体劳动者以选举权。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应在议会里拥有许多自己的议员，通过这些议员就可以实现劳动者所必需的社会改革。这场运动从三十年代中期起到1848年为止，共经历了三次高潮，千百万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积极投入了这场争取自身权

利的斗争。由于当时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工人中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的存在，以及组织上的薄弱，运动最后失败了。但是，这次宪章运动表明，英国无产阶级已经独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从此，无产阶级从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对手。恩格斯对于宪章运动中出现的这样的无产阶级全国性政治组织评价很高，他认为，“这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97页）马克思在评论英国宪章运动时，曾经号召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要象英国的无产阶级那样组织起来，坚决同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作斗争。

在德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广泛开展。西里西亚当时是德国纺织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工人们深受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四十年代初，当地企业主为了同英国商人的商品竞争而压低工人工资，工人非常不满。1844年6月4日，西里西亚地区的纺织工人举行了德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武装起义。起义者不仅毁掉了机器和工厂，而且烧毁了帐簿和财产契据。这不仅打击了他们的明显的敌人——工业企业主，而且打击了他们的隐蔽的敌人——银行家。工人们在起义过程中，高唱革命歌曲，深刻地揭露和控诉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歌词说：“肆无忌惮地压榨横加在我们身上，其血腥和残暴不亚于教会的秘密法庭。”起义的工人们要求推翻这种资本主义制度。这次武装起义“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页）。经过三天激烈的战斗，起义虽然被反动政府军队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这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影响很大，意义十分深远。马克思在评述这次武装起义的重大意义时指出：“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西里

西亚起义的进程本身也同样具有这个优点。被毁掉的不仅是机器——这些工人的劲敌，而且还有帐簿和财产契据。”（同上书，第483页）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反对的不仅是普鲁士国王，而是整个资产阶级。这表明德国无产阶级已经独立地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

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和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这些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阶级斗争的重要事件表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已经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无产阶级已经团结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无产阶级已经由一个自在的阶级开始变为一个自为的阶级。

但是，当时的工人运动，由于没有革命政党的领导和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受到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先后都失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发展，迫切需要总结自己长期斗争的经验，迫切需要能够反映本阶级利益和要求的革命理论，认清自己受压迫和受剥削的根源，阐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任务，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指出正确的道路和方法。归根到底，就是迫切需要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自己的革命行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形成，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了。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自然科学基础

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总结和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和一定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相联系的。十九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一系列的新发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自然科学基础。

恩格斯指出："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2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同上书，第224页）随着社会生产、阶级斗争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唯物主义哲学经历了朴素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产生于对自然界朴素的直观的认识基础之上。当时，自然科学还处于萌芽状态，人们往往把物质的某种具体形态例如水、火、气等当作世界万物的本原和基础。这种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一切事物都是这些原初物质派生出来的，而它们又可以还原为这些原初物质。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泰利斯（约公元前624—547年）认为，水是一切事物的本原和基础。另一位著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30—470年）认为："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并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造成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由于"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5页），所以，人们虽然有了关于运动、联系和转化等朴素辩证法的思想，然而并未具体认识究竟是什么在运动、联系和转化。因此，仍然停留在原始的朴素的水平上。

唯物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它是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出现的。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它的工业生产，需要有探察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和自然力的活动方式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90页）自然科学的解放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开始的。在此之前，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奴仆。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科学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不是真正的科学。从十五世纪

开始了近代自然科学。伟大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年）提出的太阳中心说推翻了在天文学领域里统治了一千多年的地球中心说。这是天文学领域里一次伟大革命。恩格斯指出："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6页），引起了人类对宇宙认识的根本改变。

经过中世纪冬眠时期以后，到十五世纪下半叶，随着自然科学的出现，唯物主义才冲破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束缚并且在自然科学推动下逐渐发展起来，但是却具有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的特点。到了十七、十八世纪，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当时，适应新兴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航海业和机器工业迅速发展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尤其是力学的发展。牛顿力学体系的完成，是当时自然科学的最高成果，在自然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机械运动规律在各个科学部门中的应用，已经获得很大成功。几乎所有自然现象都用力学原理来解释。英国科学家牛顿说："或者自然中其他现象亦可如是由数学原理中推论出来罢！好多理由，使我发生一种推想，以为此项现象均与某项力有关。"（《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第3页）当时，对生命现象也用力学原理来解释。十七世纪初法国学者哈维，制定了血液循环的学说，认为心脏、静脉和动脉就是一个输送血液的机械系统。以后，法国著名哲学家笛卡儿在《动物的运动》一书中，把动物看成是一架按照力学原则构成的机器。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利（1709—1751年）甚至把人看作一架机器。他曾经写过一本名叫《人是机器》的书，在这本书中，他说："我完全没有弄错，人的身体是一架钟表，不过这是一架巨大的极精细的极其巧妙的钟表。"甚至连人的体温也被说成是血液在血管中流动摩擦而发生的。同时，自然科学当时还处在搜集材料阶段，人们把自然界的对象分割开来，一个一个地孤立地研究它们在纯粹形态中的自身。自然科学的这种状况，反映在哲学上，就

不能不具有形而上学和机械论的性质。于是，关于时间、空间、物质、运动的绝对观念，关于孤立物质在没有外力推动时绝对静止的观点，关于因果关系机械决定论的观点等等，就成为一种科学法则，形成了一个关于自然界绝对不变的机械自然观。

形而上学自然观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4页）在形而上学看来，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它们不但过去如此，现在如此，而且将来还是如此。这种自然观在本质上是保守的、反动的。按照这种观点去解释自然界中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时，就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比如说，既然自然界的一切从来都是如此，那么地球围绕太阳的旋转运动是怎么形成的呢？地球上无限多样的动植物种类是从哪里来的？人类又是怎样产生的？形而上学对这些问题是无法解答的。只好归之于超自然的原因。牛顿以神的“第一推动力”来说明地球的最初运动；林耐则用造物主的安排来解释。形而上学就是这样把自然科学引向了荒唐的宗教唯心主义。

十八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生产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科学的飞跃进步。自然科学中的许多新发现有力地冲击着形而上学的自然观。

十八世纪下半叶，康德—拉普拉斯提出的宇宙起源于原始星云的假说，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第一个缺口。它提出太阳系是由星云物质在斥力和引力的相互作用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康德—拉普拉斯假说使“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6页）。说明了行星围绕太阳运行是自然界历史发展的结果，从而否定了牛顿的神的“第一推动力”。十八世纪末叶，化学方面完成的革命，抛弃了形而上学的燃素说。蒸汽机的发明，在实践上提出了热和机械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从而为形而上学燃素

说的破灭作了准备。十九世纪初在地质学中关于地质发展变化的思想建立了起来。由于采矿业的发展，地质学得到了日益增多的材料，发现了相继形成的重叠起来的地层。在不同地层中，各种生物化石具有不同的特征。这表明了，“不仅整个地球，而且地球今天的表面以及生活于其上的植物和动物，也都有时间上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7页）1830年英国地质学家赖尔发表了《地质学原理》一书，他以大量的资料，用自然界本身起作用的力量去解释地球的历史。“第一次把理性带进地质学中”，“以地球的缓慢的变化这样一种渐进作用，代替了由于造物主的一时兴发所引起的突然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7—368页）与此同时，古生物学、胚胎学、比较解剖学、植物学、动物生理学和有机化学都有了发展。在自然科学中到处产生着反映自然界辩证法新观点的萌芽。

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起，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航海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自然科学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自然科学一系列的新发现，引起了一个反对形而上学自然观的革命。

在化学领域里，十九世纪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揭示了过去认为是各自孤立的化学元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1828年德国化学家维勒第一次用无机物（氰酸铵）人工合成了简单有机物尿素，打破了无机物和有机物之间的绝对界限，从而说明了有机界和无机界的统一性。

在物理学方面，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作为一个精确的有大量事实证实的严格定律肯定了下来。人类在生活实践中早已懂得了摩擦取火这一机械运动转化为热运动的现象，并用它来为自己服务。但是，对它的本质却不认识。直到十八世纪发明了蒸汽机以后，才开始认识能量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和工业的成就，充分反映了自然界各种物质运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事实，体现了自然界物质运

动的统一性。热能转化、光电转化、电磁与光的统一性，电解与电离，化学电源（电池），化学效应，元素光谱等等。总之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和化学运动等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转化，都实现了。1842年，德国科学家迈尔和英国科学家焦耳，以及丹麦科学家格尔丁通过对实验过程的分析，提出了一切机械运动都能借摩擦转化为热的思想。1845年，迈尔对运动形式的联系和转化作了进一步表述，指出任何一种运动形式都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转变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以普遍性的形式表述了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联系和转化的思想。1847年，焦耳比较精确地测定了热功当量，即427公斤米的功相当于一千卡热。这样就使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最后在实验上得到了证明。1847年赫尔姆霍兹提出了力学中的位能与势能的概念，并且用数学公式表述了各种力的守恒。格罗夫1864年发表了“物理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文，整理了这些成果。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世界的多样性的统一和物质运动不灭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一。恩格斯指出，由于这一定律的发现，“自然界中整个运动的统一，现在已经不再是哲学的论断，而是自然科学的事实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7页）

在生物学方面，1838年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发表了关于植物构造的学说。他证明，植物形态的最基本单位是细胞。1839年德国动物学家施旺证明了细胞构造是一切动物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同时，他概括了施莱登的成就，论证了动植物的统一，建立了细胞学说，从而在动植物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证明它们都是由细胞逐步分化而来的。于是“机体产生、成长和构造的秘密被揭开了；从前不可理解的奇迹，现在已经表现为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依据一切多细胞的机体本质上所共同的规律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7页）。马克思恩格斯对细胞学说评价很高，把它列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作为马

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重要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一。

十八世纪以来，德国歌德、沃尔弗和法国拉马克都先后提出了不同形式的生物进化学说。德国文学家歌德认为，所有不同形态的植物都来源于一种原始植物，所有植物不同的器官都来源于一种最原始的器官即叶子，并且由“一切哺乳动物都有鄂间骨”出发，猜测到“人也有鄂间骨”。这个发现证明了人和动物之间是有历史联系的，根本不存在一条不可越过的鸿沟。德国自然科学家沃尔弗，1759年发表学位论文《发育论》，驳斥了预成论，科学地论证了渐成论。十九世纪初，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1744—1829年）提出了关于生物界发展的学说。他指出，动植物的物种不是永恒不变的，而且不断进化的，并且预言动植物的物种是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但是，拉马克还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关于生物进化的科学理论。1859年，英国自然科学家达尔文（1809—1882年）发表了重要著作《物种起源》，第一次提出了科学的生物进化论。他用丰富的自然科学材料和事实，提出了生物界发展的辩证过程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达尔文首先肯定了生物变异的普遍性，认为在自然界中，没有两个生物体完全相同，这些差别就叫做“变异”。变异的基本原因是生活条件的改变。如果引起变异的生活条件一连保持几代，则变异可以在后代巩固和加强起来，这就是“遗传”。自然界中因为自然条件的变化不能适应新条件的被淘汰，能适应的则保存下来，这就是“自然选择”。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是通过“生存斗争”实现的，生物为了生存就必须跟周围环境进行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只有获得食物，才能生存，这样就出现了生物进化。达尔文学说说明了整个生物界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统一过程，揭露了各种有机体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了整个有机界是一个统一的有机的整体。这不仅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世界统一性原理和物质世界发展规律性原理作了科学上的论证，而且还给那种认为生物的物种是

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那种认为生物物种是上帝创造的宗教唯心主义观点以致命的打击。虽然，达尔文学说中还包含有马尔萨斯的理论和生物发展过程没有质的飞跃的形而上学成分。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31页）。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说过，达尔文学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同上书，第574页）。

过去，学术界曾经流行一种观点，把达尔文进化论和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一起列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重要自然科学基础，这是不确切的。因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于1859年，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于1848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早了十多年。因此，严格说来，达尔文进化论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自然科学基础。但是，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基础。因为达尔文学说一经产生，便立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生物进化论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十八世纪德国的歌德和沃尔弗，十九世纪德国的奥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法国的拉马克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达尔文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显然接受过这种正在形成中的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因此，在这里，我们也不能不提到生物进化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的影响。

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自然科学一系列新发现，推翻了旧的形而上学自然观，揭示了自然界一切现象之间的辩证联系，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植物到动物，从低级运动形态到高级运动形态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证明了自然界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按照客观规律永恒运动的。有了这些新发现，“自然界的主要过程就得到了说明，就归结到自然的原因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27页）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奠定了坚

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理论来源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6页）同样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的，是批判地继承了人类的优秀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并加以发展而创立起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直接思想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即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黑格尔（1776—1831年）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他是杰出的辩证法家。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但是，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包含有合理的内核，即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3页）列宁指出：“黑格尔提出两个基本的要求：（1）《联系的必然性》和（2）《差别的内在的发生》。非常重要！！据我看来，这就是下面的意思：1、某个现象领域的一切方面、力量、趋向等等的必然联系、客观联系；2、‘差别的内在的发生’，是差别、两极性的进展和斗争的内部客观逻辑。”（《列宁全集》第38卷，第95—96页）恩格斯和列宁这两段话极为简要地概括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具体说来，有如下四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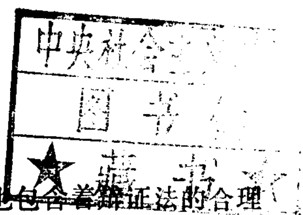
第一，关于内在联系和转化的思想。黑格尔认为，逻辑阶段、自然阶段（这里指隐藏在自然界背后的绝对精神）、精神阶

段的各种现象，没有彼此孤立、互不依赖的，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黑格尔在阐述他的哲学体系的各个部分、各个范畴时总是把它们作为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经常变化的东西来考察，和孤立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对立起来。

第二，关于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源泉的思想。黑格尔非常重视研究矛盾规律。在马克思主义以前，黑格尔是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深刻地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源泉的哲学家。然而，黑格尔所说的矛盾，并不是客观世界的事物内部固有的矛盾，而是“绝对观念”自我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他把矛盾引进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目的是为“绝对观念”提供内在发展的根据，反对机械唯物论，巩固唯心主义阵地。

第三，关于量变质变规律的思想。黑格尔表述了量变质变规律。他说：“存在的变化从来都不仅是从一个量转化为另一个量，而且是从质转化为量和从量转化为质的，是他物的生成，即渐进过程的中断以及与先前的存在有质的不同的他物。”（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第128页）他列举了许多事例来证明量变质变规律。例如，水的温度，它的量变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变成水蒸气；轻率行为越过限度就会犯罪。但是，他对量变质变规律的论证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他公开说，“质的差别就是概念的差别，量的差别则是概念的差别的外部存在。”因此，从根本说来，他是用量变质变规律来论证“绝对观念”自身范畴、概念的发展。就是谈到一些自然现象也是作为“绝对观念”发展变化的外部表现。

第四，关于“否定的否定”规律的思想。黑格尔把“绝对观念”的自我发展过程，归结为一系列的三段式——“正题”、“反题”、“合题”。“正题”被“反题”所否定，“反题”被“合题”所否定（否定之否定）；“合题”达到了新的更高阶段，于是又成为“正题”，再被“反题”所否定，……如此不断继续下去。在黑格尔那里，否定之否定被当作拼凑唯心主义体系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藏书

的工具。但是，他对否定之否定的理解，也包含着辩证法的合理思想。黑格尔的否定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全面否定，不是完全抛弃，而是扬弃，是既有抛弃又有保留。抛弃消极的、不合理的；保留积极的、合理的。他认为，每个概念、范畴的内部，都包含着否定自身的因素，当它被否定时，就发展出新的概念、范畴。他说："促使概念自身向前推演的就是前述的否定，否定是概念本身所固有的，它构成真正辩证法的东西。"由于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不可能把它贯彻到底。

恩格斯指出，量变质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以其唯心主义的方式只当作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84页）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同时，汲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把辩证法从他的神秘的哲学体系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给辩证法以崭新的内容，从而创立了科学的唯物主义辩证法。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某些合理的因素，尤其是他的历史辩证法思想。黑格尔指出了探求历史最终动力的问题。虽然他在探求这一问题时乞求于绝对观念，找不到历史的现实基础，因而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历史动力问题，而且他还试图揭示历史的内在联系，历史发展中自由与必然、人的目的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可能与现实，以及人的劳动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等。这些合理的因素，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都有过有益的启示。

费尔巴哈（1804—1872年）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后一个伟大代表人物。费尔巴哈的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它的主要历史功绩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德国，经过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长期统治之后，费尔巴哈高举唯物主义的旗帜，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特别是尖锐地揭露了黑格尔哲学的神学本质以及它和宗教的关系，指出整个庞大的黑格尔哲学体系不过是“理性化和现代化的神学”。他推翻了唯心主义长期的统治，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

第二，费尔巴哈正确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他坚决批判了任何形式的“上帝创世说”，指出，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是物质的最高产物。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

第三，在批判康德不可知论基础上，费尔巴哈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他认为，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意识是人脑的属性，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他恢复了英法唯物主义感觉论的哲学路线，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基础和出发点，公开宣布自己的哲学是“感性哲学”，从而有力地打击了由于“抽象思维批判”所造成的夸大理性、贬低感性的唯心主义路线。

以上所述就是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它对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转变到唯物主义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也起过积极作用。这一点过去注意得不够，甚至被忽视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它是唯物主义的不确切表述，另一方面，它是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发展的顶峰，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唯物主义的重大成就。它不仅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而且在反对宗教神学和思辨哲学斗争中，代替神的本质，重新确立了人在哲学中的地位。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这个传统，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过渡到现实的人，彻底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

但是，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时，没有注意黑

格尔唯心主义体系中含有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是把孩子（辩证法）连同污水（唯心主义）一起都从浴盆中泼掉了。因而费尔巴哈仍然是一个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尽管在许多问题上他比十七、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前进了一步，但是，他毕竟没有能够克服他的学说中固有的缺点：直观性、形而上学性和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在反对宗教和唯心主义斗争中恢复唯物主义传统作了很高评价，并且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同时在辩证法基础上研究唯物主义，把它推向前进，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局限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成自己的科学世界观时，还批判地吸取和改造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所包含的有价值的东西，即劳动价值论；批判地改造了十九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学说中有价值的东西，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这对于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起了重要作用。

英国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年）和大卫·李加图（1772—1823年）创立了劳动价值论。他们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商品所耗费的必要劳动量。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一历史贡献评价很高。恩格斯称它是“伟大的发现”，“划时代的发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35页）。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于私有制各种规律的探讨，他们提出的许多经济学范畴、概念，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发现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物质基础，从而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建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十九世纪初，在英法两国出现了昂利·圣西门（1760—1825年）、沙利·傅立叶（1771—1858年）和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这些学说是随着资本

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确立而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想，是早期未成熟的社会主义理论。它反映了当时西欧资本主义确立时期广大城乡无产者的要求和愿望，是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理论表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学说带有严重的缺陷，特别在历史观方面是唯心主义的。他们都没有揭示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把这个动力归结为理性，即归结为精神因素。但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未来社会的猜测等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非常宝贵的材料。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认为，社会是发展的，历史是不断进步的，社会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们还试图从生产发展的需求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猜测到了关于经济条件是政治制度的基础的思想。他们还提出把对人的统治变成对自然界的统治的思想。还有他们关于环境影响人的性格和智慧，关于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是阻碍社会改造的三大障碍的思想，关于废除雇佣劳动、消灭阶级对立、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以及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和各种改革措施都是极其深刻的思想。这些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形成，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带有启发性的重要见解。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阶级斗争和自然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水平，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不仅提出了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迫切必要性，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从事这一伟大事业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出生在德国。德国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故乡，是有其特殊原因的。这是由德国的具体情况和工人运动的特点决定的。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英国和法国已经进行了许多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而德国这些民主改革刚刚开始。但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它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要求。同时，它又非常软弱，不能形成一支对抗封建势力的强大力量。而且，德国资产阶级已经被英、法两国工人运动和本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所吓倒，非常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竭力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妥协。因此，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指望由资产阶级来发动和领导。

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还不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德国已有200万工人，其中产业工人就有80万人。他们遭受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和剥削，已经成为一支具有政治觉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同时，德国工人运动具有自己的特点。恩格斯指出，由于德国工人运动发展较慢，有英法等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可资借鉴，可以少犯错误。尤其重要的是，德国是“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辨证法传统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77页），德国无产阶级“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00页）德国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注意从理论上总结英法等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因而德国无产阶级完全有可能来发动和领导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无产阶级一旦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就有可能使资产阶级革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序幕。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从国际关系来讲，德国是欧洲两种经济体系（英法资本主义经济和俄国的封建主义经济）、两种政治制度（民主主义政治和专制主义政治）对立斗争的交错点。“当时革命运动中心移到德国了”（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7页）。当时英国工人运动对外联系不

够，而法国工人运动刚刚受到暴力镇压的严重摧残，德国工人运动已经站到了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最前列。所以，德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故乡。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德国，但它并不是专属德国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德国工人运动的产物，又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产物。它一开始就不是民族主义的产物，而是具有国际主义的性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指出，说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于德国是“笔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但是同时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77—378页注）阶级斗争的客观需要，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认识史上优秀成果的积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从这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国际的产物。

# 第 二 章

# 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活动和思想发展

列宁指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47页）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天生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者，也不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

由于社会环境、学校教育和家庭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社会活动的初期，在政治上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仇视封建专制制度，深切同情广大劳动人民，积极支持和参加了反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在哲学上，他们因受黑格尔的巨大影响，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运动，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与青年黑格尔派有分歧，但是，他们的世界观仍然属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范围。

马克思恩格斯都出生于德国莱茵省。这个省与法国接毗，在1794—1815年间，曾经为法国拿破仑军队所占领。它的一百多个小邦组成了四个区，在那里推行了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促使莱茵省几乎从黑暗落后的中世纪很快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封建特权和封建等级社会体制的消灭，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农村，由于封建贵族和教会地产的出售，加速了农村两极分化，促进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莱茵省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是当时德国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最大的省

份。在政治上，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自由资产阶级与反动统治阶级妥协的意向都已经表现出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暴露出来。莱茵省的这种状况，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活动和思想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的“青年德意志”政治——文学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要求，其代表人物如谷兹科夫、文巴尔克和蒙特等，他们从事文学、美学批评，也从事社会政治批评。因受海涅和白尔尼的影响，在他们的文艺作品和政治评论中，主张文学应成为按照自由民主精神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斗争武器。他们拿自由的法兰西同专制的德意志对比，主张信仰和出版自由，传播革命思想。这一运动对马克思恩格斯有深刻的影响。

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是青年德意志运动的继续，是以哲学形式出现的政治运动。它是在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产生的。黑格尔哲学本身存在着辩证方法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体系之间的矛盾，这是资产阶级向封建统治阶级妥协的反映。随着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增长，资产阶级中的激进派不再容忍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辩护；而封建统治阶级则害怕辩证法，害怕埋藏在保守体系中的革命因素。这样，黑格尔哲学就分化为两个派别。一派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体系，在政治上和哲学上都是保守的反动的，这就是老年黑格尔派，主要代表有兴里克斯、格尔勒等。另一派继承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方法。他们热烈要求改变德国现状，想从黑格尔哲学中做出革命的和无神论的结论。这就是青年黑格尔派。主要代表有鲍威尔（布鲁诺和埃德加尔）、施特劳斯、施蒂纳和卢格等。费尔巴哈在当时也属于这一派。青年黑格尔派虽然没有统一的纲领，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成份也很复杂，但总的说来，它是由向往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分子组成。他们强烈要求批判宗教，反对德国封

建专制统治。青年黑格尔派在当时的德国是一种社会思潮，是一个强大的运动，因而对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 第一节　马克思的早期活动和思想发展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1818年5月5日诞生于德国莱茵省特利尔市。它位于摩塞尔河畔，是摩塞尔地区行政中心。马克思出身在一个充满资产阶级启蒙精神和人本主义思想的家庭。他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名律师，原信犹太教，后改信新教。他后来当上了司法参事，并被推举为特利尔律师界的首脑。亨利希·马克思学识渊博，爱好古典文学和哲学，对十八世纪先进思想家卢梭、伏尔泰、莱布尼兹和莱辛的著作非常熟悉。他受法国启蒙运动影响，向往资产阶级民主精神，被普鲁士反动政府看作是“可疑分子”。因此，马克思从小受到资产阶级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

1830年10月，马克思进入特利尔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念书。这所中学虽然从1815年起就由普鲁士反动政府文化部直接领导，但是，由于校长威登巴赫是一个富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因此，这所学校在思想上没有屈从于普鲁士容克地主精神。马克思在这所学校里受到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和自由主义的影响。少年马克思对当时德国的社会状况非常愤恨。他渴望真理，向往自由。1835年9月，十七岁的马克思以绝大多数课程获得优异成绩而毕业。王室考试委员会在他的中学毕业证书上作了如下鉴定：“该生天资聪颖，在古代语言、德语和历史课程中表现出非常令人满意的勤勉，数学课程是令人满意的勤勉，在法语课程中是颇为勤勉”，因此，该委员会“衷心希望该生将由于得天独厚而获得应有的美好前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7年柏林

版，第一部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83—184页）。

马克思在中学毕业时所写的作文题目是：《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这篇文章整个来说，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文中闪耀着有价值的思想光辉。十七岁的马克思遣责那种仅仅依据自私自利的打算或基于物质利益来选择职业的做法。他说："对于那些思想高尚，致力于为全人类服务的人们，历史称之为最伟大的人物，对于曾使大多数人幸福的人，经验颂之为最幸福的人。"马克思表露了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崇高志向，"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任何沉重负担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得到的将不是可怜的、有限的和自私自利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亿万人，我们的事业虽然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发挥作用。当我们离开人世之后，高尚的人将在我们的骨灰上洒下热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补卷，第一分册，第594页）马克思还认为，要为人类献身，就不能把理想和现实、思想和行动割裂开来。他们指出："较多研究抽象真理，而不大深入生活本身的那些职业，对青年来说，是危险的。"（同上书，第594页）马克思还指出："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认为合适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能够对它们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规定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 3 页）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了各种社会关系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

1835年10月，马克思考入波恩大学法律系。他以巨大的热情从事学习，打算修九门课程，以致他父亲写信给他说："九门大学课程在我看来是有点过多了，我不希望你选修超过自己体力和精力所能承担的课程。当然，如果你对此不感到任何困难，倒也未尝不可。须知光阴短促，知识无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补卷，第一分册，第616页）当时，马克思确实感到没有什么困难。但是，由于大多数课程都不能使自己满意，就削减了听课

次数，并且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自学。1836年的暑假，马克思在家乡度过，并且同童年时代的女友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订了婚。

马克思并非一开始就喜欢黑格尔哲学。在波恩大学读书时，他讨厌黑格尔，比较倾向康德和费希特。1836年10月马克思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他本来攻读的是法律，但是，他研究最多的是历史和哲学。在老师爱德华·甘斯影响下，马克思开始转向黑格尔哲学。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浪潮中，马克思逐渐发现了黑格尔思想的真理性光辉。马克思在谈到当时大学学习情况时说，“……我必须学习法律，但还有一种压倒一切的要求，就是要用全力来为现代哲学而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补卷，第一分册，第4页）当时，马克思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试图用自己熟悉的思想方式建立一种新科学，开始，他构造了一种法律哲学体系。但是，很快就发现它是全盘错误的；接着，他又草拟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哲学新体系，结果同样是白费心机。就是这样的反反复复，几乎每周都在发明新学说，但在下周，他又把它撕毁。马克思在第一个学期里不知有多少不眠之夜，多少内心和外界的刺激，但结果是一无所成，反而使马克思的健康受到损害。1837年4月间他被送到柏林郊区斯特劳斯去休养。在那里，马克思“从瘦弱变为强壮”。他从失败的教训中认清了前进的道路，开始从幻想到深入研究古典哲学，从个人研究到参加火热的思想大论战。他勤奋地研究黑格尔及其弟子的著作，并结识“博士俱乐部”成员。这个俱乐部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核心，是由几个大学讲师、文学家和中学教师组成的。主要成员有：鲍威尔（布鲁诺和埃德加尔），阿道夫·鲁滕堡，韦·科本，路德维希·布尔，卡尔·瑙威尔克和卡尔·阿尔特豪斯等人。1837年5—8月，马克思参加博士俱乐部活动，并且同布鲁诺、科本特别是鲁滕堡关系密切。他们热烈讨论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日益密切。马克思对自己转向黑格尔哲学非常重视。1837年11月10日

在他给他父亲的信中这样说："我已经越来越牢固地同现代世界哲学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并且说自己的这种转变是"标志新方向的界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补卷，第一分册，第10页。黑格尔哲学中最吸引马克思的东西是其中的辩证法思想。当时，马克思认为，研究法律、国家、自然哲学等等，"必须从发展方面细致研究客体本身，决不应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在地矛盾展开，并且在自身中发现自己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补卷，第一分册，第5页）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抛弃了用抽象的理念衡量现实的方法，而是采用了从"现实本身中寻找观念"的黑格尔的方法。这种方法是辩证的，但把探讨事物看成是发现事物理性的看法，仍然是唯心主义的。这说明，马克思同当时青年黑格尔派一样，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十分重视的。

马克思在柏林博士俱乐部十分活跃，他是俱乐部成员中年岁最小的一个，当时年仅廿二岁。但是，马克思的天才博学得到了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赞赏。1840年科本写了《伟大的弗里德里希及其反对者》一书赠给他。科本承认，马克思对他影响很大。布鲁诺·鲍威尔也称赞马克思，说他是一个思想的仓库，思想的创造者。赫斯对马克思评价也很高。称他是"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也许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他既有深思熟虑、冷静、严肃的态度又有最敏锐的机智。……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为一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末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莫泽斯·赫斯致倍尔托特·奥文尔巴赫的信》（1841年9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莱茵河畔法兰克福（柏林）1927年德文版，第一部分，第二分册，第261页）但是，马克思不是纯粹的青年黑格尔派，他与青年黑格尔派一开始就存有分歧。在政治上，青年黑格尔派是资产阶级自由派，是反对彻底改变现存德国封建专制制度，主张按照资

产阶级利益进行改革的自由主义者；而马克思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主张彻底推翻现有德国封建专制制度，反对改良主义。在哲学上，青年黑格尔派中多数人在自我意识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倒退到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而马克思则吸收了黑格尔关于应有和现有、人和世界、批判和实践的辩证统一的思想。

1841年1月，马克思在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周刊《雅典娜神殿，文学、科学和艺术》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诗作《狂暴之歌》。这是马克思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几个月之后，恩格斯也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旅游随笔《伦巴第漫游记》。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同一个刊物上。但那时他们还互不认识。

从1839年开始，马克思集中地研究了古希腊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和怀疑论三个学派，写了七个笔记和摘录本。这些材料九十多年以后才以《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哲学史笔记》为题公开发表。在这些笔记中，马克思揭示宗教和哲学是势不两立的，并且认为，哲学是能够影响世界的一股积极力量。他说："正象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一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之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195页）1841年3月，马克思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为题目，写成了大学毕业论文。由于当时为反动势力服务的御用思想意识已经充满了整个柏林大学，并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马克思认为，把自己的毕业论文呈给柏林大学进行答辩，有损于自己的荣誉，就把这篇论文寄给耶拿大学哲学系。主持鉴定工作的瓦赫曼教授非常赞赏马克思的科学论文，不久，马克思就收到了耶拿大学哲学系授予他的博士证书。

当时，马克思之所以对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和怀疑主

义三个学派感兴趣，乃是受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青年黑格尔派将这三个学派当作自我意识哲学的最初形式和古代繁荣运动的典型形式，从这里他们找到了个性自由和自我意识等与他们相近似的思想。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把人的活动了解为精神活动，并且强调在世界发展中，精神是决定的力量。认为必须通过理性批判来改变不合理的现实生活，即"非哲学化的世界"，使世界变成理性世界，也就是使"世界哲学化"。马克思还认为，"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当时马克思所表明的哲学信念表明，当时，他"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页）。但是，博士论文的题目证明了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兴趣。它表明，马克思不仅已经同黑格尔哲学存在分歧，而且也开始越过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黑格尔对古希腊唯物主义者是相当蔑视的，而马克思则对伊壁鸠鲁十分推崇。他揭示了伊壁鸠鲁哲学体系的辩证因素，尤其是他认为伊壁鸠鲁关于原子自动偏斜学说是自我运动的辩证的原则的表现。他把偏斜原则解释为能动性、活动性的原则。马克思批判了那种把伊壁鸠鲁哲学说成是对德谟克利特哲学庸俗化的传统说法。他指出，伊壁鸠鲁是古代伟大的启蒙学者和无神论者，伊壁鸠鲁哲学丰富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学说。马克思非常重视伊壁鸠鲁学说中关于自由的思想，他指出，伊壁鸠鲁生活的年代没有民主和自由，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是论证自由和民主的。马克思不同意布鲁诺·鲍威尔从自我意识出发，论证客观世界的存在，把客观世界的历史进程归结为"天才人物"自我意识的发展的观点。从黑格尔的客观精神出发，马克思对德谟克利特的决定论持批判态度，倾向于伊壁鸠鲁哲学。但是又认为，自由不能脱离环境而存在，自我意识和环境应联系在一起，自由是在人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也包括了对青年黑格尔派绝对自由观点的批判。他认为，重要的是参加实际斗争

来改变现实，而青年黑格尔派从自我意识出发，认为单靠理性批判就可以改变世界。马克思认为，在哲学改造世界的同时，世界也正在改造，即“世界的哲学化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马克思：《博士论文》1961年人民出版社版序，第2页）；世界的合理发展只有通过精神和现实的结合才能实现。这说明，马克思在思维和存在、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理解，虽然基本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第一次把二者之间的关系理解为相互制约的、相互作用的。这种辩证观点不仅超越了黑格尔，也超越了其他青年黑格尔派分子。

在这篇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在批判辩证法的思辨性，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矛盾斗争问题，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方面，也都超过了黑格尔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分子。

通过研究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马克思从原子论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抽象原则的否定。马克思指出，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了这种方法的肤浅。它以某种抽象原则为出发点，但又不承认这种原则在高级形式中的否定。这一点正好与黑格尔的方法相抵触。因为抽象的原则要求辩证的自我否定，要求发展，要求由抽象上升到具体。伊壁鸠鲁不懂得这种辩证法，他把原子论这种抽象原则简单地推广到各个领域，而不是将其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虽然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但他对抽象的辩证否定的理解是很深刻的，并意识到这种思想是和思辨哲学相对立的。因为思辨哲学唯心主义作为出发点的一些理论原理是没有证据的想象和猜测，虽然费希特和黑格尔都意识到哲学原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重要性。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描述的“绝对观念”不只是第一个概念，也是最后一个概念。绝对观念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自身的全部丰富内容。但是由于其辩证法的思辨性质，到最后绝对观念只是认识到自身，比开始并未增加丝毫的新内容，因而也谈不上真正的发展。

如果客观事物经过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最后比最初一定丰富得多。在这里，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间接批判是非常深刻的。

马克思非常具体地分析了黑格尔哲学的两个方面：一是使对立面调和中立化；一是矛盾否定。马克思感兴趣的是后一方面。他写道："辩证法有内在的普遍的光，充满热情的爱情眼光，没有被肉体的物质的分裂所压抑的内在的灵魂、精神的隐蔽处所"，辩证法是湍急的洪流，它把无数的和有限的事物所击破，把独立的形式推翻，把一切都沉没于一个永恒的大海中。"（《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03页）这段话强调了辩证法反映的是内在的矛盾和规律，突出了精神、无限、否定和批判，说明马克思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抓住了辩证法矛盾否定的本质特征。马克思还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否认矛盾害怕斗争的形而上学观点。马克思认为，自我意识所产生的矛盾，它与人的日常生活发生的冲突，迟早要达到矛盾的尖锐，最后通过泰坦式的斗争才能解决。这种矛盾不断产生、发展和解决的思想无疑冲破了形而上学和庸俗进化论的框框。他认为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解决矛盾，才能给人带来幸福。但是，有些青年黑格尔派分子鼓吹渐进转化的范畴，这种庸俗进化论的要害就是害怕斗争，否认质的差别，害怕导致飞跃和革命。马克思用形象的比喻热情地歌颂了革命的辩证法，高度评价了它的革命先导作用。他指出，普通的竖琴在任何人手里都能发出声音；风神的竖琴却只有当风暴敲击它的琴弦时才发出声音。面临这场风暴不需要惊慌失措，它是跟着伟大的世界性的哲学来到的。

马克思还分析了必然性和偶然性、本质和现象等范畴。他首先批判了德谟克利特对偶然性的错误看法。德谟克利特把偶然性看作一般事物的统治者，认为发生的一切都是由于偶然性引起的。但是，他又把偶然性从人的经验里排除出来，认为这是不可

捉摸的东西。马克思指出，必然性与决定论是有联系的，偶然性与意志论是有联系的。必然性在有限的自然界是相对的必然性。它是从真实的可能性推演出来的；必然性以一系列条件、原因、根据等作为自己的成分，由一系列条件、原因、根据把两个事件联系起来，是决定论的。偶然性只是一种具有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抽象的可能性是可能性的否定，真实的可能性被限制在严格的限度里，两件事情之间无必然的联系。马克思指出，原子的概念中所包含的存在于本质、质料与形式之间的矛盾被设定在个别原子之中。因为个别原子有了质，原子就排斥其概念。同时，原子又在自己的结构里完成其概念，从有了质的原子的排斥里以及与排斥相联系的聚集里，就产生出现象世界。从本质世界到现象世界的过渡，原子概念中的矛盾达到尖锐化的程度，原子由自然界本质的形式降低到绝对质料无形式的基质了。从马克思这些晦涩难懂的话中，可以看到这是用矛盾发展实现说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的过渡的一个有益尝试。这就说明马克思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已经相当熟悉黑格尔辩证法，很多地方都冲破了其精神的框子，用自然现象来说明了。

在这篇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公开地表明了他的无神论观点。在序言中，他公开宣称，无神论就是自己的信仰。他反对迷信，反对企图把科学研究束缚在宗教信仰的框子里，使它服从宗教利益的一切反动的哲学。他强调指出，关于神的存在的一切所谓的证明，都只不过是空洞的同义反复。

在这篇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引用了埃斯库罗斯的诗中普罗米修斯对上帝的奴仆海尔梅斯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你知道很清楚，我不会用自己的痛苦去换取奴隶的服役；
我宁肯被缚住在岩石上，
也不愿作宙斯的忠实奴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90页）

马克思称颂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当时鲍威尔反对引用这首诗，他把现实斗争当作哲学以外的事情。而马克思表示要按照普罗米修斯精神走向人民中间，准备忍受一切折磨，为人类的解放锻造一种革命的思想武器。这里不仅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反对压迫、追求自由、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要求，而且也表明了他的哲学信念。他强调了先进哲学的社会作用。他认为，哲学的使命是解放被压迫的人类。因此，当时马克思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

马克思虽然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但是他并不无原则地赞同青年黑格尔派的主张。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国家在本性上是理性的，而人民是宗教的、非理性的，因而是与国家背道而驰的。因此，哲学应当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国家当局的改良上。而马克思认为，哲学必须从属于反对德国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哲学斗争、思想斗争必须同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在这两点上，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存在着原则分歧。

在柏林大学学习时，马克思养成了作读书笔记的习惯。从1840—1841年，马克思在柏林期间作了关于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休谟和康德学派的历史的摘记，这就是著名的柏林笔记。以后，马克思还作了波恩笔记（1842年春）、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年7月和8月）、巴黎笔记（1844年）、布鲁塞尔笔记（1845年2月）……马克思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凡读书就作笔记的良好习惯。他遗留下来的笔记，目前我们能够收集到的就有250多本，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社会主义运动史、语言学、宗教、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它使用的语言有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和希腊语等许多种语言。

1841年大学毕业以后，马克思原来希望在波恩大学之类的地方取得一个教授的职位，以便献身学术研究工作。但是，当时普鲁

士政府实行迫害进步教授的反动政策，1832年撤销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教授职务，1836年又不准费尔巴哈进大学讲课，1841年又剥夺布鲁诺·鲍威尔在波恩大学的讲学权。因而使马克思抛弃了这个念头。

马克思的社会政治活动是从《评普鲁士王国的书报检查令》开始的。1841年12月，德皇威廉四世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压制自由和进步思想，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表面上声称要放宽对新闻出版事业的限制。一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认为这是给予了批评自由，因而兴高采烈地欢迎这个书报检查令。1842年初，马克思写了题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第一篇政论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详细地分析了这一法令的真实内容和反动实质。他以无情的逻辑和辛辣的讽刺论证了普鲁士政府的假自由主义的放宽检查，实际上的结果是变本加厉地推行原来就极端专横的检查活动。他指出："虚伪自由主义的表现方式通常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的本质——当前的制度。这样就转变了表面看问题的公众的注意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页）马克思指出，反动的书报检查并没有放宽或改变，因此，必须加以彻底废除。这篇文章从世界观方面来说，仍然属于黑格尔唯心主义范畴。他用来反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武器是理性的崇拜。他认为，限制出版自由，限制写作风格等都是和理性相对立的，是对理性的压制和暴行。但是，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第一次把人民的思想方式看作是国家的思想方式，而把政府官吏的思想方式，看作是与人民对立的反国家的思想方式。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理性的真正崇拜者和体现者。在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无产阶级，但是，无疑是把无产阶级包括在体现国家理性的人民之中的。马克思这篇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文章，第一次公开站在反对反动封建势力的人民立场上。这篇文章鲜明地证实

马克思当时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他要做的是从根本上改变现存制度，而不是进行点点滴滴的改良。这表明，马克思越来越与大多数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了。

因此，马克思在被迫放弃了到大学谋取一个教授职位，献身于学术研究工作的计划之后，就转向报刊工作，直接献身于现实的斗争，从而进入了他开始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的时期。

## 第二节　恩格斯的早期活动和思想发展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于1820年11月28日诞生于德国莱茵省乌培河谷的巴门市一个商人兼工厂主的家庭里。恩格斯家族从十六世纪就定居在这里，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恩格斯的祖父担任过市政顾问官，并且是巴门合并教区的创始人之一。普鲁士的宗教观点和思想传统在这个家族中是根深蒂固的。恩格斯的母亲爱莉莎·弗兰契斯卡·莫利蒂亚·恩格斯出身于一个语言学家的家庭。她的父亲是荷兰人的后裔。爱莉莎·恩格斯富有幽默感，喜爱音乐和文学，特别推崇歌德及其作品。她很有教养，是儿女们的知心人和良母。恩格斯衷心热爱他的母亲，认为她是个“很好的人”。恩格斯的外祖父范·哈尔是哈姆理科中学校长，他辅导孩子们做作业，给他们讲古代神话故事传说。恩格斯的父亲喜爱音乐和戏剧，是巴门市艺术协会会员。他拉大提琴，吹低音笛，家里经常演奏音乐，举行室内音乐会，有时还上演一些小戏剧。为了经营商业，恩格斯的父亲经常外出旅行，不仅走遍全国，还常去外国，因而非常熟悉世界各地的情况。他自1825年以来一直担任学监和教会学校的校长。在1835年还担任革新教区教会负责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20]在家里，他对子女施加严峻的宗教教育。因此，恩格斯从小过的就是“彻头彻尾基督教的、普鲁士家庭里的沉闷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27卷，第21页）。恩格斯还在巴门市立学校念过书。这所学校的教师都是维护圣经教义的忠实卫道士。家庭和学校教育都要求他服从教义，而且把教义理解为没有矛盾的。宗教教育毒害着他幼小的心灵，象紧身衣一样禁锢着他的思想。相信神、相信上帝是全能的，能主宰一切，这是青年恩格斯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最初表现。

1834年10月，恩格斯进入爱北斐特理科中学学习。这所学校的前身是1592年创立的文科中学，是当时德国条件最好的中学之一。这所学校的任课教师有很多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们给十五岁的恩格斯的影响很大。在这里，恩格斯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有所察觉，对宗教信仰开始怀疑、动摇。当时，他虽然对上帝有厌恶和反感，但还是信仰宗教，并没有反对虔诚主义。他认为，理性和圣经可以调和起来，二者是不矛盾的。这个学校讲授的课程有希伯来语，拉丁语，希腊语，德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博物，音乐，绘画和哲学等等。恩格斯学习刻苦，成绩非常优秀。他的老师们认为，“该生能轻易地掌握课文全部内容的完整联系并明确地理解其思路，同时能熟练地把本学科语言的作品译为本国语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7年德文版，第一部分，第二卷，第480页）他对数学和物理没有花费多大精力，但是也掌握了“可靠的知识”，显示出他有“良好的理解力”，并且懂得“明确和清楚地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同上书，第481页）。他对“德意志民族文学史和德国古典著作的课程，显示出值得称赞的兴趣”，同时，他所写的作文含有“良好的、独立的思想”（同上书，第480页）。

德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对恩格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古希腊英雄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时一位最勇敢的英雄，又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的业绩吸引着他。但是，恩格斯最钦佩的是德国文学作品中的三个英雄形象齐格弗

利德（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中一位最勇敢的英雄，也是中古德国《尼贝龙根之歌》中的主要人物之一）、退尔（威廉·退尔是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瑞士民间传说中一位反对哈布斯堡王朝战争的英雄人物）和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他们具有坚强的性格，不屈不挠的追求知识和真理的毅力，勇敢的大无畏气概，以及随时准备为人类作出牺牲的精神。恩格斯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榜样。表示要象他们那样去规划自己的生活道路。

在1830年法国巴黎7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德国掀起了反封建的人民运动。1832年在汉巴赫召开的大会上，提出建立一个统一的自由的德国的要求。这个人民运动由于反动封建势力的镇压而失败了。德国境内掀起了一个广泛的政治迫害浪潮，很多人跑到法国去避难。1834年，其中有一些人在那里建立了“流亡者同盟”。在德国处于反动黑暗时期中，恩格斯毫不隐蔽自己的战斗激情。1837年哥丁根大学七位教授抗议汉诺威国王违反宪法，敢于在国王面前说出真理，捍卫自由和权利，这也激发了恩格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精神。当恩格斯看到希腊人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反抗土耳其人，很受鼓舞，就站在希腊人方面反对土耳其人。他写了一篇《海盗的故事》，反对那些把“小商小贩的业务”看得比争取自由还要重要的人。他认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就是参加那些“懂得珍视自由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补卷，第二分册，第511页）的行列，为反对压迫和侮辱而斗争。

当时乌培河谷劳动人民所处的非人的生活状况，给年轻的恩格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厂劳动剥夺了人们的一切力量和生活乐趣。实际生活和他在中学里听到的自由和尊严完全是两回事。他对那些假虔诚的富裕的工厂主感到愤慨，对劳苦的工人寄予深切的同情。为了帮助贫困的人，他经常把自己的微薄积蓄全部赠送给他们。

恩格斯很早就感到笼罩着他家庭的情绪是和广大人民群众的

情绪相对立的。他父亲对恩格斯的行为感到十分忧虑。

1837年9月，由于父亲的坚持，恩格斯未读完最后一学年就离开中学，到他父亲在巴门开设的一个商行当办事员。1838开7月中旬,父亲又把他送到不莱梅一家大贸易公司去实习经商。经商对恩格斯来说毫无引诱力。他把工作以外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全部用来进一步提高自己。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在春光明媚的早晨，坐在花园里，含着一支烟斗，让太阳烤着脊背，再也没有比在这样情况下读书更愉快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1版，第2卷，第507页）在不莱梅这个德国北部大商港可以找到大量的英国、荷兰、斯堪的那维亚及其他国家的报纸和书籍。这些报纸书籍帮助恩格斯弥补了过去所受教育的不足，扩大了他的视野,同时,在学习外语方面也因此获得了惊人的成就。他在给妹妹玛丽的信中夸耀地说："我写的是多种语言的信。因此,我现在就用英语——不，不，我还是用优美的意大利语，它象和风一样清新而舒畅，它的词汇就如最美丽的花园里盛开的百花；也用西班牙语，它活象林间的清风；也用葡萄牙语，它宛如满是芳草鲜花的海边的浪涛声；也用法语，它象小河一样发出淙淙的流水声；也用荷兰语，它如同烟斗里冒出的一缕浓烟，给人以舒适安逸的感觉。"（同上书，第505—506页）

在不莱梅，恩格斯的生活是丰富的。他喜欢唱歌和音乐。他从事击剑、骑马和游泳等活动。他还深入地研究反封建的作品，醉心于诗歌的创作。他在一首题为《德意志的七月时光》的诗中写道：

"洪流奔腾，波涛汹涌，
暴风雨袭来，狂热凶猛，
浪峰象人身耸立，
小舟上下颠簸颤动。
风暴从莱茵河畔呼啸而来，

把乌云聚集在天空；
飞砂扬尘，摧折橡树，
激荡澎湃，巨浪拔空。
我在飘摇的小舟中不由想到你们
——德意志的诸侯和国君，
你们高踞黄金宝座，
压在忍辱负重的人民头顶；
人民又抬着你们走过祖国大地，
胜利地把占领者驱逐出境。
这时你们竟厚颜无耻，
背弃了原来的诺言保证，
现在法兰西的暴风雨袭来了，
人民群众象波浪汹涌。
君主们的宝座摇摇欲坠，
象暴风雨中的孤舟，
权杖也颤抖在你们手中。
首先我把愤怒的目光
投向你恩斯特·奥古斯特（汉
诺威国王，1771—1851年）
你这暴君肆意破坏法律、拔扈专横，
听吧，人民怒目凝视，
利剑也难在鞘中安静。
告诉我，你坐在象我的小舟那样颠簸的黄金宝座上，
是否安然无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补卷，第二分册，第410—411页）

当时，爱好文艺的恩格斯受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影响是很深的。他在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说：“我应当成为一个

青年德意志分子，或者不如说，我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青年德意志分子。”（《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80页）恩格斯拥护青年德意志运动提出的民主主义政治主张而参加了这个运动。他还对格雷培说：“我夜里睡不着觉，我站在邮车上，望着普鲁士国徽时，我就感到自己浸沉在自由精神里。每当我翻阅一本什么杂志时，我都寻找自由事业进展情况。”（《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316页）青年德意志运动的指导思想是自由主义。青年德意志分子多数是软弱的。1835年以后，在普鲁士反动政府高压政策下抛弃了政治斗争。恩格斯随着自己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后来脱离了青年德意志运动，转向青年黑格尔派运动。

在不莱梅，恩格斯寄居在一个牧师家里。在这里，他对宗教产生了极大怀疑，并且同传统的信念和唯心主义世界观决裂。当时他作出结论说，圣经中有不可解决的矛盾。要使科学和宗教调和是不可能的。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每日几乎整天都在祈求真理。自从我开始怀疑以来，就一直是这样做的。但我仍然不能再信奉你们的那种信仰。……我到处探求真理，凡有希望找到真理的地方我都探索过了，但我仍不能把你们的真理承认为永恒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补卷，第一分册，第407页）批判虔诚主义，转向无神论，这是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1835年，青年黑格尔派大卫·施特劳斯写了《耶稣传》一书，他力图从黑格尔哲学中得出无神论的结论。他否定了福音书中的基督的存在，并证明福音书的内容是神话，是最初的基督教的团体捏造出来的。《耶稣传》对于恩格斯和宗教的彻底决裂起了巨大作用。1837年10月8日，恩格斯在给朋友格雷培的信中说，他已成了“狂热的施特劳斯的信徒”。“多亏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阳光大道。”（《马克思恩格斯早期

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334页）在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中，恩格斯重视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方法，特别是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的思想。他明确宣布：“我应该吸取这个宏伟体系的最本质的要素。”恩格斯反对那种把历史传统奉为神圣、顶礼膜拜的反动历史观。他指出：“我宁愿把历史发展比作随手划成的一个螺旋形，从一个显著的点开始，围绕自己这个点开始旋转，旋转的圆圈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迅速，甚至象慧星一样从一个星球穿过另一个星球，有时也回到旧道上，历史永远向无限发展，又有谁能预料它的终点呢？”（同上书，第334—335页）他认为，历史发展是螺旋形的，无止境的前进，绝对静止状态是没有的。这是以哲学形式反映了变革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要求。他在钻研黑格尔著作时，力图把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结合起来。黑格尔学说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局限在哲学和宗教问题中，脱离了生活和政治，使恩格斯不能满意。因此，他不能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黑格尔派”。

1839——1841年期间，恩格斯在革命民主主义者海涅和白尔尼影响下的激进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机关刊物《德意志电讯》杂志上发表了大约二十篇文章。这些文章对当时笼罩着德国，尤其是恩格斯故乡的令人窒息的气氛充满了仇恨，揭露了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制度，提出了通过民主道路统一德国的思想。

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文中，恩格斯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本质。他指出，封建专制就是“君主集一切权力（人间的和天上的）于己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38页）。君主的权力“凌驾于一切立法团体和任何其他民间团体之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89页）。君主颁布法令、任命官吏等均不受人民的监督。君主的统治地位在受到等级会议威胁时，他就可以解散议会，甚至可以调动军队实行武装镇压。恩格斯指出，君主专制是不得人心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

世继位时，摆出一副开明的姿态，因而他就成了当时欧洲最得人心的君主，但不久他便转向封建主义，甚至建立起警察密探的统治体制，于是他就变成了当时欧洲最不得人心的君主。恩格斯认为，封建专制制度的原则，就是君主“不承认任何普遍的、公民的、人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41页）。恩格斯指出，宗教和神学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所力图建立的国家，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当基督教要想使自己具有科学外貌的时候，它的形式就是神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36页）

《乌培河谷的来信》一文，表明了恩格斯的真正民主精神和他早就对工人阶级状况的注意。这篇文章是恩格斯从巴门到不莱梅不久，于1839年3月写成的。这篇鞭笞宗教虔诚主义、揭露资产阶级罪行的文章的发表，在巴门和爱北斐特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登载此文的《德意志电讯》杂志被抢购一空。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对宗教教会和封建专制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他描述了宗教上的神秘主义在乌培河谷怎样渗透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并且扼杀人民生活中一切活泼和健康的东西。他谴责虔诚主义的正统教派的反理性本质，当时他怀着特别仇恨和鄙视的心情描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写道：“我恨死了他：如果我不是那样看不起这个卑鄙的家伙的……我更要恨他……国王们所犯罪恶之多无过于1816—1830年这个时期的了，在这个时期统治的国王几乎个个都应当处死刑……”（《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79页）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对劳动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愤怒地控诉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惨无人道的剥削，“下层阶级，特别是乌培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光是爱北斐特一个地方，2500个学龄儿童就有1200人不能上学，而是在工厂里长大的——这只是便于厂主雇佣童工而不再拿双倍的钱

来雇佣被童工代替的成年工人。但是大腹便便的厂主们的良心是轻松愉快的，虔诚派教徒的灵魂还不致因为一个儿童如何衰弱而下地狱，假如这个灵魂每个礼拜日到教堂去上两次，那就更没有事了。因为我们知道，厂主中间对待工人最坏的是虔诚派教徒。他们千方百计地降低工人的工资。据说还是为了工人不致酗酒，但在选举传教士的时候，他们总是抢先收买自己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98—499页）工人们没有固定住所和工资收入，每天“天蒙蒙亮就从自己的栖身之所——干草棚、马厩等处爬出来，如果不是在粪堆或楼梯上度过整个夜晚的话”（同上书，第498页）。恩格斯还痛斥了剥削者用圣经与烧酒毒害劳动人民的罪恶行径。当时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者一提到工人中的种种神秘主义流毒和酗酒现象，都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愚昧无知的产物。而恩格斯却把这笔帐记在资产阶级身上，表现出鲜明的政治立场。他并且更明确地指出，工人酗酒是一种抗议，一种挑战，一种自发斗争的表现。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工人们遭受苦难的根源在于工厂主，并且指出了虔诚主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贫困之间的联系。他写道：“如果不是厂主这样胡作非为，如果神秘主义不是象现在这样流行并且不会更广泛地流行的话，这一切也不会达到这样骇人听闻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98页）恩格斯认为，剥削阶级尽管千方百计地用旧蒙昧主义毒害群众，但总可以相信，就是这个旧蒙昧主义的断崖也抵挡不住时代的巨流，沙面一定会被水流卷走，断崖一定会轰然倒塌。在《不莱梅港之游》一文中，恩格斯指出，人民谁也不向他们脱帽致敬，有人说他们的习惯粗野；有人则说他们没有教养。这些平民是一无所有的，但他们却是国王在他们国家里最不可缺少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恩格斯也象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把无产者与人民，平民，穷人，下层阶级视为一体。但是，他已经开始将无产阶级放在庸人向其脱帽致敬的上层阶级之上了。在《德国

状况》一文中，他描绘了十八世纪末叶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等级森严、腐败的情形，号召下层阶级为建立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平等的权利的国家而斗争。恩格斯认为，封建专制制度是不会自行灭亡的，单纯的批判也无济于事，只有通过人民的革命，才能推翻封建专制王朝。恩格斯在给朋友格雷培的信中就明确提出了必须用暴力来推翻专制制度及其统治者。他写道："用温和的方法在这里是得不到任何成果的，这些侏儒——连同奴颜婢膝的贵族们的横征暴虐，书报检查制度，等等——必须用刀剑来扫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补卷，第二分册，第412页）恩格斯期待人民吹响进攻暴君的号角、挥舞利剑，掀起革命的风暴，把封建君主的宝座动摇，把腐朽的宫殿烧毁。他满怀信心地说，尽管暴君们有地牢和刺刀，自由还是会胜利的。新生事物经过曲折的斗争一定会战胜旧事物。

在不莱梅经商时恩格斯所写的这些论文和书信，表明他在政治上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

1841年春，恩格斯回到了乌培河谷后，曾经作了一次经瑞士到伦巴第的旅行。同年9月，他离开了巴门到柏林去服兵役，加入了步兵——炮兵旅。在服兵役期间，他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亲身体验了普鲁士的军事"奥妙"，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炮手。同时他还认真地学习了军事知识，仔细地研究了军事技术，从而对军事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为他以后深入研究的对象，这就为他后来创立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指导无产阶级军事斗争准备了良好的基础。恩格斯在服兵役期间，马克思已经大学毕业，离开了柏林。

在柏林服兵役期间，恩格斯以旁听生资格利用业余时间到柏林大学听课，特别注意哲学的讲演。他和柏林"博士俱乐部"成员布鲁诺·鲍威尔兄弟、科本·布尔等人接触，积极参加青年黑格尔派活动。1842年6、7月间，恩格斯还和埃德加尔·鲍威尔

合写了一部描写青年黑格尔派与宗教势力论战的讽刺诗。当时，柏林大学是一个“知识分子大本营”，“思想斗争的战场”，教师中各种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相互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虽然黑格尔已经去世十多年，但是黑格尔主义在柏林大学仍然占据统治地位。普鲁士反动政府非常害怕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会掀起反基督教和基督教国家的斗争。为了抑制他们在青年中日益扩大的影响，向自由思想和反政府情绪进攻，特别是向青年黑格尔派进攻。普鲁士政府邀请了政治上完全转到封建专制制度立场的极端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到柏林大学任教，讲授“天启哲学”，企图利用他的神秘主义思想体系，彻底摧毁黑格尔哲学，阻止青年走上进步道路，以满足普鲁士国王的需要。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1775——1854年）是德国古典哲学著名代表之一。他出身于乡村牧师家庭。1790——1795年在图宾根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与黑格尔是同学。1798年以后，相继在耶拿大学、乌尔兹堡大学、爱尔兰根大学、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等学校担任哲学教授。谢林早期是德国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家，他曾经欢呼法国革命，批判封建制度，把资产阶级社会美化为人类理性的王国，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和愿望。他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同一哲学。他认为，无论是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们的主观意识统统由“绝对”中派生出来。这个派生一切、创造一切的“绝对”，是自我和非我的绝对的无差别的同一，它本身是一种不自觉的精神力量。他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不仅都要以“无差别的同一性”，即“绝对”为自己的本原，而且还要以它为自己的最后归宿，即在差别和矛盾产生以后，还要回到“无差别的同一性”即“绝对”中去。谢林的思想发展是一个由进步转向保守到反动的过程。1800年以后，逐渐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了。特别是晚年，他逐渐变成一个宗教神秘主义者。1841年，普鲁士国王邀请谢林到柏林大学主持哲学讲

座，并担任柏林科学院院士和普鲁士政府枢密顾问。企图利用他的“天启哲学”麻痹青年的革命情绪。谢林以哲学权威的架式，首先讲了一通近半个世纪来德国哲学的发展史。他大骂黑格尔、费尔巴哈、甘斯和施特劳斯是“魔鬼的奴仆”，又恬不知耻地把黑格尔的许多精辟见解宣布为他自己的发明。他把“天启哲学”当作自己的伟大发现。他认为，世界以上帝为本源，最终以上帝为归宿。“天启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证明上帝的存在。科学和理性要服从于宗教的信条。谢林的哲学讲授使大多数受过黑格尔哲学薰陶的人大失所望，连保守的老年黑格尔派也不同意谢林的宗教神秘主义。青年黑格尔派则因为谢林公开为基督教辩护，甚至把基督教神秘化，否认历史进步的合理性与进步性而公开与谢林论战。当时年仅22岁的恩格斯积极参加了柏林思想界的斗争，并且站在批判谢林的最前列。恩格斯在听了谢林的哲学讲演四个星期之后，于1841年12月，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的文章反驳谢林。在1842年春，又匿名发表了《谢林和启示——对绞杀自由的最新反动派的批判》和《谢林——基督教哲学家》两本小册子，分别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版，对谢林哲学思想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其中，《谢林和启示》一书对读者的影响特别大。

在这些论文和小册子中，恩格斯十分激烈地抨击了谢林为了个人目的肆意贬低黑格尔哲学的卑劣企图，捍卫了黑格尔体系中的进步的东西——“不安静的辩证法”。恩格斯指出，谢林从我这里“是绝对不能够得到心平气和的与冷静的对待的；因为我是在维护一个已经去世的人，并且怀有某种热情参加斗争的。而某种程度的热情对于一个战斗者是确实相称的，一个冷淡地拔剑出鞘的人，是不大会非常热情地对待他所从事战斗的事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补卷，第二分册，第167——168页）恩格斯驳斥了谢林违背科学，用神秘主义代替理性，为基督教和神的

三位一体，为基督的神话和启示所作的辩护，揭露了谢林企图把基督教宣布为绝对的和终极的真理，把哲学再度降低为“神学的婢女”（同上书，第231页），替封建专制制度做宣传的反动实质，把谢林称作“基督的哲学家”。

在批判谢林的斗争中，恩格斯强调了哲学斗争和现实斗争的结合。他发表的论文和著作具有战斗的、革命的和政治的性质，并且已经以批判的姿态对待黑格尔哲学。他指出了黑格尔哲学中进步的东西和保守的东西，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全部不彻底性和全部矛盾”。他说：“原理永远带有独立性和自由思想的痕迹，而结论（任何人都不否认这一点）往往是谨慎的、甚至是自由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397页）这是他和马克思著作有共同之点、同时也是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有明显的区别的地方。但是，这时恩格斯基本上仍然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立场上。他反对谢林的非理性主义、蒙昧主义，赞扬人类的自我意识的伟大力量，认为只有自我意识才是全能的，能够战胜一切阻挡它前进的敌人，胜利地为自己开辟道路。恩格斯还没有提出克服黑格尔哲学中的方法和体系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但是，恩格斯同青年黑格尔派也存在分歧。青年黑格尔派认为，仅仅通过批判就能够改变现存的封建统治秩序。他们重理论，轻实践，排斥实践。恩格斯则主张把理论批判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把哲学研究和当时反对德国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恩格斯把这场论战看作是一场新的政治革命的前奏。他热烈地欢呼：“让我们战斗和流血，让我们毫不畏惧地注视着敌人的愤怒的眼睛并战斗到最后一息吧！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旗帜怎样飘扬在山峰上吗？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们同志的刀剑在闪烁，钢盔在闪光吗？他们的队伍从四面八方开来，他们从山谷赶到我们这里，他们在歌声和号角声中走下山岗。伟大的决定性的

日子，各民族战斗的日子日益临近。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2卷，第239—240页）

恩格斯和柏林进步思想界的批判使谢林名声狼藉，他只得草率收场，提前结束他的哲学讲座。1842年3月18日晚上，也就是谢林结束讲课的当天，柏林大学进步学生在他的住地莱比锡大街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要求谢林滚出柏林。谢林不得已辞去了柏林大学哲学教授职务，狼狈地离开了柏林。

恩格斯的文章震动了国内外思想界。德国反动报刊，如柏林的《福音派教会报》、奥格斯堡的《总汇报》和《爱北斐特日报》等对此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们惊呼，从这些文章中看到了“最新的雅各宾派的明目张胆的目标”，是想在德国煽起一场革命。1842年11月，波兰进步刊物《科学展望》刊登了恩格斯写的《谢林与启示》一书的部分译文，把本书作者称为“当代杰出的哲学家”。1843年1月，彼得堡的《祖国记事》杂志介绍了《谢林和启示》一书的内容，并且刊登了译文片断。

# 第 三 章

# 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

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是他在《莱茵报》工作期间（1842年底至1843年春）开始的。在这期间，马克思接触到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促使他从研究思辨哲学转向实际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从而发现自己头脑中的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导致他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决裂，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马克思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列宁全集》第21卷，第59页）

在同一时期，恩格斯通过另外的途径和方式，也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

## 第一节 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

1841年秋，德国莱茵省经济中心——科伦市的具有反政府情绪的和青年黑格尔派密切联系的激进资产阶级为了从封建专制制

度那里争得更多的权利，准备集资出版《莱茵报》。马克思和荣克、赫斯等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参加了《莱茵报》的筹办工作。起初，由于马克思的推荐，鲁滕堡被聘任《莱茵报》的主编。鲁滕堡是布鲁诺·鲍威尔的亲戚、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当时由于激进观点而被政府解除了中学教师的职务。1842年1月1日，《莱茵报》（全名为《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正式出版。马克思成为该报固定撰稿人。他从1842年4月底开始为《莱茵报》积极撰稿，并且通过自己的撰稿、通讯和口头建议，对《莱茵报》编辑部领导人给予强烈的影响。1842年10月由于鲁滕堡不能胜任报纸的领导工作，刚刚24岁的马克思就被委任为《莱茵报》的主编，于是，马克思就移居科伦。

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在该报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政论文章，其中大部分是关于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的。这些争取出版自由、反对封建特权、反对整个封建专制制度的文章在整个德国发生了巨大影响。

莱茵省议会和德国其他省议会一样，是一个在封建地主操纵下的人数不多的反动议会。它是由贵族、市民和地主三个等级代表组成的，但主要是代表封建地主、贵族特权的等级机构。它有权讨论地方事务并接受政府监督。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于1842年5月23日至5月25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1842年开始公布会议记录。马克思针对莱茵省议会讨论的问题及其记录，著文给予有力的批判。公开发表的文章有两篇：《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关于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他发表的其他重要文章还有：《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和《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等。

在马克思主持下，《莱茵报》日益具有革命民主主义倾向，

迅速赢得了大量读者，报纸的销售量显著增加。1842年8月《莱茵报》订户有885人，11月长期订户就增加到1820人。过了8周之后，长期订户又增加到3400人。《莱茵报》成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机关报。这样，就引起了德国反动政府的无比恐惧和仇恨，它们对该报进行两三重的检查，经常扣发其稿件，迫使报纸几乎不能经常出版。例如，马克思写的关于莱茵省议会的第二篇论文，论述普鲁士政府与大主教的冲突的文章，因为揭露了国家的拥护者怎样站在教会的立场上，而教会的拥护者怎样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相互勾结就被书报检查官抽掉而未能公开发表。1843年3月17日，马克思因为遭受德国反动政府的迫害而辞去了主编职务。3月18日，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声明，指出，他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退出编辑部。不久，《莱茵报》也被反动政府查封。

## 一、马克思把哲学研究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站在反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前列

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非常注重理论和实践的联系，非常注重把哲学研究工作同当时反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现实斗争结合起来。1842年8月，马克思在给《莱茵报》出版人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的一封信中说："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3页）这表明，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结合的这一重要原则已经开始形成。1843年9月，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也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现在哲学已经变为

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凿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旋涡。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马克思驳斥了《科伦日报》反对在报纸上谈论哲学，企图把哲学与现实斗争隔绝开来的谬论。他指出，虽然从整个哲学发展来看，它不是通俗易懂的，但是它仍然充满了现实的内容。马克思写道：“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家的成长并不象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120页）从根本上说，哲学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是人民精神的最高表现，而不是世界之外的空想。所以，马克思充满信心地预言：“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的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根据这种精神，马克思积极投身政治斗争，站在批判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前列。当时，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人民群众没有出版自由。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封建专制制度时就首先对准书报检查制度。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的第一次重大斗争，就是参加关于出版自由问题的辩论。这次辩论是由于公布莱茵省议会记录的问题以及许多城市关于出版自由的请愿而展开的。马克思论述关于出版自由问题辩论情况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1842年5月，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揭露了普鲁士反动出版物的丑态，并且以反映人民的需要和渴望的英勇善战的出版物形象与之对比。在这篇

文章中，马克思热情地主张应有出版自由，并认为这是自由和民主运动的中心要求之一。马克思指出，反对出版自由的本质就是反人民。他强调自由是人类的精神特权，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页），是人民的不能剥夺的普遍权利，“出版物是历史人民精神的英雄喉舌和它的公开表露”（同上书，第50页）。马克思指出，只有自由的出版物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精神，只有出版自由了，人民才能实现其他自由。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同上书，第94页）“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同上书，第74页）“如果人民只让宫廷丑角享有思考和述说真理的权利，这样的人民就只能是依赖他人、不能独立的人民。”（同上书，第41页）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还运用辩证法思想，驳斥了那些检查制度拥护者用“人类不成熟”来反对出版自由的荒谬论据。他说：“如果人类不成熟成为反对出版自由的神秘论据，那么，无论如何，书报检查制度就是反对人类成熟的一种最现实的工具。”（同上书，第60页）这是因为“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人类的成熟同样是在不断的发展中逐渐完善的。所以借口人类不成熟，出版物不完善而不允许出版自由，实际上，就是“把人弄死以求摆脱这种不完善状态”（同上书，第60页）。

马克思还指出，反对出版自由也是违反国家和法的本性的。对出版自由的镇压，是普鲁士国家制度反对人民的暴政之一。反动的书报制度扼杀人民的自由，而把自由赋予政府机关、当权者、书报检查制度等等，这不是理性国家给他的人民颁布法律，而是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马克思说：“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它的反动政府自诩为国家的理性和道德的独占者，可是，“执政党的龌龊的良心却捏造了一套追究倾向的法律，报复

的法律，来惩罚思想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18页）因此，反对出版自由的根据不是理性国家的体现，而是完全同理性国家背道而驰的。

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详细地分析了那些在莱茵省议会中唯一拥有代表的政治集团、封建贵族、城市地产的业主和乡村地主究竟出于何种动机，才不同意莱茵省资产阶级提出通过一项出版法来代替书报检查制度的要求，并且拒绝公布省议会辩论情况。显然，马克思这篇文章比前一篇批判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前进了一步。在这里，马克思将出版自由问题同党派利益、阶级利益联系起来考虑。他提出，自由是人所固有的，但是不同等级，不同党派对自由的了解是不同的。自由有时表现为普遍形式，有时表现为等级特权。马克思指出，农民等级的代表，支持出版自由。他们认为，过分长期监督的桎梏使人难以忍受，人们渴求独立，检查制度过时了，在它还继续存在的地方，它被看作一种妨碍人们论述公开谈论事物的令人痛恨的羁绊。与此相反，诸侯等级，贵族等级以及城市等级代表则反对出版自由。马克思指出：“在形形色色反对出版自由的辩论人进行论战时，实际上进行论战的是他们的特殊等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1页），而不是个人。不同等级代表的议论和情绪都是他们各自所属等级的政治要求和道德面貌的反映。

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与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发生了冲突，最后导致了彻底的决裂。

1841年底，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以埃德加尔·鲍威尔和卡斯巴尔·施米特（后来他用了麦克斯·施蒂纳这一笔名）为首成立了一个所谓“自由人”的无神论团体。这些青年黑格尔派分子的特点是：在思想上，理论和实践相脱离，哲学研究和现实政治斗争、和人民群众相脱离。他们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向费

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政治上，这些人鼓吹否定一切，抽象地批判一切，提不出任何积极的纲领，他们空喊共产主义和无神论的极端激进的词句。他们的所作所为使柏林资产者惶恐不安，但是却不能真正威胁反动政府，只是败坏了民主运动的声望。这些青年黑格尔派分子还企图把《莱茵报》变成他们观点的传声筒，全部刊登他们的文章。马克思主张根据具体条件和材料，系统地阐述和发挥正确的理论。因此，拒绝采用这些人关于共产主义和无神论的肤浅的文章。1842年11月30日，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说："这班人已习惯于把《莱茵报》看成是自己的唯命是听的机关报，而我则决定不让他们再象以前那样空谈下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5页）马克思在给"自由人"成员之一爱德华·梅因的答复中，劝告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声明说，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即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但是，"自由人"不仅拒绝了马克思的忠告，还恶毒地攻击马克思有保守主义。因此，马克思不可避免地与他们彻底决裂，这是公开与青年黑格尔派划清界线的开始。

## 二、在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斗争中，马克思开始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是科学共产主义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根本区别之一。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空想共产主义者，由于受到他们所处的时代的限制和唯心主义

世界观的影响，他们虽然真诚地注视着社会下层的苦难，但是又找不到变革现实社会的力量，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认识不到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领导劳动人民去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伟大的阶级，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帝王、贵族、资产者以及“乐善好施”的达官贵人身上。因此，他们始终未能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是从认识无产阶级开始的。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写的文章都是为劳动人民着想、为被压迫群众辩护的。同时，马克思又密切注视着西欧各国的工人斗争，发现了一无所有的等级，即无产阶级。

1842年10月，莱茵省议会辩论林木盗窃法的时候，林木占有者代表蛮横地要求把贫苦农民捡枯枝算作盗窃林木，加以严厉惩处。莱茵省议会竟然把这种无理要求列入法律条文。为此，马克思发表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的文章，对林木占有者和莱茵省议会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坚决捍卫了贫苦农民的利益。马克思指出，该法案辩护人引证的地方“习惯法”是非法的。贫苦农民到森林中捡枯枝，早已成为当地农民的习惯权利，但是，普鲁士的林木盗窃法却把捡枯枝的农民当做盗窃犯惩罚，甚至比盗窃林木的惩罚还要厉害一些。马克思指出，“捡枯枝和盗窃林木是本质上不同的两回事。”“如果法律把那种未必能叫做违反森林条例的行为称为盗窃林木，那末法律就是撒谎，而穷人就会成为法定谎言的牺牲品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8、139页）马克思在驳斥林木占有者要求剥夺贫苦农民到森林里捡枯枝的习惯权利，把它们变成富人的独占权，并且搬出特权者的习惯权利为自己的无耻要求辩解时指出，贵族、特权者的习惯权利以贪得无厌的欲望为出发点，企图更多地压榨贫苦群众，“按其内容来说是反对普遍法律的形式的”，因此，他们的习惯权利也就是“习惯的不法行为”（《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1卷，第143页），不仅不应加以维护，而且还应给予应有的惩罚。马克思说：“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权利，但并不是限于某个地方的习惯权利。”（同上书，第142页）旗帜鲜明地为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作辩护。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了这些林木盗窃法所体现的是有财产有土地的那个阶级的意志，是为地主贵族掠夺贫苦农民服务的。他说：“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占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0页）公开地揭露了莱茵省议会维护封建地主贵族利益，压迫贫苦农民群众的反动本质。

1842年末，《莱茵报》收到不少关于摩塞尔地区农民状况的报告和控诉信。在那里，以种植葡萄酿酒为业的农民，由于连年歉收，酒价猛跌，再加上官僚的压迫和高利贷的盘剥，生活处境极为悲惨。因此，《莱茵报》发表了两篇摩塞尔记者根据实地调查所写的通讯。结果使得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怒气勃勃，他发布了两个训谕，诬蔑通讯是“恶意造谣中伤”。普鲁士反动政府认为，造成农民贫困状况的是农民自己。马克思深入调查研究，根据他收集的关于摩塞尔河地区农民悲惨处境的大量材料，以摩塞尔河记者的名字写了《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1843年1月15日，发表在《莱茵报》上）激烈地批评了德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文章以大量事实和有关文件资料证明农民处境的悲惨状况，揭露政府欺压农民的反动罪行，义正辞严地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辩护。

在文章中，马克思指出，普鲁士政府把农民贫困说成是农民自己造成的，这是歪曲事实真相。并指出，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和官方对待该地区存在的客观事实所采取的不同态度，表现出来的不同思想感情，也都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的客观本性决定的。马克思在分析摩塞尔地区农民贫困的原因时，揭露

了封建地主利用国家政权疯狂掠夺农民土地，迫得农民走投无路的罪恶行径。他说："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治理的贫困状况。国家某一地区的经常的贫困状况……给我们揭示出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9页）进一步揭露了普鲁士国家保护剥削者利益，对劳动人民进行掠夺的反动本质。

《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这篇文章同《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样，对于马克思世界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时候，都把这两篇文章并列在一起作为有力的证据。

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已经由在理论上探讨人民与国家理性的相互关系前进到坚决维护"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1—142页）。他不仅要求消灭等级特权和封建专制制度，而且提出关于建立人民政权的重要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842年10月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已经确认共产主义是当代最重要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与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

马克思由革命民主主义开始转向共产主义，是和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和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密切联系着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法工人运动出现新的高涨，1842年在伦敦召开了第二次宪章会议，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3万多人。随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共产主义问题日益成为引人注目的问题。当时，《莱茵报》对流行的共产主义思潮曾经加以注意，并且作了一定报导。反动的奥格斯堡《总汇报》就此攻击《莱茵报》是"向共产主义虚幻地卖弄风情和频送秋波的妇人"。马克思写了题为《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进行反驳。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当作"目前的重要问题"，

认为它“具有欧洲的意义”。他还指出，“现在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事实，即使没有斯特拉斯堡的演说，也不论奥格斯堡如何保持沉默，它仍旧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1页）马克思从现实斗争出发，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学说进行了批判，表示不赞同“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同上书，第133页），同时，揭露了反动的奥格斯堡《总汇报》“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对共产主义思想作出庸俗的解释，并且宣称，只有“在不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4页），才能对共产主义思想加以批判。

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在参加现实斗争中，清楚地看到了社会的不平等，看到了各个等级之间的对立，因而积极地为劳动群众的利益辩护，而且已经开始从劳动群众中区分出一无所有的等级，即无产阶级，并且对这个阶级的要求和社会作用进行了考察。马克思提出了他们的要求是“占领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财产”，他们的社会作用是有组织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这个发现推动了马克思去进一步研究这个阶级，试图科学地阐明这个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在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理称为“新的世界观”，并且认为，“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积极为备受屈辱的贫苦的劳动群众利益辩护，已经开始认识到一无所有的等级即无产阶级，并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而且日益从思想感情上同他们溶为一体，开始把立足点转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这表明马克思已经由革命民主主义开始转向共产主义。

## 三、在解决社会实际问题过程中，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发表的文章表明，他已经开始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这个转变是和他已经开始的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现实斗争促使马克思就迫切的社会实际问题发表意见。马克思在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时，开始从唯心主义逐渐转向唯物主义。他在1859年回顾当时的情况时写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8页）

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虽然还带有唯心主义性质，但是，通过直接参加现实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已经使马克思日益克服思辨唯心主义的影响。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早已指出了哲学和周围世界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经过激烈的社会现实斗争之后，马克思更加坚定了这一观点，并且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更加重视了客观现实在"相互作用"中的意义。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表现。哲学家的思想不是象泉水一样自己冒出来的，而是时代的产物。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已经指出，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和官方对该地区的客观事实所采取的不同态度，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都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的本性所决定的。他说："即使行政当局具有最善良的意图，它还是不可能摧毁这些本质关系的势力，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这种命运的势力。这些本质的关系就是管理机构内部的官僚

关系以及管理机构和被管理机构之间的官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9—230页）在这里，马克思虽然还没有把这些关系与物质生产联系起来，也没有从中揭示出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关系。但是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已经不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体现，而是指在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着的一切关系，即一切的社会存在。

在经济利益和人们的政治思想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试图用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来阐明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观点。他在关于出版自由问题的辩论中，已经清楚地指出了，政治态度和思想观点的对立，是由等级地位的对立所决定的，每个议员的发言都代表一定等级的利益。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以及为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生活同官方的论战中，马克思进一步把政治态度、思想观点的对立和不同社会集团、不同阶级在物质利益上的对立联系起来。因此，他得出结论：莱茵省议会的代表们对待出版自由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之所以存在意见分歧，是由于他们有不同的社会利益；但是作为地产拥有者，当问题涉及无限期地维持现有的社会状况时，他们又有着共同的利益，因而又可以把这些分歧置之不理。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思想经历的重要变化，在国家和法同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上表现得很突出。在黑格尔哲学中，国家是绝对观念、自由、理性的体现，是存在于地上的精神的理念，而普鲁士王国则是绝对观念、自由、理性的最高体现。对此，马克思在到《莱茵报》工作之前就已经依据黑格尔的发展学说，证明了普鲁士王国并非绝对理性的完满体现，它还有待于发展。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的社会政治斗争，已经使他逐渐地看到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原则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看到了经济利益、等级地位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开始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和法律观发生了怀疑。特别是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深入

研究，使马克思进一步理解了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在国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这个时期，马克思虽然对一切法律的实质还没有用唯物主义原则来解释。但是，他正确地指出了林木盗窃法为剥削阶级服务的阶级实质，使他接近了唯物主义。他已经发现，黑格尔的法哲学无法解释残酷镇压贫苦农民的林木盗窃法。他在为摩塞尔河地区贫苦农民所写的辩护文章中，指出了下面的重要结论："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象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6页）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对普鲁士王国的批判，是以黑格尔哲学前提引伸出来的理性国家来衡量普鲁士，并对它的残酷统治进行严厉抨击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马克思这时所用的依然是黑格尔的表述方式，然而国家中的法的关系的基础已不再是"绝对观念"或理性；马克思与黑格尔把一般国家唯心主义地绝对化，把一切国家描述成为理性的、自由和道德的体现，把普鲁士国家描述成为社会发展的顶峰等等，发生了分歧；马克思已经开始摆脱黑格尔那种认为历史的发展从属于精神发展的观点，提出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性问题。

在直接现实的政治斗争中，特别是马克思作为报纸的主编，要对大量的现实斗争问题作出迅速决择和公开表态。这对于促使马克思跳出单纯理论研究的圈子，深入到现实社会的经济问题的探讨中去，实现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莱茵报》时期的战斗生活，使马克思迈出了走向新世界观的决定性的一步。正如恩格斯后来回忆说的，他曾"不止一次地听到了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

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46页）。

## 第二节　恩格斯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恩格斯也开始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当马克思刚参加《莱茵报》工作的时候，恩格斯还在柏林服兵役。但是，这时恩格斯的基本观点和思想倾向和马克思已经趋向一致。他非常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非常注意把哲学研究和反对当时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现实斗争结合起来。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组织柏林“自由人”的成员，恩格斯非常热心地支持《莱茵报》的工作，并且把《莱茵报》的柏林通讯全部包了下来。恩格斯和马克思、鲍威尔等人都是《莱茵报》的经常撰稿人。从给《莱茵报》写稿的时间看，恩格斯比马克思要早一些。从1842年4月起，恩格斯就开始在《莱茵报》上发表文章，他写给《莱茵报》的政论性文章主要有：《北德意志和南德意志的自由主义》、《旁听生日记》和《普鲁士出版法批判》等。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论述了对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一些问题。如：南德的自由主义、反老年黑格尔派的斗争、历史法学派和普鲁士出版法等。这些文章是以柏林“自由人”的精神写的，没有什么独到见解。但是，由于恩格斯注重研究现实问题，对现实问题已经有了较多的直接经验和知识，他厌恶那种纯理论的不起作用的批判，下决心不仅要批判现有制度，而且要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制度。和马克思一样，他经历了一个由单纯的哲学研究转向现实的政治斗争的过程。这种转变可以从《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等文章中清楚地看出来。

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3年夏发表于《来自瑞士的21张》文集）一文中，恩格斯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对普鲁士君主专制制度展开了无情的批判，论证了反对普鲁士反动制度的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发表于1842年7月底出版的《德意志年鉴》）一文中，恩格斯指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彻底堕落以及它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这篇文章标志着恩格斯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彻底决裂。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反对抽象的批判，号召进步的知识分子脚踏实地地积极参加现实的政治斗争。在哲学上，恩格斯虽然还是唯心主义者，还是把世界历史看作基本上是精神发展的产物，但是，他坚持哲学和行动、主体和客观力量的结合，强调实践上批判的重要性，这就和“自由人”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原则分歧。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从黑格尔退回到费希特，把精神同实体、同具体现实割裂开来，从而远离政治斗争，使批判越来越具有抽象性质，日益急剧地转向主观唯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由于恩格斯与“自由人”的深刻分歧，他们之间的彻底决裂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1842年9月，恩格斯服兵役期满后从柏林回到了巴门。同年11月，恩格斯的父亲安排他到英国纺织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在他父亲和别人合办的“欧门—恩格斯”纺织工厂工作。在赴英国的途中经过科伦，恩格斯访问了《莱茵报》编辑部，第一次会晤了马克思。尽管当时因为同柏林“自由人”关系非常紧张的马克思把恩格斯看成“自由人”一伙，见面时他们非常冷淡，但是，这次会晤非常重要，恩格斯同意撰写英国方面的通讯给《莱茵报》。11月底，恩格斯到了曼彻斯特。在那里，他研究英国经济和阶级斗争，写了许多论文，刊载在《莱茵报》上。主要有：《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谷物法》和《伦敦来信》。在这些文章中，英国的经济问题和社

会结构问题占了重要地位，恩格斯分析了英国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后得出结论说，英国社会革命不可避免，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承担这个革命。这些文章标志着恩格斯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列宁指出："恩格斯是在英国，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认识无产阶级的。"（《列宁选集》第1卷，第89页）迁居英国是恩格斯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曼彻斯特是当时英国纺织工业中心，最强大的工人组织的所在地。当时正处在高潮的宪章运动的中心。这为恩格斯从事工人运动，调查研究资本主义状况，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恩格斯不是整天呆在帐房里，而是亲身到曼彻斯特的街道、工厂和工人住宅区去了解他们的贫困情形。恩格斯经常参加各种群众大会和工人集会，经常利用工余时间研究英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英国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考察英国工人的斗争和宪章运动。

当时的英国社会正处于宪章运动的高潮中。恩格斯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研究宪章运动的，他经常参加工人的集会，参加宪章派的会议和群众大会，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导人齐·哈尼等建立了联系，并且为宪章派的机关报《北极星报》撰稿。在英国，恩格斯还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信徒建立了联系，还是欧文派机关报《新道德世界》的撰稿人。在《新道德世界》上，恩格斯向英国工人介绍了德国、法国、瑞士等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介绍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的观点，介绍了卡贝、勃鲁、蒲鲁东和魏特林的观点，简练地阐述了德国古典哲学，即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观点。恩格斯在论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学说和法国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学说时，除批评他们学说的缺点、弱点之外，也肯定了他们对世界文化宝库所作的贡献。在英国，恩格斯还结识了信仰空想社会主义的德

国工人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约瑟夫·莫尔（1812—1849年）和卡尔·沙佩尔（1812—1870年）等人。

恩格斯在从事工人运动和调查英国社会政治状况的同时，还进行了艰苦的理论研究工作。他阅读了大量书籍，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研究了让·巴·萨伊，约·雷，麦克库洛赫，詹姆斯·穆勒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还认真地透彻地研究了十九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昂·圣西门，沙·傅立叶和罗·欧文的著作，他还阅读了格·巴贝夫，埃·卡贝，威·魏特林，比·约·蒲鲁东等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空想共产主义者的著作。恩格斯在阅读空想社会主义著作时，一开始就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批评圣西门学说“笼罩了一层不可理解的神秘主义的云雾，因此，起初也许还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可是最终便不能不使人大失所望”。“圣西门主义很象一颗闪烁的流星，在引起思想界的注意之后，就从社会的地平线上消失了。现在没有一个人想到它，没有一个人谈起它；它的时代过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7页）他指出了傅立叶反对废除私有制的错误，“傅立叶主义还有一个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彻底的地方，就是它不主张废除私有制。在傅立叶主义的法伦斯泰尔即协作社中，有富人和穷人，有资本家和工人。全体社员的财产构成股份基金，法伦斯泰尔经营商业、农业和工业，所得的收入按以下的方式分给社员：一部分作为劳动报酬，另一部分作为对技艺和才能的报酬，再一部分作为资本的利润。原来在关于协作和自由劳动的一切漂亮理论后面，在慷慨激昂地反对经商、反对自私和反对竞争的连篇累牍的长篇言论后面，实际上还是旧的经过改良的竞争制度，比较开明的囚禁穷人的巴士底狱！当然我们不能停在这一点上；而法国人也确实没有停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9页）

当时，在其他任何国家、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象在英国、

在曼彻斯特那样清楚地看到工人们是这样贫困，而有产阶级却又如此穷奢极侈。英国的这样尖锐的阶级矛盾，使恩格斯感到非常惊奇。因此，恩格斯到英国曼彻斯特之后不久，给《莱茵报》所写的文章就表明，他已经比在那个被称为“德国曼彻斯特”的乌培河谷所写的东西前进了一步。他已经开始认识到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无产阶级是能够实现社会变革的进步的社会力量。在1842年11月底，所写的《国内危机》一文中，他论述了英国工业发展的社会后果。指出了不同阶级之间物质利益的冲突，工人阶级状况的日益恶化；指出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和工业国之间的市场竞争。并且认为，这是工业国本身所固有的，而且是自身力量所不能解决的。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业发展虽然使国家富庶，但同时也造成急速增长着的赤贫如洗、勉强度日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已经成了英国最强大的一个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49页），这个阶级是消灭不了的，因为他们永远也不能获得稳定的财产。恩格斯认为，商业稍微一停滞，就会使这个阶级的大部分挨饿，大规模的商业危机就会使整个阶级都挨饿，“既然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末这些人除了起义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同上书，第549页）1842年夏，英国几个工业区的工人举行总罢工的尝试，很快就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合法革命的思想束缚了工人的手脚。恩格斯在文章的最后指出：无产阶级从失败中得到了好处，“那就是他们意识到了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阶级的物质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50—551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不仅指出了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超过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大师，而且已经开始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的阶级关系的高度，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且把暴力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唯一道路。

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如：《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谷物法》、《伦敦来信》等还表明，他已经着手研究英国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结构问题，评述英国正在展开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且揭示了英国各政党的性质，指出了无产阶级是实现英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的社会力量。

恩格斯通过对英国工业发展和无产阶级状况的认真考察，清楚地认识到，物质利益是人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中心。他指出，英国各个政党都有与它相应的社会阶层和阶级，代表着各自不同的物质利益。恩格斯根据经济关系揭露了英国三个主要政党（托利党、辉格党和宪章派）的阶级背景。他指出，托利党是“土地贵族的党”，“按其性质和历史发展来说，是一个纯粹中世纪式的反动透顶的党，是旧式贵族的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52页），代表旧式贵族的利益；辉格党是“金钱贵族的党”，“它是以商人和厂主为核心组成的，其中大部分人构成了所谓中层等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52页），代表商人和工厂主等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激进派代表资产阶级下层利益：而宪章派则从工人群众中吸取自己的力量，“工人阶级日益熟悉宪章派的激进民主主义原则，并且越来越认为这些原则是他们集体意识的表现。”（《同上书，第552页）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些文章中，已经闪耀着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光芒。

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进一步揭示了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的斗争的基础是物质利益。他指出：在它们中间“是从来没有过原则斗争的；它们之间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同上书，第547页）。恩格斯在揭露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围绕“谷物法”所展开的激烈斗争的实质时指出，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阶级这两个阶级所关心的根本不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是他们本阶级的私利。资产阶级之所以激烈反对谷物法，是因为粮价降低，他们便可以降低工人工资。而土地贵族之所以竭力捍卫谷物法，是为了“顽强地维

护自己的利益”（同上书，第558页）。因为这样就能够高价出售粮食，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恩格斯也指出了工人们不屈不挠地为自身的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他认为，只有工人们所追求的才是人类真正的幸福，他指出：穷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而这个世界迟早也是他们的。从这些文章来看，恩格斯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物质利益和阶级地位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是世界上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恩格斯从研究英国产业革命入手，考察了英国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及其相互关系，发现了经济是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经济生活是政治生活中的决定因素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并且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英国工业的这一番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同上书，第674页）研究英国的经济问题以及由此决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对于恩格斯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和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后来曾经写道，“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7页）

从这时期发表的著作来看，恩格斯由于积极参加现实斗争，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开始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但是，和《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一样，这种转变仅仅处于开始阶段。这是因为，在哲学上，这时恩格斯还没有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在物质利益和思想原则的关系问题上，虽然看到了在英国现实生活中物质利

益对人们思想和行为起支配作用，然而还没有得出物质利益决定人们思想的原则是普遍规律的结论。例如，他在谈到德国共产主义时，说：“德国人是一个从不计较实际利益的民族，在德国，当原则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原则几乎总是压倒利益。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的轻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正是这样一些品质使哲学共产主义在这个国家取得了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2页）在政治上，这时恩格斯已经看到了“工业国”所必然引起的矛盾；已经看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和物质利益的根本冲突；已经看到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但是，还没有进一步把它同资本主义私有制联系起来，也没有指明这种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恩格斯在分析社会主义发展前途时，还存在这样的想法：被他描写为哲学民族的德国人，会通过自己特有的“哲学”道路达到共产主义。它“只能用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即用大学生和商人来充实我们的队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2页），因此在德国存在着从有教养的和有产的阶级中间建立共产党的条件。这些问题在恩格斯以后的思想发展中逐步得到了解决。

# 第 四 章

# 马克思恩格斯彻底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从1842年春至1844年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即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形成的《德法年鉴》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实践活动和发表的文章表明，他已经彻底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在同一时期，恩格斯也通过不同的道路，以不同的方式彻底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 第一节 马克思彻底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1843年3月，《莱茵报》被查封以后，马克思于5月从科伦迁居到克罗茨纳赫（莱茵省的一个小城镇）。6月在那里与燕妮结婚。当时马克思致力于为创办一个杂志做准备工作。他和阿尔诺德·卢格商定《德法年鉴》杂志在法国巴黎出版。他在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一封信中规定了杂志的指导原则，他指出，这个杂志的目的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马

克思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反对把理论当作空谈与教条。他说："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同上书，第416页）他提出要消灭私有制，不怕同当权者发生冲突。他批判了那些把主观臆造的药方强加于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的唯心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他主张，无论对教条的共产主义（卡贝·德萨米、魏特林等人），还是对教条的社会主义（傅立叶、蒲鲁东等人），都采取否定的态度。马克思还强调实际斗争，反对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等人脱离实际的抽象批判，要求把理论批判与政治批判结合起来。他指出，理论的批判，必须与"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7—418页）

与此同时，马克思注重研究现代史，特别是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并且阅读了许多法国唯物主义者和马基雅弗利、卢梭、孟德斯鸠、兰克等人的著作，着手对以前积累起来的各种经验，进行消化，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在这里，马克思做了大量的笔记和摘录，这就是马克思的《克罗茨纳赫笔记》。

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由于对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以及为摩塞尔地区贫苦农民的辩护，都使马克思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用单纯的法律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是不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通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普鲁士反动政府对政治自由的大举进攻，《莱茵报》本身所受到的粗暴迫害，使马克思看到，他原先一直认为的是理性的体现和历史发展动力的国家完全没有那种理性的性质，

也没有起到黑格尔认为它在历史过程中应起的那种决定作用，这对马克思来说，不仅开始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原理的怀疑，而且意味着革命民主主义理想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破产。

究竟如何看待国家和“市民社会”、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在1842年春就开始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和法律观点。当时，马克思已经指出，黑格尔观点的核心之一是对君主立宪制的颂扬。他在1842年3月5日写给阿尔诺德·卢梭的信中谈到，他想写一篇文章批判黑格尔的法的观念和政治观念，“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同君主立宪制作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1页）。这篇文章没有保存下来，很可能没有最后写完。从1843年3——8月在克罗茨纳赫期间，马克思继续这个工作，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未完成的著作。这部著作在马克思逝世后，于1927年才在苏联公开发表。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的第三篇伦理第三条国家部分（即第261—313页）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批判地分析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阐明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马克思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阐述了正在形成中的唯物辩证法的一些观点，开始了从唯心主义辩证法向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前进运动。关于这部著作，恩格斯曾经这样写道：“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9页）。《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虽然是一部尚未完成的著作，有些思想和用语还不够确切，但是它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黑格尔从唯心主义原则出发，完全颠倒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他认为，国家不是现实的阶级对立的产物，而是“客观精

神”的最高表现；市民社会则是国家的观念领域，是国家这一理念的具体环节。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国家观，无情地揭露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他指出，黑格尔把“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0—251页）。黑格尔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既然是国家的观念领域，因此，它们之间结合成国家也就不是它自身生存过程的结果，而是国家这一理念在自己生存过程中从自身把它们分离出来的。马克思在批判时指出：“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而事实是这样的：“国家是从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出来的。”（同上书，第252页）马克思还指出：“应当从现实的主体出发，并把它的客体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页，第273页）从这个前提出发，马克思看到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来说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本原”（同上书，第397页）。

黑格尔颠倒了私有财产和国家的关系。他认为，国家政权统治着私有财产，使其服从自己，服从整体的普遍利益。而长子继承权就是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支配权的证明。马克思在批判时指出，不是政治国家支配私有财产，而是私有财产支配政治国家；凡是长子继承权存在的地方，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是私有财产及其代表人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虽然还没有把私有财产看作是一种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但已明确地指出了，不是国家决定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而是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决定国家。因此，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

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这种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这表明，马克思已经从唯心主义历史观转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

法哲学领域是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之间矛盾表现最尖锐的领域。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无情地揭露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体系，深刻地分析批判了黑格尔的方法，阐述了他自己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这是马克思批判继承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创立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问题上的“中介”观点的批判，阐明了矛盾发展的辩证法思想。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有时也描述了现代国家制度中的一些矛盾。马克思对此总是给予充分肯定：“黑格尔的深刻之处也正是在于他处处都从各种规定……的对立出发，并把这种对立加以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2页）但是，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他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本质的概念中的统一”，他急于完成这个“统一”，使他不能透过现象的矛盾，真正抓住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而把表面的东西当作事情的本质。马克思在批判时指出，精神不是在物质之外，而是依赖物质而存在的。因此，现象的矛盾也不是存在于理念之中，而是存在于客观现实的过程中。事实上，现象的矛盾的本质“当然是某种更深刻的东西，即本质的矛盾”（同上书，第358页）。

黑格尔从抽象的理念出发，认为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以及国家机构内部的矛盾，可以通过一种“中介”力量来调和，最终达到同一，并把这种“中介”作用说成是“逻辑的思辨奥秘，是合乎理性的关系”（同上书，第355页）。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观点时，把现实的对立面分为两类：一类是同一本质的对立面，如磁的两极——南极和北极，人的两性——男性和女性。这

里的两极“是同一种本质的两种对立的规定，是同一种本质在高级发展阶段上的差别。它们都是分化出来的本质。它们之所以是现在的它们，就因为它们只是分离出来的规定，也正是本质的这种分离出来的规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5页）这种对立面不是作为敌对双方而彼此对立，而是互相排斥，又互为前提的。另一类对立面是本质不同的对立面，是“真正的极端”，“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点，它们既不相互吸引，也不相互补充。一个极端并不怀有对另一个极端的渴望、需要或预期。”所以它们“不需要任何中介”，也“不能被中介所调和”（同上书，第355页）。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真正对立面的尖锐性以及这些对立面的转化为极端看做有害的、必须尽可能加以阻止的事情，然而，这种转化却不是别的，而是这些对立面的自我认识，以及它们对决定性斗争的热烈渴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6页）。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提出了从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规律的思想，他断言，从发展的特定的质的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逐渐的、非飞跃式的推移是不可能的，从理论上论证这种推移是形而上学的，也就是说，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推移是质变、是飞跃。但是，在《法哲学原理》和《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却认为，国家制度的不断变化和前进运动是一种不可觉察的无形的变化。从外表看来是一种平静的觉察不到的运动，久而久之国家制度就变得面目全非了”（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5页）。这就完全否认了国家制度发展中的质变、飞跃和革命。对此，马克思首先指出：“诚然，在许许多多国家里，制度改变的方式总是新的要求逐渐产生，旧的东西瓦解等等，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5页）马克思以真实历史为根据，否定了黑格尔的“逐渐推移”，指出了革命变革的必需。在论述“真正的革

命”时马克思并不忽视量的变化的意义。他还进一步指出：“要使国家制度不是完全被迫改变，要使这种假象最后不被暴力粉碎，要使人有意识地做他平日无意识地被事物本性支配着做的事，就必须使国家制度的运动，即它的前进运动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从而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这时，进步本身也就成了国家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5页）只有当人民成了国家制度的原则时，国家制度的前进运动才能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人民自觉地掌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不再盲目地受规律支配，这时“国家制度”才可能最后被暴力所粉碎。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考察了必然性和偶然性，假象、现象和本质，关于观念和概念的发展和关于国家是有机整体的思想中，也有不少辩证法思想因素。马克思都一一加以肯定，并被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范畴的重要内容。

在法哲学领域里，马克思通过研究黑格尔体系和方法之间的矛盾，发现了这种矛盾产生的根源是唯心主义。马克思指出，现实是理念的产物，现实的发展是理念发展的现象，用神秘主义的基础和神秘主义的关系来暗中替换现实的基础和现实的关系，这就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尤其是黑格尔法哲学的原则。正是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性质使他的辩证法带上了明显的形而上学局限性。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认识有了新进展。他说：“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即具体劳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形成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5页）这些思想无疑闪耀着天才的光辉，但还不是建立在以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透彻分析为依据之上的。当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尚不充分，工厂制度和工人运动还处在童年时代等原因，使马克思未能做到这一点。只是当马克思到了法国

巴黎以后，才真正认识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彻底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1843年11月初，马克思和燕妮迁居到法国巴黎。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展的巴黎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法国经过多次革命，政权落到大资产阶级金融贵族手中，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正在兴起，阶级斗争十分激烈，酝酿着新的革命。这便为马克思研究与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便利条件。马克思到巴黎以后，忍受着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和政治上的种种打击，一面积极投身于实际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一面积极参加理论斗争，继续进行艰巨的科学研究工作，进一步研究经济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政治经济学，深入研究法国大革命，总结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同时，还研究英国工人运动史，经济发展史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进行广泛的接触，与法国的各个秘密工人团体建立联系，经常出席他们的会议。他还同旅法德侨中的手工业工人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取得了联系。特别有意义的是他直接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熟悉他们的生活与斗争，参加他们的活动，和他们一起讨论问题。工人阶级的事业成为马克思研究的重要内容。他把自己的理论研究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如果说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还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理性国家的身上，那么，现在他已经把希望转向无产阶级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已经看到国家是根源于“市民社会”的。所以期望国家来改造社会是不可能的。巴黎的工人运动使马克思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未来社会的真正创造者和主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消灭私有制，改造“市民社会”。由于参加了实际的革命活动，促使马克思完成了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转变。

1844年2月底，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分子阿尔诺德·卢梭

共同创办出版了《德法年鉴》杂志。就在这一期《德法年鉴》上，马克思发表了两篇极其重要的科学论文：《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同时还发表了马克思在筹办杂志时期写给卢格的几封信。恩格斯和列宁都给了这些文章以很高的评价，恩格斯把这些文章称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16页），列宁则把这些文章称为“马克思的特别优秀著作”，认为它们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彻底转变的重要标志。是马克思已经彻底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列宁全集》第21卷，第59页）。

《论犹太人问题》一文的大部分是在克罗茨纳赫写的，而后在巴黎完成。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引的大部分文字都有一段简短的说明。这就证明，《论犹太人问题》是在刚刚完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立刻着手写作的。这篇文章是为了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而写的。

1843年3月，《莱茵报》停刊后，青年黑格尔派发生了分裂。以批判的神学家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越来越脱离现实政治斗争，倒向反动派。

自从1816年5月4日发布关于犹太人不得担任公职而只能在国家中居于从属地位的命令以来，犹太人一直要求与基督徒享受平等的权利。当时，这种要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但是却遭到了反动的普鲁士政府的拒绝。

布鲁诺·鲍威尔在1842年和1843年先后发表了两篇论述犹太人解放问题的文章：《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教徒获得自由的能力》，大肆鼓吹民族的政治解放是以取消民族宗教为前提的，他把宗教的废除问题看成是社会的根本问题，并用以“宗教解放”为限的“政治解放”来否定全人类的真正解放，企图把斗争局限在宗教问题范围内，削弱和阻碍德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反对德国封建专制的斗争。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批判了布鲁诺·鲍威尔的唯心主义观点，唯物主义地解释了宗教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论述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所得出的结论。这表明，马克思已经与唯心主义彻底决裂了。

布鲁诺·鲍威尔认为，宗教是产生一切不平等现象的根源；犹太人不能够解放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信奉犹太教；因此，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社会解放，首先取决于废除他们所信奉的民族宗教。马克思在揭露这种颠倒犹太人和犹太教关系的唯心主义观点时指出，宗教根源于社会经济关系，宗教的秘密应当到现实的人的社会生活中去寻找。他说："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6页）马克思指出，"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我们并不认为：公民要消灭他们的世俗桎梏，必须首先克服宗教的狭隘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说明迷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5页）这样，马克思就唯物主义地论证了宗教和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社会历史的关系。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指出，作为经济共同体的市民社会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的基础，而不象黑格尔那样，把国家看作道德观念的实现。这表明，在国家问题上，马克思已经得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

鲍威尔把犹太人的解放问题，看作是一个单纯的宗教问题，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看作是政治解放的基础。他认为，犹太人只有完全放弃宗教，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才能获得政治解放。马克

思在批判鲍威尔的上述观点时指出：鲍威尔抽象地谈论了“人的解放”，却混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界限。他还指出，鲍威尔歪曲了宗教和政治的关系，犹太人解放首先不是一个宗教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实际上政治解放并不能废除宗教。只有人类解放才能使宗教消灭。马克思根据欧洲革命的经验，阐述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解放的根本区别。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政治解放”，是指“资产阶级革命”。他认为，“政治解放”就资产阶级民主范围来说，无疑是一种历史进化。因为它废除了国教，承认了信仰自由，以致取得了财产资格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限制等等，但是，它是不完全、不充分的，“从政治上废除私有财产不仅没有废除私有财产，反而以私有财产为前提。”“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并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解放，因为政治解放并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人类解放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7、426页）。这就是说，政治解放并不消除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对立，从而保存着私有制而产生的人的异化。只有人类解放，才能消除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对立，才能消除私有制和人的异化，才能消除宗教的社会根源，从而使宗教消亡，达到人的真正解放。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还指出，“当政治生活特别强烈地威胁到自己的力量的时候，它就竭力压制它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因素，使自己成为人的真实的、没有矛盾的类生活。但它只有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宣布革命是不停顿的，才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0—431页）马克思以法国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经验为依据，与那些把法国大革命看作“大灾难”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强调只有运用暴力手段，进行不停顿的革命，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最终实现人类解放。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阐明了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他认为，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理

论，而是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从而开始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局限性。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另一篇重要论文。这篇文章明显地表现出马克思在法国巴黎期间无产阶级对他发生的影响。在文章中，马克思已经把无产阶级看成是完成人类解放的力量，认为无产阶级将同革命思想一起改造资产阶级社会，并用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产阶级社会。

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全面地正确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演变过程。起初，他认为思维决定存在，精神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后来，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他认为，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是相互作用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他认为，存在决定思维，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决定于精神，而是决定于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他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糟粕，汲取了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全面地、正确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指出了先进的理论具有巨大的革命作用，先进理论是根本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他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这就是说，单纯的理论批判不能代替实际斗争，反动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只有通过群众的革命的暴力行动才能摧毁它。这样马克思就从根本上批判了妄图依靠"精神"的批判，去达到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目的的青年黑格尔派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观点。同时，马克思又进一步阐明了理论对实践、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阐明了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关键在于掌握群众。当然并不是任何一种理论都能掌握群众，只有彻底的理论，即反映事物本质的、反映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先进理论才能掌握群众。所以马克思又指

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同上书，第460页）这样，马克思又批判了那种轻视理论、否定思维对存在具有反作用的错误观点。这表明，马克思已经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即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者了。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回答了应当由谁来克服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实现人类解放，哪种力量能够体现社会的进步等问题，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问题。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反复强调对宗教的批判，为的是要转向对世俗的批判。这是因为宗教所允许的彼岸的虚幻的幸福，恰恰是人们在此岸世界失去了的幸福的反映。它以虚幻的幸福来掩盖现实生活中的不幸。所以，他说：“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但是，这一任务不是单靠思辨的批判就能完成的，批判只是揭露，还不等于改造，要达到改造的目的，就要依靠人们的革命实践。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地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实现德国彻底革命和全人类解放的唯一阶级。他说：“那么，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这个社会的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同上书，第466页）马克思指出，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登台太晚了。它还没有来得及宣布自己的解放思想，社会情况的发展以及政治理论的进步已经说明这种观点是陈旧了。或者至少是成问题了。所以，如果说法国是经过了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革命）才逐步过渡到人类解放（即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德国是不可能了。德国的出路只能由无产

阶级宣告旧制度的解体，实现社会的革命改造，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现代社会中唯一革命的阶级。它正在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壮大，而且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还存在，它就必然要壮大。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前提发生全面的矛盾，“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制”。无产阶级恰恰就是现代社会自我否定的原则。当无产阶级否定私有制时，它也就必然会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和压迫，使全人类得到解放。他深信德国的未来是属于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满怀信心地宣布，无产阶级是真正运用革命理论并把它付诸实现的社会力量。他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马克思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具有世界历史作用的思想，表明马克思在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理论划清界线方面，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表明，他已经从深刻同情劳动人民利益和捍卫劳动人民利益发展到了认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已经从唯心主义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发展到唯物辩证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因此到这一时期，马克思已经彻底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 第二节　恩格斯彻底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在马克思彻底转变为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同时，恩格斯也通过不同的道

路和方式完成了和马克思同样的转变。

马克思是从总结《莱茵报》工作时期的斗争经验，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抓住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问题进行哲学剖析开始，直到发表《德法年鉴》论文，逐步完成他的世界观的彻底转变的。而恩格斯则是通过深入了解工人生活，直接参加工人运动，通过研究英国的经济生活和政治发展，通过分析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来完成自己世界观的彻底转变的。

1844年2月，在法国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发表了恩格斯从英国曼彻斯特寄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两篇论文。除此之外，恩格斯还写了《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和《英国状况——十八世纪》等文章。这些文章表明，这个时期，恩格斯彻底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已经成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恩格斯在研究英国工业史中，发现了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决定因素，是构成现代社会阶级矛盾的基础。因此，这个时期恩格斯写的文章差不多都是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开始的。这正象马克思是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开始的一样。这篇文章是恩格斯从1843年底着手整理并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成果。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恩格斯第一篇经济学著作。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第一次用社会主义观点批判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因此，列宁称它“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列宁全集》第2卷，第8页）。这部著作奠定了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已经彻底摆脱了青年

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观点，并且开始着手克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一些缺点，从对人类社会的一般论述，转向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基础的更加深入的批判。恩格斯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深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表现，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恩格斯指出，垄断，竞争，生产无政府状态，商业危机，劳动人民生活的日益贫困以及精神上道德上的堕落等等，都是私有制存在和统治的必然结果。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论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祸害的真正根源；人们可以从资本主义私有制中找到阶级存在、劳动群众受剥削以及阶级斗争的真实基础。他指出，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生活下去就得工作，而所得的是贫乏的生活资料，工人创造的财富被资本家、地主阶级占有了，这些“都产生于资本和劳动的最初的分离和完成这一分离的人类分为资本家和工人的分裂。而这一分裂正日益加剧……它必然还会不断地加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0页）。恩格斯由此得出了革命的结论。他认为，这一切只有“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1页）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还存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其结果将越来越严重，社会财富将越来越集中，无产阶级将日益贫困化，最后，势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评价很高，称它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天才大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3页）。而恩格斯在1844年也指出他对于自己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这一最早的著作是多少有点自豪的，尽管它有许多缺点。马克思认真地阅读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巴黎笔记》中，不仅对它作了摘要，而且还把它作为自己经济学研究的主线，在许多批注和评论中，一再反映出恩格斯这一著

作的基本思想。后来，马克思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尤其是《资本论》中，不断引用这一著作。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从而引起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使其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了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的著作在其中造成整整一个革命的那门科学。”（《列宁选集》第一卷，第91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还没有摆脱伦理的“哲学的”共产主义的影响，恩格斯在很多地方还是根据一般人类的道德和人道的抽象原则来批评资产阶级社会的。尽管如此，这一部著作也完全可以证明，恩格斯已经彻底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了。

《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是为了批判接近托利党的英国贵族资本家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书而写作的。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立场批判了托马斯·卡莱尔企图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劳动教，论述了批判宗教对于实现社会改造的意义；批判了托马斯·卡莱尔所宣传的“英雄崇拜”的唯心主义哲学，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彻底揭穿了托马斯·卡莱尔的理论的反动性和反科学性。

托马斯·卡莱尔在《过去和现在》一书中，揭露了当时英国社会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出现的各种罪恶事实，如社会腐败，人民生活贫困，人们思想空虚，伪善说谎等等。但是，他的这种揭露，是站在封建贵族立场上，从右的方面批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他积极鼓吹恢复“真正的贵族”统治，号召回到封建社会去。在他看来，似乎封建制度可以消除劳动者的贫困和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其他社会罪恶。他还认为，当时英国社会的各种罪恶事实的根源，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使人失去灵魂的无神论。

因此，托马斯·卡莱尔认为，只有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即劳动教，才能铲除这些社会祸害。恩格斯认为，托马斯·卡莱尔这种理论不过是德国泛神论在英国的变种。他尖锐地指出："要消除弊端，就要找出产生弊端的原因；要是卡莱尔这样做，他就会发现，这种腐败和空虚，这种'无灵魂'，这种非宗教和'无神论'都是由宗教本身产生的。宗教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剥夺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把一部分恩典还给人和大自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47页）恩格斯认为，我们要批判宗教，把被宗教剥夺去的内容——人的内容，归还给人，"所谓归还就是唤起他的自觉"，我们将"永远向宗教和宗教观念宣战，毫不顾及别人会给我们扣上什么无神论或别的帽子"（同上书，第649页）。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不仅要废除旧的宗教，而且也反对创立任何形式的"新"宗教。恩格斯还把批判宗教跟对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问题联系起来。他深刻地指出："人在宗教中丧失了自己的本质，失去了自己的人性，现在由于历史的进步，宗教动摇了，于是他才发觉自己的空虚和不稳定。但是他只有彻底克服一切宗教观念，坚决地诚心地回到自己本身，而不是回到'神'那里去，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人性、自己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1页）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的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恩格斯在这里精辟地阐述了批判宗教对社会改造的重要意义。

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恩格斯还深刻地批判了托马斯·卡莱尔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托马斯·卡莱尔极其害怕工人运动，因为这种工人运动不仅对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严重威胁，而且对私有制和一切与私有制有关的社会制度与传统也是一个严重威胁。托马斯·卡莱尔竭力否定劳动群众为争取自身的社会解放而进行的斗争，鼓吹

"英雄崇拜"或"天才崇拜"，"把人分成两类——山羊和绵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贵族和平民，老爷和百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2页）。托马斯·卡莱尔把剥削阶级当作超人的"天才"、"英雄人物"，而把劳动人民当作"无理性的"群氓，宣称"超人的天才"、"英雄人物"、"卓越人物"、"精神贵族"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托马斯·卡莱尔的理论实际上是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等关于英雄和群氓对立的唯心史观在英国的变种。恩格斯反对托马斯·卡莱尔的蔑视人民群众的反动理论。他强调劳动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他指出，"英国有教养的阶级对任何进步都是置若罔闻，只是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才稍稍动一动。如果以为这些腐朽不堪的有教养阶级，它们每天的精神食粮也许会比它们本身要好一些，那是没有的事。上流社会的书刊都已走向穷途末路，其内容正象饱食终日暮气沉沉的上流社会本身一样，是异常枯燥的。"而"只有大陆上不熟悉的那一部分英国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还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9、628页）

总之，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同一时期发表的一些著作表明，恩格斯已经公开站到工人阶级方面来了。恩格斯在英国生活的21个月（1842年11月——1844年8月）和马克思在巴黎居住的一年多（1843——1845年1月）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德法年鉴》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倾向，引起了右派的恶毒攻击。保守的《总汇报》于1844年3月10日写道："巴黎新杂志的批判毫不留情，它的论战超出了一切美学的标准，它的讽刺笔调虽然不象匕首那样锋利，但确象一个粗壮拳头的打击。"反动的

莱比锡《铁路报》于1844年4月4日写道：《德法年鉴》的编辑和撰稿人的目的是“把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奉若神明，只对它寄予希望和信任”，因此，“德国自由主义者报刊的神圣职责就是坚决表示自己的愤慨，毅然割断同他们的一切联系。”

普鲁士驻法国巴黎大使向政府报告了《德法年鉴》的“危险”倾向，政府便下令禁止该杂志进入德国境内，如果马克思、卢格、海涅等人进入普鲁士国境，就加以逮捕。一批杂志在边界遭到没收，三千份印数中有三分之一被警察没收。由于《德法年鉴》在德国秘密发行十分困难，同时，马克思和卢格在意见上发生原则分歧，随后又导致公开冲突。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不赞成马克思的信仰，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对现存制度进行无情批判，要求同工人建立紧密联系，把卢格吓坏了。作为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卢格对“无批判力”的群众，对工人阶级采取藐视和敌视的态度。因此，他们分道扬镳了。这个杂志于1844年2月底只出了一期双刊号就停刊了。

《德法年鉴》停刊以后，具备着全新的世界观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开始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而斗争了。

## 第三节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的影响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恩格斯说过，费尔巴哈“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其他任何哲学家都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07、208页）列宁也指出：“马克思在1844—1847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38卷，第386—387页）费尔巴哈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借助于费尔巴哈，批判和改造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然后才到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没有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完成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向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就会困难得多。

1841年6月，一本名叫《基督教的本质》的书在德国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这本书中，费尔巴哈用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宗教，宣称自然界是不依赖于神或“绝对精神”而客观存在的，人和人的意识则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费尔巴哈指出，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什么神或“绝对精神”之类的东西，而人的宗教幻想的创造的最高存在物——上帝——只不过是人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费尔巴哈指出：“你相信爱是上帝的属性，因为你自己在爱；你相信上帝是一个智慧的、仁慈的存在者，因为就你自身来说再也不知道有什什比仁慈和智慧更好的了。……这样，上帝就是人的本质，被看作最高的真理。”（《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44—45页）所以，人应当使自己重新获得被自己在关于神的概念中异化了的人的本质。费尔巴哈在这部著作中以异常尖锐的形式批判了宗教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用通俗生动的语言阐明了崭新而又深刻的唯物主义道理，恢复了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权威，使人们的思想豁然开朗，一下子从几千年来宗教和黑格尔唯心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

费尔巴哈学说的某些特征，即使在当时也是同马克思的正在形成的世界观的倾向相违背的。费尔巴哈哲学的直观性，是同马克思主张的哲学是一个积极因素的观点不相符合的；费尔巴哈对辩证法的估计不足是同马克思对辩证法的革命作用的深刻认识相对立的。但是，总的来说，《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解放作用是巨大的。马克思热情地欢迎该书的出版。他特别注意费尔巴哈关于宗教的世俗起源的独特见解，他指出：“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

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页）马克思把费尔巴哈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批判，看作是走向新的科学世界观通路上的必要阶段。后来，随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信念日益成熟，这位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代表（他沉重地打击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基础）的观点，对马克思的影响越来越大了。

当时，马克思和许多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一样，把《基督教的本质》一书首先看作是一篇激进的无神论宣言，是比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对宗教偏见的更加彻底的批驳。当时，马克思还不十分理解《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的唯物主义内容。因为他受黑格尔哲学影响较深，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费尔巴哈的思想乃是在理解现实的人的关系方面向前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这是促使马克思世界观中唯物主义成分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使马克思更加坚信，对宗教的批判是对现有制度批判的一个阶段，是使人摆脱精神来源和其他来源的一种斗争形式。当时，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是先进哲学的代表，他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公开地和勇敢地捍卫这些思想，使它们不受守旧派和反动分子的攻击，并且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之。

恩格斯是在到柏林之后才看到费尔巴哈的这部著作的。当时，恩格斯正与谢林进行激烈的论战。费尔巴哈的这本书给了恩格斯巨大的勇气和深刻的启发。恩格斯读了这本书之后，感到思想豁然开朗，精神非常振奋。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的一天已经破晓”，“一个世界历史的黎明出现了”。费尔巴哈的这部著作，大大增强了恩格斯与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的战斗力，恩格斯深刻地批判了谢林把“理性”作为世界之外的单独存在的唯心主义。他说：“费尔巴

哈第一次鲜明地使我们觉醒的现代哲学的结论是：理性除了作为思想外是不能存在的，思想仅仅在自然界内和同自然界一起存在，它不能离开自然界而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英文版）第209页）费尔巴哈的著作引导恩格斯走上了唯物主义道路。因此，在四十多年以后，恩格斯还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高度评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巨大影响作用。他指出：“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3页）

但是，恩格斯并没有象费尔巴哈那样，对黑格尔哲学采取不加分析、全盘否定的态度。他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时候，采取了扬弃的办法，既吸收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又继承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内核，并且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和马克思一起，对两者进行了革命的改造，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开始注重研究现实问题，他所接触到的客观现实问题同他头脑中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观念发生了矛盾，矛盾的焦点是国家问题。马克思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把国家看作是理性的体现，而实际上普鲁士国家竭力维护林木所有者的利益，并且使摩塞尔地区农民陷于破产贫困。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国家和“市民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呢？这个问题一直使马克思深感苦恼。

1843年2月，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一书公开出版，书中明确提出了要把思辨哲学“翻转过来”这一观点，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后来，马克思回顾当时的情形时指出：“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这部著作就是马克思于1843年在克罗茨纳赫写的《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第一次集中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这部著作不仅书名同费尔巴哈在1839年写的《黑格尔哲学批判》极其相似，而且文章的论点和使用的方法也极其明显地反映了费尔巴哈的影响。

费尔巴哈指出："一般思辨哲学的改革宗教的批判方法，与宗教哲学曾经应用过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02页）费尔巴哈认为，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一样，都是颠倒了主词和宾词的关系，他自己致力于把这种颠倒的关系再颠倒过来。但是，费尔巴哈只是批判了宗教，指出了宗教的世俗基础，却没有进一步分析国家的本质，分析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没有从对天国的批判转到对尘世的批判，因此，在社会历史领域里，他仍旧停留在唯心主义。

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把思辨哲学翻转过来的思想的启发，并把它运用于考察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他指出："假如黑格尔从作为国家基础的现实的主体出发，那末他就没有必要神秘地把国家变成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2页）又说："黑格尔把谓语、客体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把它们同它们的真正的独立性、同它们的主体割裂开来。……因此，神秘的实体成了现实的主体，而实在的主体则成了某种其他的东西，成了神秘的实体的一个环节，正因为黑格尔不是从实在的对象（主体）出发，而是从谓语、从一般规定出发（而这种规定的某一体现者总是应该有的），于是神秘的理念便成了这类体现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3页）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鼓吹君主立宪制、否定人民主权时，运用了费尔巴哈关于人创造宗教的论点。马克思指出："正如同不

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同上书，第281页）

费尔巴哈批判宗教时运用了异化概念。他认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也运用了费尔巴哈关于异化的概念来考察国家。马克思指出：“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就是要确定它们这些领域特殊的异化。”（同上书，第283页）“君主制是这种异化的完整的表现。”（同上书，第283页）“我们的时代即文明时代，却犯了一个相反的错误。它使人的实物本质，即某种仅仅外在的，物质的东西脱离了人，它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同上书，第346页）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观点，国家也是一种异化。正如宗教是人创造的，又反过来奴役人一样，国家也是人创造的，又反过来奴役人。国家是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宗教经验。马克思对国家问题的观点，和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确有相似的地方。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经过费尔巴哈，开始了由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前进运动。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彻底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恩格斯利用费尔巴哈的无神论观点批判了托马斯·卡莱尔的泛神论。他指出：“德国最近对泛神论的批判非常彻底，简直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费尔巴哈在‘轶文集’中发表的提纲……对这个问题谈得极为详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47页）对比在1842年11月恩格斯到英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国内危机》，明显地可以看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认为，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从来不是独立的主导的因素，它总是服从于为历史进步指出方向的“原则”。这就是说，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是由某种“精神”决定的，是“伟大人物”的思想或意志决

定历史的发展。因此他在历史领域内还是唯心主义。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的发表使恩格斯受到很大影响。从此，他不再是从"思想"、"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开始应用唯物主义方法研究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恩格斯得出了一个极其明确的结论："英国工业的这一番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4页）恩格斯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从生产方式变更中人们物质利益的冲突来分析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党派斗争，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这就从根本上驱除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迷雾，找到了一条科学地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中，全面地正确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这样一个哲学基本问题，成为一个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者。马克思还提出了人类解放，即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这是马克思彻底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重要标志。然而，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论证，仍然带有费尔巴哈的痕迹。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政治解放是指资产阶级革命；人类解放是指社会主义革命。当时，马克思还没有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还不可能从客观的经济运动本身来论证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而是把它们看成是消除人的异化的不同阶段。马克思指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但是，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因此，它是不彻底的。相反，它加深了这种异化，因为它"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马克思

认为，只有人类解放才能解决这个矛盾。他指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的论证，也保留着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烙印。例如，关于无产阶级"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以及关于"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6、460页）的提法就是明证。

马克思指出："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这段话也反映了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间思想上的联系。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是费尔巴哈用以对抗宗教神学的人本主义命题。马克思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既然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要使人成为人，"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1页）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命题中，引出了革命的结论。

由于费尔巴哈批判了宗教唯心主义，宣布了唯物主义在德国的胜利，因此为批判那些社会问题完成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如果没有费尔巴哈在德国和世界哲学史上所做的贡献，或者不利用费尔巴哈所积累的宝贵思想资料，马克思恩格斯要从黑格尔唯心主义走向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必须批判地改造大量的思想资料。因此，否认和贬低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恩格斯科学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也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派。例如，马克思并不赞成费尔巴哈哲学的缺陷。1842年3月马克思就“同费尔巴哈有些争论”。马克思指出，这个争论不涉及“原则”（宗教——被歪曲了的意识），而是涉及“对它的理解（宗教一被歪曲了的理论）”，由此得出结论，必须“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4、436页）当时费尔巴哈脱离实际斗争、脱离政治，而马克思则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上，因此，马克思在某些重要方面已经超过了费尔巴哈，特别是在理解宗教的社会基础方面。在1843年10月3日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还对费尔巴哈的宗教观点和自然主义提出了批评。他对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一书的缺点作了如下的评价：“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2—443页）

在《德法年鉴》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费尔巴哈的影响仍然严重存在。但是就在这里，马克思在转述了费尔巴哈关于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的论点以后，非常含蓄地、未加点名地对费尔巴哈提出了批评。马克思在论述人类解放的条件、任务，以及哲学面临的任务时，并不是笼统地论述一般的“人”，而是形成了明确的“无产阶级”这个特定的概念。因此，认为马克思曾经有一段时间是纯粹的费尔巴哈派的观点是错误的。

在探讨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形成问题的著作中，曾经流行过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仿佛马克思首先达到唯物主义观点，基本上制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然后才达到唯物史观。（参阅考茨基的《唯物史观》）这种观点夸大了各种思想流派（其中

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而过低估计了那些曾经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起过重大作用的社会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意义。这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的真实情况不相符合的。

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不断揭露费尔巴哈哲学局限性的过程中，在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伦理学唯心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他们的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

# 第　五　章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雏形

1844——1846年夏，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结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初步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 第一节　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时代的要求

1844——1846年这一时期，欧洲各国正处在革命风暴的前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一步尖锐化。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正在准备着向资产阶级发动更大规模的斗争的无产阶级，迫切需要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但是，当时的社会主义理论不是保守的、反动的，就是空想的；当时的世界观不是唯心主义的，就是形而上学的。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迫切要求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以便从思想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使他们自觉地组织起来，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由于机器大工业代替了手工劳动，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也随之不断

壮大，并且积极地进行了既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又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德国资产阶级虽然有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本主义秩序的要求，但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加之他们被英国和法国工人运动吓破了胆，害怕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因此，他们不敢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自己的要求，而是竭力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来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作为当时德国社会制度主要基础的小资产阶级，由于害怕资产阶级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兴起，一些自诩为“真正社会主义者”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即以布鲁诺·鲍威尔、施蒂纳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这时竭力否认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蜕化为无产阶级的危险的敌人。他们的学说是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超阶级的爱”的人本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在法国，蒲鲁东等人宣传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成为无产阶级走上革命道路的严重障碍。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从事工人运动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工作，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中，在反对鲍威尔和施蒂纳的“真正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反对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斗争中，初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思潮的结果，而且也是他们清算过去的哲学信仰，改造自己世界观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早年时期曾经受过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熏陶，后来又受到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强烈影响。当他们的世界观转变完成以后，共同感到有必要清算自己过去的哲学信仰，同它们划清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

的同时，逐步将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体系。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844年4—8月写于法国巴黎。这部著作科学地剖析了市民社会，首次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及其三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彻底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以后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它是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第一次比较全面深刻地批判，它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早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就产生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强烈愿望，迁居巴黎以后，为这种研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当时，法国资本主义比德国发达，经过1789年和1830年两次革命的冲击，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在法国占据统治地位，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了。当时的巴黎是欧洲工人运动和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中心。又是各流派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集中地之一，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非常流行。这一切都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方便。时代的发展需要用哲学观点指导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揭露工人阶级受压迫和受剥削的根源，论证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马克思就必须把哲学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系统地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科学地剖析资本主义社会。

在巴黎居住的一年中，特别是在《德法年鉴》停刊以后，马克思开始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除了积极参加工

人运动外，马克思“用鹰的眼睛观察过去和现在的思想”——涉猎了大量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和社会学著作。他对十五位英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十九部重要著作作了九本摘录札记。有的还附有他自己的批注和批评意见。这就是通常所讲的《巴黎笔记》。《手稿》是马克思当时准备公开出版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一书第一卷的部分草稿。由于出版商害怕警察当局的迫害而废除了该书的出版合同，因而这部著作当时未能发表。

《手稿》由三个未完成的部分组成。《手稿》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拍摄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保存下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部档案照相研究考贝时，偶然发现的。1927年发表一部分手稿，题名为《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这是苏联共产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整理时加上的。1929年仍以此名出版，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直到1932年才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朗兹胡特和迈耶尔第一次用德文全文公之于世。正式取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沿用了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大卫·李加图等的一些术语，对读者不免艰涩，同时常常重复，或者中途停顿，有的地方已经散失，因此使读者难于捉摸。但是，只要深入进行研究，就不难发现，这部著作的思想极其深刻，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在思想内容上形成了一个严谨的整体。

## 第二节　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奠定了唯物辩证法的初步基础

1843年，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集中地清算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但是，当时虽然揭露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质，却没有集中地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和基本

原理。1844年，马克思在《手稿》中全面地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初步基础。

马克思在《手稿》中肯定了德国批判运动，即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初期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它的缺陷。“在运动之初曾是一个真正进步因素的神学的批判，归根到底不外是旧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被歪曲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8页）“现代德国的批判着意研究旧世界的内容，而且批判的发展完全拘泥于所批判的材料，以致对批判的方法采取完全非批判的态度，同时，对于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质上是本质的问题，则完全缺乏认识。”（同上书，第156页）当时德国的批判运动即青年黑格尔派的基本缺陷，就是对黑格尔辩证法完全采取了非批判的态度，而对待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却是关系到认清这一“批判的方法”，进而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问题。马克思在《手稿》中尖锐地指出，青年黑格尔派所作的批判只是一种“滑稽可笑的动作”，青年黑格尔派不仅没有认识到现时已经需要同黑格尔辩证法划清界限，而且它还“以一种诡秘的、阴险的、怀疑的方式，搬弄黑格尔辩证法诸要素来反对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7页）。马克思根据当时德国批判运动的现状，明确地规定了唯物主义哲学批判的任务：“要说明这一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9页）这即是说，要到黑格尔哲学的庞大体系中去掘发它的合理内核即辩证法。由此可见，在当时，马克思已把“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当作迫切的“本质问题”来解决了。

在《手稿》中，马克思用篇幅较长的一节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批判，他第一次批判了黑格尔庞大的哲学体系，并且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1873年马克

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回顾这一情况时说："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辨证法的神秘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17—218页）

马克思这次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批判，是以《精神现象学》为靶子的。马克思认为，《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9页），是"黑格尔的圣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63页）。他明确地指出，分析批判黑格尔哲学，"必须从黑格尔的《现象学》……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9页）。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实际上包括了黑格尔以后整个唯心主义雏形的主体和客体统一的理论进行了尖锐深刻的批判。揭露了它的唯心主义本质。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哲学体系是从纯粹思辨的思想开始的，以自我意识的、绝对的抽象精神结束，"所以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同上书，第160页）。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就是纯思想的辨证法。马克思坚决反对黑格尔把外部的对象世界，看成是绝对观念外化的唯心主义。他严肃地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根本性错误，同时又充分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功绩。他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同上书，163页）马克思充分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把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看成是《精神现象学》的最后成果。他唯物辩证地论述了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思想。同时在实践概念、否定之否定规律等方面，也都把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来，把它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在《手稿》中，马克思把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辩证法加以区分，并把辩证法提到重要地位。这表明，马克思当时已开始超出一般唯物主义，开始用

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成果来丰富唯物主义。

在《手稿》中，马克思针对黑格尔在哲学根本问题上的本末倒置，对思维和存在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作了许多精辟论述。他明确指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页）。"如果你设想人和自然界是不存在的，那么你就要设想你自己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你自己也是自然界和人。"（同上书，第130页）马克思还指出，"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而在今天，普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抽象，……因此，我的普遍意识的活动本身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同上书，第122页）这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已经正确地回答了存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还进一步阐明了人的意识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他指出："它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同上书，第131页）马克思重申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同上书，第128页）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成为现实的科学。但是，马克思所理解的感性与费尔巴哈所理解的感性是完全不同的。费尔巴哈把感性当作人的消极直观，而马克思把感性看作是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马克思认为，人的感官是通过对象化活动，即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占有对象。他指出："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同上书，第124页）他还进一步阐明，感官本身也在人们的实践中得到改造，现在人的眼睛跟他原始的眼睛有不同的感受，人的耳朵跟他原始的耳朵也有不同的感受。"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页）

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根本问题上，马克思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又精辟地阐述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存在是本源的，意识是派生的。“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同上书，第123页）

在《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他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同上书，第127页）这就是说，理论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判定理论是否正确必须依靠实践，理论任务的解决，也只有通过实践。在《手稿》中，马克思开始把实践的观点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手稿》中通篇的论述都贯彻了这一基本观点。马克思无论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还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都是以实践的观点作为基本出发点的。

## 第三节　批判黑格尔唯心史观，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初步基础

在《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他指出，由于黑格尔把存在和意识的关系颠倒了，所以他把人的各种现实关系，如财产、家庭、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等等都说成是自我意识的纯粹异化，是精神的产物。因此，对黑格尔来说，人类历史只是意味着自我意识的外化和这种外化或异化在思维中和通过思维来扬弃的历史。

马克思在《手稿》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人类社会，

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马克思在这里虽然尚未使用唯物史观这一专门术语，讲的还是“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9页）。但是，它们所包含的实际内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根源，他指出：“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同上书，第150页）。如果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还是以国家和法等问题为重点开始清算和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实现了与黑格尔哲学的决裂和向唯物主义的转变。那末，在《手稿》中，马克思抓住整个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本质，从它对哲学根本问题本末倒置的解释入手，对黑格尔哲学作了全面深刻的批判；他比较自觉地运用唯物主义原理去研究与认识人类社会，并且着重于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探求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进行社会革命的依据，从而巩固和发展了唯物主义思想，向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生产活动，即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他指出：“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同上书，第121页）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已经说明生产活动是支配一切活动如政治、宗教、科学、艺术等等的，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马克思还进一步阐明了物质生产和人类解放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说：“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完成非人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这说明，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应用于生产过程便会形成最终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生产力；自

然科学应用于生产过程作为生产力，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必然实现人的关系的“非人化”，这就是说，会产生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但从它发展的客观结果来看，却“为人的解放做了准备”。反过来说，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要建立没有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所以，马克思这一论断，可以看作是他以后阐明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著名原理的最初表述。也是对他自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革命需要物质基础”的思想的精辟发挥。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费尔巴哈、蒲鲁东、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等忽视这种生产活动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唯心主义。

马克思还进一步提出了物质生产活动同上层建筑领域诸事物的相互关系。他说：“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在这里，马克思虽然还没有达到阐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辩证关系的高度，也没有把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政治法律制度与社会意识形态互相区分开来，而只是笼统地把它们称之为“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但是，马克思已经指出，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它决定着艺术、政治、科学以及人类的一切其他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还指出：“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同上书，第120—121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已经把革命运动和经济制度本身的矛盾运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把私有制运动看作是革命运动的基础。也就是说，革命运动是私有制本身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这样，就为克服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缺陷和科学地论证共产主义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在《手稿》中，由于马克思把哲学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结

合起来，使得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当时，马克思虽仍然沿用了费尔巴哈关于“人是类存在物”的提法，但是都具有了新的内容。马克思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人之所以与动物相区别，就在于人能够进行生产劳动。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因为生产劳动本身就是社会性活动。不论是进行物质生产的体力劳动，还是进行精神生产的脑力劳动，都是社会性活动。比如，科学研究的进行，从形式上看是个人的活动，实际上是社会性活动。因为科学研究活动所需要的材料，甚至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社会的产品。

马克思认为，人之所以是类存在物，不是自然属性的共同性决定的，而是由于人能够进行生产劳动。他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又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同上书，第96页）马克思抓住了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劳动，因而正确处理了人与社会的关系。费尔巴哈虽然再三强调自然界是感性的存在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是，他并不真正理解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无论从物质生活，还是从精神生活而言，都依赖于自然界，而且人越是比动物万能，人对自然界的依赖的范围也就越加广阔。但是，马克思又认为，人对自然界具有能动作用而不是被动的。他十分强调人对自然界的改造作用。他提出了自然界的人化问题，也就是说，人们通过生产劳动，使自然界表现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使自然界打上了人的意志的印记。

在《手稿》中，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论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

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比较自觉地坚持了从实际出发的

唯物主义观点。他把经济范畴不是当作抽象的脱离实际的概念，而是当作现实的生产关系的反映。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和国民经济学，找出了据以认识千变万化，迷离混沌的社会现象的规律性。为了能够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马克思牢牢地抓住各个阶级经济利益的对立进行分析。他揭示了劳动与资本，工人与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根本对立。马克思通过分析工资、利润、地租等反映阶级关系的经济范畴，认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关系。他指出：“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发，用它自己的话指出，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是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正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可怕的恢复；最后，资本家与靠地租生活的人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89页）马克思认为，这种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必然导致革命”（同上书，第87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分析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异化问题的研究，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异化”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以前的哲学著作中曾经广泛地使用过。它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在黑格尔哲学中，异化就其抽象意义来说，有两种含义：第一，它意味着转化，从一种存在转化为“异于自身的他物”。第二，它并不意味着一般的转化，而是意味着从一种存在转化为与自身相异己、相对立的事物或力量。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自我异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即在历史中和思维中，又重新回复到自身，变为“纯意识的太空”（《黑格尔全集》195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卷，第262页）。黑格尔的异化概念体现了头足倒置的唯心

主义辩证法，它论证了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即一种事物向与自身异在的事物的转化，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形式。

在费尔巴哈哲学中，异化也是一个基本概念。他把异化归结为人把自己的本质的“类的特性”，即从所有人特有的自然本质中抽象出来的共同特性加以异化，就是说，人创造神并把神当作世界的创造者。因此，人在当世不得不采取同他的真正本质相异的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而同这种真正本质相适应的“类”的生活只存在于宗教幻想中，变成纯粹幻想的生活。费尔巴哈力图克服黑格尔对异化问题的唯心主义解释，把这个概念归结为抽象的人的自然本质的异化，按照抽象的人本主义精神对它作了解释，但忽略了这个问题的社会内容。

马克思在早期著作，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等著作中，广泛地使用了异化概念，在《手稿》中更是集中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在这里，马克思集中地阐述了人的异化的各种形式及其所体现的深刻的社会的阶级矛盾，并且从异化的扬弃中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马克思认为，异化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中，而且也表现在以所有制和交换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创立了劳动异化论。他详细地分析了劳动异化的四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劳动者同他的产品相异化。这就是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化的存在物同劳动者相对立，成为一种统治劳动者的力量。

第二，劳动者同他的生产活动本身相异化。其意义是，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成为一种强制性的活动，这种劳动带有自我牺牲和自我折磨的性质。因此，劳动不属于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连他本人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这种生产活动的异化，

是由劳动产品的异化决定的。

第三，劳动者同他自己类的本质相异化。马克思指出：“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马克思所讲的“类的本质”，主要是指人类的基本机能——劳动本身，即有意识的劳动。他认为，人通过改造客观世界的生产才证实自己是类存在物或表现出类的本质。但是，由于异化劳动使劳动者同他的生产活动本身及产品相异化，“也就是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同上书，第97页）从而使生产者丧失自觉自愿进行劳动的兴趣，“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同上书，第97页）。

第四，人同人相异化。这是由上述三方面的异化表现所造成的直接结果。马克思说：“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9—100页）马克思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关系、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同上书，第100页）

在《手稿》中马克思还分析了异化劳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他指出，异化劳动导致工人与资本家在物质生活上的两极分化：异化劳动为富人制造了珍品，却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给工人造成了贫民窟；劳动生产了智慧，却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何种发展状况，劳动者永远摆脱不了贫困和受压迫的地位。这就清楚地指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如果不彻底推翻这种制度，它就不可能获得解放。

马克思还分析了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愈是通过自己劳动占有自然界，他就愈加严重地丧失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是，“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2页）这清楚地指明了，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是产生人的自我异化的经济根源。

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异化范畴的唯心主义实质，又对它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赋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内涵。他将异化概念用于分析社会关系的广泛领域，如宗教、国家和法的关系，特别在《手稿》中，通过异化劳动问题，把异化集中地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因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出发点是社会存在，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是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它所揭示的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马克思采用了黑格尔异化理论中关于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的发展形式，用来论述人类社会发展由原始公有制——私有财产制——消灭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论述了人类社会历史由低级形态经过各种中介，最终转化为共产主义的必然性；黑格尔的异化论是为德国封建专制制度作辩护的，马克思的异化论，不仅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而且把斗争矛头对准整个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从而闪耀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火花。

在《手稿》中，马克思把异化劳动问题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联系起来，通过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质，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改变劳动者被剥削被压迫的处境，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他认为，从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关系出发，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尖锐地批

判了以蒲鲁东为代表的以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马克思还论证了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地解放自己的思想，明确地提出要把彻底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当作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指出：“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页）马克思把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看作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们互为因果，因而，要扬弃异化劳动，就必须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是使整个社会摆脱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政治形式。

在《手稿》中，马克思用“工人解放”，代替了他在《德法年鉴》中提出的“人类解放”，然后进一步说明了工人解放与人类解放的相互关系，论述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伟大思想。他指出：“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同上书，第 101 页）同时，他还把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当作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他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又说：“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同上书，第120、117页）

当时，马克思论述的共产主义，具备了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要彻底消灭私有制；第二，要通过工人革命的途径。这样就同当时流行的一切空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划清了界限。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论述还带有费尔巴哈的

影响。他把共产主义表述为消灭人的本质和人相异化。“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又说：“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制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同上书，第174页）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的这些术语对于共产主义的论述，反映出他的思想认识还不够明确和不够成熟。因此，《手稿》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在后来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中，如：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和《资本论》中，并未放弃早期著作中广泛使用过的异化概念，但是，在这些成熟著作中，马克思在论述科学共产主义时，不再以哲学的、即伦理学的人的本质“异化”的概念作论据，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原理，来论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以后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放弃了早期著作中从人的本性来评判社会生产关系的方法，而是根据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关系来考察资本主义的经济。马克思后期的异化理论不再以人类本性为基础，彻底克服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马克思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把社会生产关系看作是由物质生产力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把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动看作是受生产力制约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不是当作适应道德观念而变动的。马克思创立了剩余价值的理论，建立了一整套科学的经济范畴，通过这些范畴和规律，深刻地阐明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揭露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各种矛盾，并且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出发论证了社会主义产生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这样，马克思就彻底克服了他早期共产主义学说中的伦理共产主义的烙印，而将科学共产主义建立在唯物史

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之上，建立在阶级斗争学说之上。但是，马克思仍然广泛地使用劳动异化的范畴来表述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和它的劳动产品的分离，以及劳动成果成为异己的力量和对它的生产者的统治。

在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中，马克思将共产主义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劳动不仅摆脱了资本剥削，而且劳动不再是仅仅作为谋生手段，而且是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2页）。由于从根本上消除了造成各种社会异化的根源，所以，社会的产品极大丰富，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得到充分满足，人的“个性的充分的发展”得到了保证，这样，才真正使人从各方面充分发展，才使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社会成员真正恢复了和意识到人的价值和尊严。与一切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理论重物轻人，蔑视、仇视劳动者，为扼杀人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不同，马克思不仅在早期的劳动异化论中，而且在后来科学地阐明的共产主义学说中，始终贯彻着对劳动者、对人的高度重视。因此，马克思主义闪耀着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的光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永远朝气蓬勃并日益为全世界劳动者和一切进步人类所拥护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手稿》中，马克思精辟地指出，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环节，但它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要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道路是曲折的，过程是漫长的，任务是艰巨的。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和宗教，在德国恢复唯物主义的权威作了充分肯定。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里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

费尔巴哈成就的伟大以及他把这种成就贡献给世界时所表现的那种谦虚的纯朴，同批判所持的相反的态度恰成惊人的对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7—158页）又说：“只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越不喧嚷，他的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6页）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评价是很高的，。但是，在辩证法问题上，费尔巴哈比黑格尔是后退了。费尔巴哈打烂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却简单地抛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因而他没有真正战胜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在《手稿》中，马克思无论在认识论方面，还是在历史观方面，都远远超出了费尔哈巴。但是他对自己和费尔巴哈的根本分歧还没有完全自觉地意识到，因此，他这时的思想还明显地带有费尔巴哈的印记。他仍然采用了费尔巴哈的一些术语，如类、类的生活、类的本质、人的本质异化等，并且自称为彻底的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者，而且在一些问题的阐述上也可以看到费尔巴哈的痕迹。由此可见，在1844年马克思已经远远超出费尔巴哈，但是要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从批判黑格尔转向批判费尔巴哈，还需要继续前进。

总之，《手稿》不仅全面地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初步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原理，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而且运用唯物辩证法，从科学剖析“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入手，从批判地考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入手，初步阐述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原理，为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还深刻地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初步论证了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第一次概括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进行了初步尝试。《手稿》是马克思主义百科

全书式的草图，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雏形，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和真正的发源地。

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历史地位的评价，国内外存在着严重分歧。

自从《手稿》1932年公开发表以来，围绕着评价马克思的这部名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西方资产阶级竭力抹杀《手稿》的过渡性质，把《手稿》与后来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对立起来，他们故意抬高这部著作，把它说成“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把以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叫做“退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以达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另一种情况则是故意夸大《手稿》的过渡性质，故意夸大它的缺点。认为《手稿》中有许多错误思想，是马克思的未成熟著作，因此不值得重视。所以，在国内外许多阐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专著和传记中，没有给《手稿》以应有的地位，或者甚至不提这部《手稿》，以此来贬低和否认《手稿》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创立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以及《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

因此，认真研究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对它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 第六章

# 《神圣家族》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唯物主义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写于1844年8—11月，发表于1845年2月。

《神圣家族》是一部著名的论战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哲学”，同时也清算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唯物地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把辩证法从唯心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他们又用“现实的人”代替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向前推进了唯物主义。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还正面阐述了正在形成过程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进一步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神圣家族》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列宁指出，《神圣家族》一书十分清楚地反映出“马克思由黑格尔哲学转向社会主义：这个转变是显著的，——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什么以及他如何转到新的思想领域”（《列宁全集》第38卷，第7页）。他认为：这一论战性的著作所阐述的思想，“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列宁选集》第一卷，第90页）。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写作《神圣家族》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

《神圣家族》一书主要是一部反对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们的叙述主要是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文学总汇报'……所暴露的材料加以考察，就能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这也是我们写作本书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页）

当时，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已经成为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是一种荒谬而反动的思潮。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搬掉横在工人运动面前的绊脚石，推动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必须彻底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因此，《神圣家族》这部论战性著作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

我们知道，青年黑格尔派在德国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参加过青年黑格尔派，并且与鲍威尔兄弟等人关系十分密切。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写作《神圣家族》，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顾青年黑格尔派的发展变化情况。

青年黑格尔派在1842年以前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和对宗教的批判曾经作出过贡献，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在1842年特别是在1844年以后，青年黑格尔派由上升时期转变为下降时期，他们蜕化的一个标志，就是1841——1842年初在柏林组织所谓"自由人"组织。这是一个脱离生活、陷入抽象争论的无神论团体。它反映了青年黑格尔派在普鲁士政府反动政策压力下越来越脱离政治，陷入纯理论批判，在政治上由激进转化为保守，甚至反动。这一变化过程是有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的，它充分表明了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即既

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性又有与封建势力相妥协的动摇性和保守性。

1843—1844年，在德国发生了著名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武装起义。这次工人武装起义在德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它向人们显示了德国工人阶级的高涨的革命热情，说明了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由于亲身参加阶级斗争实践和科学研究，以及这次工人起义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和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根本转变。马克思在《德法年鉴》的科学论文中提出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对立问题，他们坚决反对走与封建统治阶级妥协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主张走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西里西亚纺织工人武装起义表明，德国无产阶级有力地和明确地开始了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势力的斗争。这时，德国资产阶级尽管本身仍在向反动封建政权进行斗争，但是也不得不要求这个反动统治者派出军队和警察来保护自己和镇压工人起义，这明显地表现了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青年黑格尔派卢格在法国巴黎《前进报》上发表文章，以学究的腔调，公开宣告无产阶级无力量，也无权利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创造历史。马克思对卢格的态度非常愤慨，也在法国巴黎《前进报》上发表文章，满腔热情地为工人武装起义进行辩护。他把无产阶级称之为解放德国的积极因素，预言它将成为一个“大力士”。并且还指出，谁要想获得这样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信任。“自然这就需要有一些科学的远见和一些对人的热爱才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4页）于是，马克思与卢格彻底决裂了。在几个星期之后，马克思又公开站出来反对鲍威尔兄弟及其一伙。当时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兄弟及其一伙，给工人武装起义吓坏了。他们害怕工人群众，仇视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坚持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他们认为，社会进步不在于对现有社会进行变革，而在于批判宗教，废除宗教对人的统治。1843年12月至1844年10月间，布鲁诺·鲍威尔兄弟以及法赫尔、荣格尼茨、施里加等人合伙出版了一个与《德法年鉴》相对抗的《文学总汇报》（月刊，共出12期），他们放弃自己原来的反对派立场，公开转向拥护普鲁士反动政府。布鲁诺·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上发表的《一八四二年》一文，直接表示要和在《莱茵报》上得到反映的《一八四二年激进主义》划清界限。他们大肆宣扬以自我意识为基础的主观唯心主义，反对唯物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鼓吹一种超越一切现实、超越政党和政治的批判；他们蔑视群众，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看作是消极的，反动的，是社会进步的障碍。在鲍威尔兄弟及其一伙看来，进步的唯一动力是所谓的“批判的批判”，他们自己则是“批判的批判”的化身。他们狂妄自大，“谴责”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非批判”态度，而公然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给《文学总汇报》制定的方针十分明显地适合反动派的利益，一位负责书报检查的政府官员说：“鲍威尔兄弟使我感到真正高兴，他们非常符合书报检查条令。”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兄弟及其一伙所坚持的政治立场和宣扬的这些反动谬论，正是当时一种反动的社会思潮的反映。这已经成为当时工人运动前进道路上的主要危险。

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在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中指出，“这个‘文学总汇报’的基本特征是：‘批判’变成了某种超验的存在物。这些柏林人认为自己不是从事批判的人，而是由于偶尔的不幸才成为人的批判家。因此他们只承认一个现实的需要……意识或自我意识被看作是唯一的人的本质。例如，爱情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情人在这里只不过是‘对象’。打倒对象！因此这种

批判认为自己是历史上唯一的积极的因素。与这种批判相对立的是作为群众、作为怠惰的群众的整个人类，群众只是作为精神的对立物才有意义。因此，对批判家来说，滔天的罪行就是具有感情或情欲——批判家应该是善于冷嘲和凛若冰霜的哲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51—452页）恩格斯也指出：“另一方面，德国有一些哲学家不愿从他们的纯粹理论中做出实际的结论，硬说人只应该玄想形而上学的问题，现在我们向这些人宣战了。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出版了一本著作（即《神圣家族》——作者注），详细地驳斥了布鲁诺·鲍威尔所坚持的原则，赫斯先生和华尔格尔斯先生现在正在着手驳斥施蒂纳的理论。鲍威尔和施蒂纳是德国抽象哲学的最终结论的代表人物，因而也是在哲学上反对社会主义或者宁可说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头等重要的人物；因为社会主义一词在德国指的就是这样一些人所具有的各种不明确而且也无法明确的模模糊糊的幻想；这些人认为需要采取某种措施，但是不能决定是否采取共产主义的整套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99—600页）在《神圣家族》一书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页）这里讲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就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辨唯心主义”指的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青年黑格尔派对当时德国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已经成为最危险的敌人。为了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利益，促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健康发展，必须彻底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兄弟及其一伙，搬掉这块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正当马克思着手撰写《神圣家族》一书的时候，恩格斯在从英国返回德国途中，于1844年8月底到达巴黎，与马克思第二次会面。此时，他们两人发现彼此“在一切理论领域中”观点完全一

致。于是他们共同合作撰写《神圣家族》。这就为他们终生合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恩格斯在巴黎逗留的10天中，马克思和他已经拟好了全书的大纲，分好了章节，共同写作了“序言”。恩格斯分担不多的七个章节，不到一个半印张，在他于9月6日离开巴黎返回德国巴门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从9月初到11月，马克思集中精力从事《神圣家族》一书的写作工作。

最初，恩格斯只是把这个工作看成是嘻笑怒骂式的报复，很快就写完了他在计划中所承担的部分，但是几个星期之后，他吃惊地知道了马克思赋予他们的论战以怎样的性质。讽刺的形式虽然保存下来，但是，马克思实际上把这场论战变成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这期间，马克思大大地扩充了和恩格斯原来拟定的写作计划。马克思利用一部分自己原来有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对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的心得和其他许多笔记、摘要，并且还认真而详尽地研究了十七和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唯物主义著作。《神圣家族》一书由马克思于11月底写完，篇幅扩充到二十个印张，成为一本内容广博的大部头著作。这部著作在未正式出版之前，有许多内容已经公开发表，并引起人们的注意，还遭到法国的一些“理论家”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些“批判”都给以辛辣的讽刺。《神圣家族》一书于1845年2月在德国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 第二节　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唯心主义，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些基本原理

《神圣家族》一书的主题和中心思想，就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和它的思想渊源——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著作的序言中指出：“我们的叙述方法自然要取决于对象本身的性质。批判的批判在各方面都低于德国

的理论发展水平。因此，假如我们在这里没有进而对这一发展本身加以探讨，那是由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的本质所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页）论述的方法要符合论战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按照批判对象的特点和自己的思想开展论述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及其思想渊源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过程中，联系具体的哲学问题和社会问题，阐明了自己正在形成中的新世界观的一些基本原理。

## 一、批判思辨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原理

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围绕哲学基本问题，展开对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歪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然后用歪曲了的观点去解释事物。在青年黑格尔派各个成员的各种各样的具体观点中，“自我意识创造世界”这一观点是核心。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的时候，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

### 1．揭露自我意识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

青年黑格尔派用自我意识代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把自我意识作为世界的基础，万物的创造者。他们把外部世界和人的实践活动一律归结为自我意识的表现，他们认为，自我意识是历史的创造力量，而知识分子和国家又是这种创造力量的体现者。自我意识以外的东西是不重要的。

“自我意识”这个概念同经验、实体等概念一样，可以唯物地解释、也可以唯心地解释。自我意识实际上是自我认识，是人对周围世界和自身的反映和意识。这是唯物主义对自我意识的解释。而唯心主义却把人的意识、人的属性变成脱离人的绝对主体，编造出自我意识创造世界的神话。布鲁诺·鲍威尔一伙对

“自我意识”作了唯心主义的曲解，把它当作神化了的绝对，变成脱离人体的独立存在的实体。他们认为，自我意识不断通过批判克服实体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因此单纯批判的力量可以改变一切现存事物，只要批判现实不合理的观念，提出一种新观念来代替旧观念，就等于改变了事物，从而自我意识也就前进了一步。他们认为，历史就是自我意识的历史，自我意识的创造性全在于批判，自我意识是世界的本质，批判是这一本质的属性。因此，他们把批判和自我意识看作是一回事。埃德加尔·鲍威尔说：“哲学就是对现有事物的批判”，“批判所考虑的只有一件事——如何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自我意识、批判、科学、哲学全是一个东西。”青年黑格尔派把批判看作是一种创世活动，自我意识是创造世界的实体，他们自己又是批判的主体。改造世界被说成是批判的批判的活动。

他们把人的属性变成了绝对的主体、永恒的存在的源泉，布鲁诺·鲍威尔说：“一切事物都起源于自我意识，并在其中找到根源”，“实体只是自我意识的现象，暂时的体现”。世界是自我意识的派生物，自我意识＝（费希特）自我。自我绝对排斥非我，自我意识绝对排斥实体。他们认为，自我意识如与实体发生联系就不纯洁，就会降低自己的力量。布鲁诺·鲍威尔讲的自我意识就是天才，伟人的自我意识，就是他们自己的自我意识。

马克思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的性质是主观唯心主义。他们称自己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真理”。根本错误就在于否认世界的客观存在，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青年黑格尔派把世界看作幻影，“把他身外的世界变成幻觉，变成自己头脑的单纯的突发之念，然后再宣布这种幻影是真正的幻影——是纯粹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9页）。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把它称之为“儿子生母亲，精神产生自然界”的头足倒置的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青年黑格尔派这种自我意识哲学是与普通劳动者的实际体验相违反的。在曼彻斯特和里昂工场中做工的人绝对不会认为单纯依靠一些理论、观念就可以使他们摆脱自己所处的屈辱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页）。

2. 揭露自我意识哲学的思想渊源

布鲁诺·鲍威尔兄弟及其一伙虽然反对黑格尔主义的正统派，并且自称批判地克服了黑格尔哲学的局限性，实际上他们是用“无限的自我意识”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成为当时德国哲学唯心主义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兄弟及其一伙的自我意识哲学来源于黑格尔哲学，并由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走向费希特主观唯心主义。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哲学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这二者的统一的“绝对观念”。布鲁诺·鲍威尔兄弟及其一伙抓住自我意识加以恶性发展，把自我意识绝对化，把它看作无所不包创造一切的独立实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全部《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5页）。鲍威尔的一些说法与黑格尔的看法在词句上连一点区别也看不出来，而都是逐字逐句重复黑格尔的话。

3. 揭露思辨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揭露思辨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是《神圣家族》一书对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露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秘密时指出，思辨唯心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颠倒了一般和个

别的关系，把一般加以无限夸大，从而脱离了个别，成为一种独立的客观实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认识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如人们起初认识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水果（苹果，香蕉，梨），然后再抽象其共性，概括其本质，形成“果实”这个一般性概念。因此，具体水果是一般果实的真实基础，一般果实是具体水果的科学抽象。一般比个别更深刻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但是，它毕竟来源于具体的个别的水果。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没有个别，也就没有一般。

但是，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兄弟及其一伙却把一般绝对化，加以无限夸大，把本来是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般当做独立存在的本质，并且把它看作感性对象的个别事物的基础和来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如果我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的观念，如果再进一步想象我从现实的果实中得到的‘果实’这个抽象观念就是存在于我身外的一种本质，而且是梨、苹果等等的真正的本质，那末我就宣布（用思辨的话说）‘果实’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所以我说：对梨说来，决定梨成为梨的那些方面是非本质的，对苹果说来，决定苹果成为苹果的那些方面也是非本质的。作为它们的本质的并不是它们那种可以感触得到的实际的定在，而是我从它们中抽象出来又硬给他们塞进去的本质，即我的观念中的本质——‘果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1—72页）这就是说，果实的概念本来就是具体的苹果、梨、草莓、扁桃等的反映。但是，思辨哲学家把“果实”的概念当作果实即具体的梨、苹果、草莓、扁桃等的基础，这样就颠倒了存在和思维的关系。

现实中存在着许多的果实。可是，“一般果实”是如何变成一个个具体的“果实”的呢？“思辨哲学家回答道：这是因为‘一般果实’并不是僵死的、无差别的、静止的本质，而是活生

生的、自相区别的、能动的本质。……通常的千差万别的果实是'统一的果实'的生命的不同表现，它们是'一般果实'本身所形成的一些结晶。因此，比如说，在苹果中'一般果实'让自己象苹果一般存在，在梨中就让自己象梨一般存在。……苹果、梨、扁桃相互之间的差别，正是'果实'的自我差别，这些差别使各种特殊的果实正好成为'一般果实'生活过程中的千差万别的环节。这样，'果实'就不再是无内容、无差别的统一体，而是作为总和、作为各种果实的'总体'的统一体，这些果实构成一个'被有机地划分为各个环节的系列'。在这个系列的每一个环节中'果实'都使自己得到一种更为发展、更为显著的定在，直到它最后作为一切果实的'概括'，同时成为活生生的统一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3页）思辨哲学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完全是思辨的方法。在他们看来，"果实"概念不是僵死的，静止的，而是活生生的，自相区别的，能动的，现实果实的多样性是由"一般果实"的多样性所派生的。马克思指出，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兄弟一伙讲的一般果实到具体水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造物过程，"他完成了一个奇迹：他从'一般果实'这个非现实的、理智的本质造出了现实的自然的实物——苹果、梨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4—75页）。马克思还指出，青年黑格尔派这种思辨方法渊源于黑格尔哲学。"这种办法，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5页）因此，列宁指出："第二节：《思辨结构的秘密》——举出了关于果实的著名例子来批判思辨哲学，这种批判也是直接针对着黑格尔的。"（《列宁全集》第38卷，第14页）

在《德法年鉴》中，马克思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

上阐明了思维和存在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进一步发展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创造一切、决定一切的唯心主义谬论时，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论述了唯物主义反映论思想。他们指出，如果象布鲁诺·鲍威尔那样，“在任何领域内都不假定有实体（他居然还说这样的话），这就等于不承认任何有别于思维的存在、任何有别于精神的自发性的自然力，任何有别于理智的人的本质力量、任何有别于活动的苦痛、任何有别于本身行动的别人对我们的影响、任何有别于知识的感觉和欲望、任何有别于头脑的心灵、任何有别于主体的客体、任何有别于理论的实践、任何有别于批判家的人、任何有别于抽象的普遍性的现实的共同性、任何有别于我的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80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如果认为，具体的东西是一般概念或自我意识派生的，那么不仅使一般概念或自我意识神秘化了，而且也使得具体的客观世界的事物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了。如果用这种先验主义的方法去观察客观世界，就不可能有任何认识。“如果有一位矿物学家，他的全部学问仅限于说一切矿物实际上都是‘矿物’，那末，这位矿物学家不过是他自己想象中的矿物学家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2页）

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哲学中的党性原则。他们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对哲学史的歪曲的时候，第一次用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哲学史，他们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哲学上的基本派别互相对立和斗争的角度来考察哲学史。他们明确指出，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这个时期哲学思想发展的主要内容。他们肯定唯物主义是与自然科学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物质需要有机联系的，他们强调唯物主义思想同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部联系，揭示了唯物主义哲学对于社会主

义的实现具有理论意义。

马克思承认唯物主义在哲学史上的巨大进步意义，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和他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观点等同起来。他在为一种以辩证法的全部成就丰富起来的新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奠定基础。

## 二、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阐明唯物辩证法的一些基本原理

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批判了思辨唯心主义，虽然没有说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但是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矫正了头足倒置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剥出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研究了发展论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辩证关系问题。这也是《神圣家族》对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接受了黑格尔关于矛盾推动历史前进的辩证运动的学说，但是，他们反对黑格尔把人和自然界精神化，把人和自然界的历史说成是概念的发展，把人的活动归结为认识活动的唯心主义。他们在考察人和自然界并从它们的具体属性来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时，把主体和客体理解为人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同自然界的现实而具体的有机结合，用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辩证法来对抗黑格尔归结为概念运动并以抽象观念为基础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用人通过革命实践来实现的唯心主义的发展和解放来代替黑格尔所说的借助于意识而实现的唯心主义的发展和解放。这些情况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思想逐渐趋于成熟。

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兄弟一伙把思辨矛盾当作现实矛盾的创造者，宣称可以用自我意识来解决劳动和资本，资产阶

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企图消除矛盾，否定无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兄弟及其一伙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及其实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且对资本主义社会改造的实质进行了辩证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矛盾是客观事物所固有的。他们研究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问题，进一步探讨了矛盾双方在统一体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就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页）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思想是针对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的解释而提出的。黑格尔把对立面的统一解释为纯粹相关的"反思"关系。这种关系归根到底不过是对立面的简单同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立面在矛盾客体中起不同作用，表现为不同的倾向，它们决不能互换位置，斗争结果导致一方面消灭和另一方面的根本改造。这一思想比以前有重大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对立面，其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统一体中，重要的是分析统一体中矛盾双方占据什么位置，起什么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看出矛盾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宝贵思想。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统一体中，占有生产资料，是私有制的代表者，处于统治地位。因此，它要保持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统一体，它是这个统一体的肯定方面和保守方面。相反，无产阶级被夺去了生产资料，一无所有，处于被统治地位。无产阶级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就要破坏这个统一体。因此，它是私有制的否定方面和革命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矛盾双方是不可调和的。因此，私有者的行动是要保存对抗，而无产阶级的行动则要消灭对抗。同时，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这两个对立面又有某种相对的统一性。因为它们双方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产物。所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作为这个社会制度的产物的无产阶级。

## 三、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

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兄弟一伙的思辨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内，也是持唯心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兄弟一伙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过程中，阐明了正在开始形成中的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这些思想构成了《神圣家族》一书的核心内容。

1. 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自我意识，而是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是自我意识，还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这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一个根本分界线。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兄弟一伙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认为历史发展就是精神发展的历史，自我意识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布鲁诺·鲍威尔说："人和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1页）他们认为，人为了历史而存在，而历史则是为了证明真理而存在。

布鲁诺·鲍威尔这种观点不是自己的创造，而是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把历史看作论证真理的一架机器。布鲁诺·鲍威尔的这种观点是用神学目的论来论证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这种神学目的论的时候指出："从前的目的论者认为，植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动物充饥，动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人充饥。同时，历

史所以存在，是为了给理论充饥（即证明）这种消费行为服务。人为了历史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证明真理而存在。在这种批判的庸俗化的形式中重复了思辨的高见：人和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0—101页）布鲁诺·鲍威尔把自己的观点披上了一件哲学的外衣。他认为，历史是自我意识发展的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自我意识有不同表现。在远古时期，犹太教是自我意识的具体表现，后来是基督教，现在基督教又不适合了，应该由自由主义来代替它，使自我意识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这种观点进行批判时指出，历史就是人类活动的历史。“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兄弟及其一伙把自我意识当作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时候，提出了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思想。马克思对物质财富的生产的理解，比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前进了一步，认为它是整个人类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写道：“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1页）

在《神圣家族》以前的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是含混不清的。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则对它作了具体说明。他们努力把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加以区分开来。他们已经明确地看出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是决定性的因素，并且接近于得出生产关系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这个概念。马克思在谈到这些关系的特点时强调指出，在这些

关系中，“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页）对此，列宁指出：“它表明马克思是如何接近自己的整个‘体系’（如果可以用这个名词的话）的基本思想的，——即如何接近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的。”（《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页）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兄弟一伙既然把自我意识当作历史发展的基础，自然也就把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基础，即生产实践排除在历史之外了。正象青年黑格尔派把思维和存在割裂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1页）

2. 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观点为创立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唯物主义学说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关于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关系的唯心主义观点时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只能由社会存在来说明，而不是相反。

布鲁诺·鲍威尔把犹太问题当作宗教问题，把宗教问题当作独立的本质，不是从社会关系中而是在宗教意识中寻找宗教的本质，而且把现实生活也看作宗教的活动。这种观点是和鲍威尔把社会历史的本质看作自我意识的历史分不开的。马克思认为，宗教的本质存在于社会关系中。在不同时代，宗教的本质又各有特殊性。这是由该时代的经济关系决定的。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唯心主义观点时指出，资产阶级的意识和犹太教的意识等社会意识都不能由自身获得说明，只能从现实的资本主义的物质生活关系中才能获得说明。宗教存在和发展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中，因此，要消灭宗教，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意识，

就必须消灭它们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源——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加深了自己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的理解，为创立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学说奠定了基础。他指出，在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一定的经济结构，与它相适应的是一定的政治制度。他认为，正如古代国家（奴隶制国家）的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是市民社会，即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创立自己的经济基础，相反，它却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物，并且经过宣布普遍人权（普遍人权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人权和公民宣言”中所宣布的原则）来承认和巩固了自己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决定资产阶级的普遍人权的内容，从而也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自由范畴的实际内容。所以马克思说：“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宗教，而只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财产，而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放弃追求财富的龌龊行为，而只是使人有经营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5页）

马克思在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也表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思想。他把自己和恩格斯所理解的资产阶级国家表述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首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6页），这非常接近于明确理解到整个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摧毁了限制资产阶级的封建特权和权利，从而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广阔场所，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工业活动并不因行帮、行会和同业公会的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地，只有消灭了这些特权之后，真正的工业才会发展起来。土地私有制并不因土地占有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地，只有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的特权以

后，才通过土地的自由分割和自由转让而开始土地私有制的普遍运动。贸易并不因贸易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地，只有通过自由贸易，它才获得真正的实现。同样地，只有在没有任何特权宗教的地方（北美的自由州）宗教才实际上普遍地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8页）这就是说，封建的特权随着封建经济基础的消灭而消灭了，但是工业活动和贸易并没有消灭，相反，随着与新的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建立，工业活动才会更加猛烈地发展起来，贸易才成为真正的自由贸易。

3．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英雄史观，阐明了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

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兄弟一伙的自我意识哲学的实质就是制造精神和群众的对立，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否定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英雄史观，精确地阐明了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以及随着历史发展进程这一作用将不断增长的重要原理。

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一伙认为，伟大人物的笔主宰着历史，“哪一个历史时代不是由威严的‘笔’预先规定了的，不是应当由笔来解决其存在问题的！”（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28页）他甚至以造物主的姿态命令历史：“你应当如此这般地产生！”（同上书，第13页）布鲁诺·鲍威尔认为，精神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群众则是没有精神，没有灵魂，没有生命的物质，是一群无思想、无头脑的群氓，是思想的对立物。他认为，群众不仅不是历史的动力，而且还是历史的阻力，精神的真正敌人。他说：“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同上书，第102页）因此，布鲁诺·鲍威尔把群众看作自己的真正敌人。他还胡说什么“精神

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寻找”（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布鲁诺·鲍威尔还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他诬蔑无产阶级：“工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制造，所以他们也就一无所有；他们之所以什么都没有创造，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始终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的某种单一的东西，是平凡的工作。”（同上书，第21页）他甚至提出要批判无产阶级。荣格在1844年7月31日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提到这件事：“鲍威尔如此酷热批判，他写信给我说：‘不仅必须批判社会、特权、私有主等等，而且——还没有任何人想到这一点——必须批判无产者。’”（转引自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三联书店1965年中文版，第二卷，第309页）

马克思在概括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观的时候，精辟地指出了它的实质：“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活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同上书，第109页）

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观是极端腐朽的观点，它极其露骨地表现了没落阶级对群众的敌视。马克思对此极为愤恨。《神圣家族》全书始终贯穿对这一反动观点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兄弟一伙否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的时候，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创造这一切，拥护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他们还指出，历史上的任何革命都不是因为群众参加而不成功的。例如，1789年法国革命决不是不成功的，而

是获得实际成效的。它也有不成功的地方。这种局限性都同群众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有关，资产阶级提出的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原则虽然掩盖了自己的阶级利益，但是，口号唤起了群众，代表了群众的利益，因此能够运用群众力量推翻封建制度，它的局限性就是革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范围，只代表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所以引起群众的热情只是暂时的。它们之所以不成功，恰恰在于没有代表群众的利益，是脱离群众的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整个批判感到羞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2页）。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蔑视人民群众“精神空虚”的谬论时指出，青年黑格尔派不去寻找“精神空虚”的真正社会原因，而去攻击劳动人民，这是对群众“道德上加以侮辱”。并且指出，只有布鲁诺·鲍威尔兄弟一伙才是真正的“精神空虚”。马克思恩格斯在揭露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兄弟一伙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思想来源时指出，布鲁诺·鲍威尔把精神和群众对立起来的做法，并不是什么新创造。如果说青年黑格尔派有什么独到之处的话，那就是他们把这种反动的政治观点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联系起来了。“布鲁诺先生所发现的‘精神’与‘群众’的关系，事实上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的、漫画式的完成，而黑格尔的历史观又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德意志教条的思辨表现。在历史的范围内，在人类本身的范围内，这种对立表现为：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与代表精神空虚的群众、代表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8页）

青年黑格尔派唯心史观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割裂思想、利益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他们把一切历史运动都说成是精神运动，把

一切历史斗争都说成是纯粹的思想活动，否认群众的物质利益。他们把历史的冲突归咎于观念的冲突，而不去探讨历史冲突的物质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这种唯心主义谬论的时候，深刻地阐明了思想、利益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这就是说，思想要能够变成现实，必须能够掌握群众，但是要掌握群众，首先思想要反映和体现群众的利益，否则一定要失败。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同上书，第103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时，指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随着历史发展进程将不断增长的重要规律。他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同上书，第104页）这就是说，直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一切变革都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完成的革命。所以在这些革命中，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是相当受限制的。但是，随着社会进步，越来越多地反映广大群众的利益。他们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群众参加的队伍越来越大，群众的觉悟程度也就越来越高。群众参加的深度和广度对历史发展的快慢起决定作用。列宁非常重视这一思想，并把它看作是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的最深刻的思想之一。

列宁在考察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的时候，曾经指出了它们的主要缺点：第一，它只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看到产生这些思想动机的物质原因。第二，它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初步揭示了社会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社会意识的根源，而且明确地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重要原理。从而为克

服旧的历史观的缺陷、创立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

## 四、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反动思潮过程中，论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否定群众、否定无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同时，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论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进一步丰富了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揭示了雇佣工人的非人生活的悲惨境遇。他们指出，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的逼迫，无产阶级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

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无产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之后，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的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和建设共产主义的革命作用。他们指出，"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这种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这种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他们还指出："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这就是说，无产阶级要执行判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审判官的任务，就要彻底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列宁高度评价《神圣家族》一书，说它"非常鲜明

地提出了马克思的几乎已经形成了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观点”（《列宁全集》第38卷，第9页）。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分析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分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仍是从人的解放、从人性的观点出发考虑的。因此，还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没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分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分析所有的社会阶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还未形成。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虽然已经鲜明地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观点，但同《共产党宣言》一书比较起来，还是不够成熟。还只能说，它是“几乎已经形成了的”观点。

## 第三节 《神圣家族》一书的意义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反动思潮的一部重要哲学著作。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根本转变之后，共同合作论证自己新世界观的第一部著作。它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标志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第一，《神圣家族》一书彻底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兄弟一伙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初步清算了他们自己过去的哲学信仰，与旧哲学划清了界限。

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青年时代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基本上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后来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影响，走上了唯物主义的道路。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停留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水平上，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中，很快就由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就是不断地与德国古典哲学进行批判改造的过程。恩格斯在1841—1842年写的《谢林论黑格尔》中，马克思在1843—1844年写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都对黑格尔哲学进行过批判，也对自己过去的哲学信仰进行了清算。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着重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给《神圣家族》提出的任务就是："清算企图脱离政治而空谈哲理的那些德国知识分子，他们象布鲁诺·鲍威尔一样，把自己装成莫测高深的'哲学领袖'，蔑视'没有教养的'、'眼光短浅的'群众，即'乌合之众'。"（转引自斯捷潘诺娃：《恩格斯传》第339页）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这些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唯心主义及其思想渊源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们指出，青年黑格尔派不过是"从现存事物的范畴来制定公式"，即从现有的黑格尔哲学与现存的社会意向来制定公式。他们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维妙维肖的形容，"它是一个老太婆，而且将来仍然是一个老太婆；它是年老色衰、孀居无靠的黑格尔哲学。这个哲学搽胭抹粉，把她那干瘪得令人厌恶的抽象的身份打扮起来，在德国的各个角落如饥似渴地物色求婚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2页）

在《神圣家族》中，对于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他们指出，费尔巴哈揭露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秘密，摧毁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地位。"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

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页）他们还指出：“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用‘人的意义’（……）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评价是过高的。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相当大，虽然比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程度要差一些。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把自己称为共产主义者。他们把共产主义称为“真正的人道主义”、“现实的人道主义”。在阐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时，只是从一般人类解放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他们把资本主义社会仅仅了解为违反人性的不道德的社会，还没有从资产阶级的历史发展来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他们把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了解为人性的丧失，共产主义是人性的复归等等。甚至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还赞同费尔巴哈的某些错误观点。例如，马克思为维护费尔巴哈关于爱的思想对埃德加尔·鲍威尔竭力摆脱“爱的思想进行了批判”。这些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尚未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

事实上，只有马克思才是从黑格尔出发，批判和结束了黑格尔哲学，并且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费尔巴哈用抽象的人来代替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意识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这是非常不够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注意强调“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这里，已经包含着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批判时所持的某些观点。因此，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对抽

象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7页）

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客观上在许多地方已经超出了费尔巴哈，但是他们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分歧，相反地，他们主观上还认为自己是费尔巴哈的学生，常常借助费尔巴哈批判的武器。这一方面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写作《神圣家族》时，批判的主要矛头是思辨哲学的唯心主义，而费尔巴哈在这一战斗中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同盟军；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还不成熟，他们同费尔巴哈哲学划清界限的工作过程本身还没有结束。这一任务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后来的著作，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的。

法国的学者科尔纽在他的《马克思恩格斯传》（多卷本）中认为，《神圣家族》一书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完全克服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他指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几乎彻底克服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传》第2卷，第419页）这种过高的评价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第二，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过程中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为全面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基本原理，阐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和发展论的一些基本原理；初步阐述了物质资料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初步阐述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的原理。

在这本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了生产关系的基本思想，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等等。因此，《神圣家族》一书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理论基础的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全面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奠定了基础。

第三，《神圣家族》一书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唯物主义基础。

在马克思以前，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例如，法国和英国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巴贝夫的空想社会主义，德国的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等，不是空想的,非科学的,就是保守的和反动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这些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不是形而上学就是唯心主义，没有辩证唯物主义作哲学基础，缺乏科学世界观作指导。

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所面临的任务就是要为社会主义提供哲学基础。《神圣家族》一书初步解决了这个任务。列宁在评价《神圣家族》一书的时候，指出："这本书……它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列宁选集》第一卷，第90页）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资产阶级为了达到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罪恶目的，纷纷研究《神圣家族》这部著作，并且竭力歪曲诋毁这部著作。西德法兰克福学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们继承了早已被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批判得体无完肤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反动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点，并且狂妄地叫嚷什么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的批判"是驳不倒的，公开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反动观点进行辩护。因此，《神圣家族》一书对于今天我们进行反对现代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一书所批判的虽然是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但是,实际上它也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一次很好的清算，而且也是对一般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马克

思恩格斯在这本书中阐明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强大思想武器。

# 第 七 章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形成中的地位

《神圣家族》一书完成以后，马克思由于给激进派的革命民主主义报纸、巴黎的《前进报》撰稿，法国政府在普鲁士政府的请求下将马克思驱逐出巴黎。马克思在居住巴黎时期，最终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当马克思离开巴黎时，他已经有着明确的斗争目标——完成论证和创立新的科学世界观的工作，并且促使科学世界观在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

1845年2月3日，马克思从巴黎来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不久，他的妻子燕妮带着幼女也来到这里。从此，马克思开始了他生平活动中的另一个时期——布鲁塞尔时期。

当时比利时是欧洲在经济上最发达国家之一。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十分尖锐。首都布鲁塞尔是各派社会主义的一个中心。在普鲁士政府迫害下，马克思不得不在1845年12月正式退出普鲁士国籍。同年4月，恩格斯由于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拒绝该死的生意经，和家庭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再也待不下去，于是也从德国巴门迁居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马克思在比利时居住了三年多时间。这是马克思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里，他不仅全面制定和创立了无产阶级新的科

学世界观，而且为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在这一段时间里，恩格斯发表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当《神圣家族》出版的时候，恩格斯最后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了许多事实材料之后，各自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神圣家族》基本上是由马克思完成的，但是，恩格斯积极地参与了这个工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由恩格斯写成的，但是在他同马克思会见之后才准备付印的。因此，它们是马克思恩格斯各自思想独立发展的结果，又是他们共同研究和交流思想的产物。

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哲学论证占主要地位。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历史和经济的论证占主要地位；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以一般原则的形式表述的，但是具体的事实内容还不够丰富。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那些原理是借助于大量事实材料加以论证的，但是还不够概括；在《神圣家族》中，私有制和无产阶级被看作对立的统一。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关于私有制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和关于将由无产阶级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的思想贯穿全书。恩格斯全面地描述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处境，认为无产阶级不仅是社会上最受苦最受压迫的那一部分，而且还是争取摆脱资本压迫和资本剥削的社会上最革命的那一部分。

《神圣家族》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两部著作提供的分析和材料，是各有侧重和相互补充的。

## 第一节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形成中的地位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恩格斯自1842—1844年秋在英国生活的21个月期间，进行大量调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极其宝贵的成果。这部著作是从恩格斯原计划撰写的《英国社会史》中的一章独立出来的一部专著。它是恩格斯回到德国巴门以后，于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写成的。1845年5月由出版商奥·维干德在莱比锡出版。

从1842年11月移居英国的时候起，恩格斯就非常注意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1843年秋天，他着手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考察社会经济状况方面。恩格斯常常利用周末时间到其他城市实地考察，进行调查研究。他走访了曼彻斯特、伦敦和里子等许多重要的工业城市，深入到工人群众中调查工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情况，工人们在工厂、矿山和农村劳动的条件，收集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著作，社会报告书，工厂视察员和医生的证词，听取工人们的意见，研究工人们的疾苦、欢乐和要求，总结他们的斗争经验等等。当时英国宪章运动正处在高潮之中，曼彻斯特是这一运动的发源地和坚强堡垒。英国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促使恩格斯以鲜明的态度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放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投身到阶级斗争实践中去，积极参加宪章派的会议，并且在英国的社会主义刊物上发表文章。他满怀豪情地公开宣布："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9页）。

当时德国的社会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1844年6月，发生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这次德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最初

的阶级交锋，在国内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恩格斯回到巴门以后，积极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他走访了许多城市，和各地的社会主义者取得联系，并经常在为建立工会而召集的大会上发表演说。对当时正在蓬勃开展的工人运动，恩格斯感到非常高兴，同时也意识到给这一运动提供理论武器的任务非常紧迫，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1845年1月20日，他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人们的情绪已经成熟了，就要趁热打铁。我的关于英国的著作当然也不会不起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8页）。恩格斯认为，在英国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和受压迫的根本原因以及它将会产生的后果，在德国和其他国家也同样地存在着。因此，揭露资本主义在英国造成的灾难，也有助于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灾难的揭露，以便"直接推动我们去改造这个'丑恶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9页）。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是现今社会一切社会运动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为了给社会主义理论，同时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pro et contra（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空想和臆造，研究无产阶级的境况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8页）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提出科学理论；并不是由于他们是什么"先哲"、天生的"圣人"，而是他们积极参加阶级斗争，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研究，总结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经验的结果。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关于国家理论等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这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得出了资本

主义必然要为社会主义代替，而无产阶级则是实现这种革命的社会力量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还没有从经济上进行系统地论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这个任务。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第一部划时代的伟大著作，马克思高度地评价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马克思发现，在这部著作中，他的关于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思想也得到了表述。这个思想是恩格斯根据个人的亲身感受和科学研究独立地提出来的。

贯穿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著作中的一个中心问题，是阐述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恩格斯通过分析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和基本矛盾，阐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驳斥一切调和阶级矛盾的谬论，使工人群众认识到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摆脱受奴役和受压迫的处境。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用唯物辩证法观点分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恩格斯考察了近六十年来英国工业发展的历史，论证了无产阶级的起源。对产业革命作出科学分析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重大贡献。恩格斯指出，产业革命的最重要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产业革命仅仅看作是标志资产阶级财富增长的技术进步。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只片面地看到产业革命带给小生产者破产和工人贫困的后果，并幻想阻止大工业的发展，保存小商品经济。恩格斯用唯物辩证法观点全面地分析了产业革命的意义在于产生了无产阶级，使英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英国无产阶级的历史是从十八世纪后半期，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又引起了市民社会的全面变革，引起了社会巨大变化。农业中逐渐出现

了无产阶级，手工业被大机器生产所代替，作坊为工厂所代替，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战胜了手工劳动，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已经被大工业所消灭，从他们当中一方面分化出富有的资本家，另方面又分化出穷苦的工人。社会上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居民中间的一切差别都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已经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形成与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联系起来，他着重指出，英国“现在……(由于产业革命——作者注)完全是由另外的阶级组成的，而且和过去比起来实际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习惯和另外需要的另外一个民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5—296页）。恩格斯又以大量材料为根据，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对峙的基本阶级关系作了精辟分析。他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敌对的各方面已渐渐分成互相斗争的两大阵营：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同上书，第419页）。

恩格斯把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看作是生产变革的产物。他说：“我们来看一看，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的工人本身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在体格方面、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的面貌是怎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79页）他认为，工人的体格、智力和道德的状况也是生产性质根本改变的结果。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已经指出，人是环境的产物。但是，他们不能解释环境本身为什么发生变化。这些唯物主义者不能正确地回答提出的问题，便在死胡同中兜圈子。他们说，人是环境的产物，而环境是由人改变的。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以对工人阶级起源的分析为例，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说明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的环境是如何由生产中的变革所造成时，已经冲出了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死胡同，走上了唯物史观的道路。

生产中的变革创造新的环境，即新的生活条件和新的社会关系，从而从原先的阶级中创造新的阶级。这方面在工人阶级身上表现得非常清楚。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6页）英国工人阶级既然因为生产中的变革而成为另一种人，便要求按照符合劳动者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的原则去改变社会环境。恩格斯克服了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错误，全面正确地解答了环境与人的相互关系问题。

在此以前，恩格斯把工厂立法斗争看成是思想斗争或者是仁爱慈善的人们和残酷无情的资本家之间的斗争。而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则把工厂立法斗争看作阶级斗争。在详细阐述这种斗争的历史时，恩格斯说明了唯物史观的下述原理。第一，资产阶级的私利不允许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作多少重大的让步；第二，用合法斗争和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不能使工人阶级对自己的状况作急剧的改善。出路只有进行社会革命。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指出立法权、行政权和审判权是怎样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恩格斯以1834年议会通过的济贫法为例，证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是极端残酷的。在此书中，恩格斯已经指出，英国国家政权——当时最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是怎样保卫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按照资产阶级意志办事的。因此，《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使恩格斯非常接近达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运用他本人到工人栖身的污衢小巷中所实际观察到的第一手材料，同时利用有关阐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切著作和官方文件，详细地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指出在资本主义社

会中，“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04页）。“穷人是没有人关心的；他一旦被投入这个陷人的漩涡，就只好尽自己的能力往外挣扎。如果他侥幸找到工作，就是说，如果资产阶级发了慈悲，愿意利用他来发财，那末等待着他的是勉强够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的工资；如果他找不到工作，那末他只有去做贼（如果不怕警察的话），或者饿死，而警察所关心的只是他悄悄地死去，不要打扰了资产阶级。”（同上书，第305页）恩格斯义正辞严地控诉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控诉了资本主义的罪恶，鞭笞了资产阶级。同时，阐述了无产阶级如何由于本身所处的非人的生活状况，而同资产阶级站在毫不调和的对立的地位。工人阶级所处的这种经济地位必然会推动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为自身的解放、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唯一可能的出路是暴力革命”，并且满怀信心地预言：“这个革命是不会让人们长久等待的”，“资产阶级脚下的地基就这样逐渐地动摇起来，总有一天，资产阶级的整个国家的和社会的建筑物将连同它的基础一同倾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48页）恩格斯根据大量事实材料，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除了社会主义以外，别无其他出路。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第一次根据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精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是保守的，它的利益和现存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不再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头，在任何前进运动中都是一具僵尸。代表历史前进的社会进步力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恩格斯表示坚信，未来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因为对社会起推动作用的是无产阶级，“他们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是和一切有产阶级对立的阶级，同时也是国家力量所系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

级。”（同上书，第529页）恩格斯强调指出了只有英国工人运动中分裂的两派联合起来，形成新的工人政党以后，工人阶级才能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他说，“只有在实现了这一点（即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两派联合——作者注）以后，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那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也将向前推进，这种发展将有利于这个新生的政党”（同上书，第527页）。从这里可以看出，恩格斯已经有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它如何通过工人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以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的相当完整的表述。这是恩格斯对正在形成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极为重大的贡献。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着重研究了英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并以这个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例，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一系列规律。恩格斯用大量材料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不断重复，以及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剥削的日益加重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第一次从经济上论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所以，马克思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给予很高评价，并且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多次引用恩格斯这部著作，还建议恩格斯撰写该书的续篇，要一直叙述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恩格斯的一部早期著作。因此，必然留有早期著作的一些痕迹，它还不是一部完全成熟的著作。正如恩格斯自己在1887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美国版而写的附录中所说的那样：“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

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7页）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例如，他还同马克思一样，没有解决“劳动力”商品化问题，还认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而不是“劳动力”。《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一定发展阶段的状况。

## 第二节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1845年春天，在恩格斯快来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时候，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必须制定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序言中已经作出声明，要从正面来发挥自己的哲学和社会学的观点，同时批判现代哲学和社会学。当恩格斯来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时候，马克思已经能够梗概地向他叙述自己的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他们决定全面地制定这个新世界观，来对抗德国哲学界代表人物的唯心主义观点。后来，恩格斯在回忆这次会晤时写道：“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92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是当时马克思为着“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而写的一个笔记。它收录在马克思的1844—1847年笔记本中，是马克思专供自己研究用的，生前没有公开发表。后来，由于马克思又有许多更为重要的任务，因此，并没有把这个提纲进一步加工，写出一部哲学专著来。为了编辑上的需要，恩格斯曾经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于1888年把它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附录，第一次公诸于世。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共只有十一条，全文不到1500字，但内容极其丰富，思想非常深刻。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极为珍贵的财富。恩格斯称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08—209页）。

1845年春，当马克思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候，西欧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固有矛盾不断激化，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发展，在斗争中无产阶级日益显示出自己的巨大作用。为了推动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迫切需要创立无产阶级自己的科学世界观作为行动指南。但是，在德国黑格尔哲学解体以后，哲学上的最高成就就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转变起过巨大作用，但是，当马克思彻底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以后，就逐渐认识到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仍然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并没有摆脱十七、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因而不可能成为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这样，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实践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就提出了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批判费尔巴哈在理论上的错误，克服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与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用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来指导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是马克思为完成这一任务而作的第一次尝试。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评价是过高的。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马克思进一步清算了自己过去的哲学信仰，划清了与费尔巴哈哲学的界限。他不仅抛弃了以前对费尔巴哈的过高评价和费尔巴哈的

一些术语，而且第一次从根本上批判了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这说明，原来推动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为他提供思想理论武器的费尔巴哈哲学，已经成为马克思思想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于是，批判费尔巴哈就成为马克思发挥自己理论的主要形式。他终于最后离开费尔巴哈这个中间环节，进入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阶段了。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马克思开门见山地指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都是直观的唯物主义。他们的根本缺陷就是不了解人的实践的批判活动，特别是革命实践的意义。马克思说："从前的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事物、现实、感性"是费尔巴哈和其他旧唯物主义经常使用的一些术语，都是指能够被人感觉到的客观世界、客观事物，既包括客观存在的各种事物，也包括客观存在的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现实、感性，是指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种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一种是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在这两种关系中，前一种关系是主要的。因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建立在对客观世界改造的基础之上的，离开人对自然界和社会改造的实践活动，人们就不能认识自然界和社会。但是，马克思以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者都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由于不了解实践活动在人们认识中的作用，因而，他们在考察"事物、现实、感性"即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时，排除了实践的因素，抽掉了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而只剩下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者，在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坚持了唯物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作用于

人的感官而产生认识。但是，他们只承认客观世界对人的作用，而不承认人对客观世界的反作用，把主观对客观的反映，看成是消极的、直观的象照镜子式的反映。费尔巴哈就说过："意识是一面镜子。"（《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64页）他们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消极地观察事物，只看到客观世界是人们认识的对象；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懂得人们能够积极的能动的改造世界，不懂得客观世界在作为人们的认识对象以前，首先是人们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唯心主义者（比如黑格尔）就钻了这个空子，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又把它过分夸大了，把世界的发展归之于人的意识或精神的"自我活动"。

与他们相反，马克思十分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和意义。对于客观世界，马克思首先把它看作是人们改造的对象，然后才把它看作是人们认识的对象；对于人，马克思首先把他看作是改造世界的主体，然后才把他看成是认识世界的主体。他认为，离开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的实践活动，人就不可能有任何认识。马克思认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把它导入唯物主义哲学。这就克服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也克服了唯心主义的片面性错误。为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体系奠定了基础。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二条中，马克思指出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的深刻思想。

一切唯心主义者都否认客观真理，因此，他们都否认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认为，没有任何理论前提的直接存在只有纯存在，它不需要任何证明。旧唯物主义者虽然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但是，他们对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的见解则是完全错误的。比如，费尔巴哈有时把个人的感性直观当做认识真理的标准；有时把大家的共同意见作为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不论唯心主义者还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

者，都否认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与此相反，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这就是说，离开人们的社会实践来谈论认识的真理性问题都是错误的，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马克思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作为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克服了费尔巴哈和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和一切唯心主义的错误，从而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哲学领域中所完成的伟大革命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三条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在人和环境关系问题上的错误。费尔巴哈和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及其继承者——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等人，根据客观决定主观的唯物主义原则批判了唯心主义，并且正确地指出，人的思想和行动是被客观环境所决定的。但是，这种唯物主义是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他们看到了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却没有看到人对环境的改造作用。他们非常强调教育对人的决定作用，却看不到人能够积极改革教育。他们从教育万能论出发，把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伟大人物，他们是天才的教育者，一部分是无知群众，他们是天生的被教育者。由此他们陷入了只有依靠少数天才人物去教育无知的群众，才能使人类获得解放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淖之中。

马克思非常尖锐地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错误。他指出："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页）马克思认为，根本没有什

么天生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分。教育者绝不是什么天生的天才人物，教育者本人也是必须受教育的。教育者本人如果不受教育，那他就根本不可能对别人进行教育。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不仅改造了环境，而且改造了人类自己，提高了认识，受到了教育，然后又回过头来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因此，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这个统一过程的基础是社会实践。人民群众应当以自身的革命实践活动去改造客观世界，而不能希图一个什么伟大人物从上面来改造社会，把幸福恩赐给大家。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四条中，马克思首先肯定了费尔巴哈对宗教批判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费尔巴哈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

费尔巴哈在反对宗教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用生动的事例和严密的逻辑，驳斥了“上帝创造世界”的谬论，并正确地指出：不是上帝创造了人类，而是人类自己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费尔巴哈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为人间世界，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的基础，从而揭去了宗教有神论的神秘外衣，奠定了无神论的基础。

但是，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有很大局限性，他没有进一步揭示出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消灭宗教的正确途径，因而他没有也不可能彻底粉碎宗教和消灭宗教。马克思指出：“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页）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克服了费尔巴哈的局限性。他深刻地揭示了宗教产生和存在的社会阶级根源：“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同上书，第4页）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是和私有制、和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和剥削阶级对

宗教的支持和利用分不开的。

马克思指出了消灭宗教的途径："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同上书，第4页）这就是说，为了消灭宗教，只进行理论上的批判是不够的，首先应该揭示社会的阶级矛盾，并进一步分析和认识这些阶级矛盾，然后再运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解决这些阶级矛盾，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五条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批判了强调抽象思维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坚持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唯物主义。他正确地说明了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看到了人的思想和行动要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费尔巴哈是一个强调感性直观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因此，他不懂得人类实践活动的意义。他不把感性当作人类的实践活动。所以，他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看不到人对环境的反作用。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六、七条中，马克思阐明了新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对人的本质问题的了解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错误观点，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理论。

费尔巴哈尖锐地批判了宗教有神论，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用人的本质去说明神的本质，把神学溶化为人类学。他反对神学家把神作为研究的对象，主张把人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因此，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本主义哲学。费尔巴哈强调指出，人本主义研究的人，不是唯心主义讲的那种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肉体的人。但是，他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是错误的。他认为，人的本质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孤立的、个别的人，不管是作为道德实体或作为思维实体，都未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85页）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的本质并不是具体地体现在各个个人身上，而是抽象地存在于人和人之间的共同性、统一性之中。这就是思维、意志和情感，这就是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宗教感情。

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是错误的，主要有如下两点：

第一，他不是具体地历史地考察人的本质，而是抽象地孤立地考察人的本质，他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这个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就是人类本质的代表。这个人只有肉体和思维、意志、情感。他既不属于任何社会、也不属于任何阶级。

第二，他不是用人的社会属性去说明人，而是用人的自然属性去说明人。因此，他不是把人当作一个社会的人，而是把人当作一个自然的人。把人了解为一种具有理智、意志、情感等理性的生物，把人的本质了解为人人都有的理智、意志和情感等这一类理性的东西。

马克思认为，理智、意志和情感虽然是人类每个个体都具有的特点，但是，它们并不能说明人的本质。因为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有着不同的理智、意志和情感。他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马克思认为，人不是一种自然动物，而是一种社会动物；人不是脱离集体而独立存在的，而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进行生产劳动。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必须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逐渐结成了家庭、社会、阶级、国家等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正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了人的本质。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关系突出地表现为阶级关系，人的本质主要是阶级的本质。因此，我们在说明人的本质时，应当把人当作整个社会关系中的一分子去考察。如果离开一

个人的社会关系抽象地考察他的理智、意志、情感，那就不可能正确说明人的本质。在这里，马克思已经运用唯物主义原则来理解人类社会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的建立，标志着马克思已经完全摆脱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八条中，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在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错误。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由于不了解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意义，因而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说明理论的本质，不能正确地说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就是说，社会实践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而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和各种社会理论都是被社会实践所决定、并为社会实践服务的。象唯物主义等正确地反映现实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理论，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我们可以在社会实践中找到它们的根源。即使是错误的理论，如宗教和唯心主义等也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由当时人们所处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当时人们的社会实践水平决定的。因此，必须由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人们的社会实践水平来加以说明，而不能由社会意识或社会理论本身的特点来解释。

在这里，马克思关于理论本身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思想，为后来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打下了基础。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九条中，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者由于不了解社会实践活动的意义，因而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说明社会本质的错误观点。

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只是把处于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中的人，作为孤立的单个个人来考察，而不能把他们当作社会的人、阶级的人来考察，因而把社会看作是由单个个人组成的

机械的总体。因此，他们在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时候，至多只能看到少数杰出人物的个人的动机和活动，只能把社会历史看作许多偶然事件的堆积，而看不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能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条中，马克思揭示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社会阶级根源。他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即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用它来说明旧唯物主义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同时，马克思也指明了他的新唯物主义的社会阶级根源。他说："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同上书，第5—6页）所谓"社会化了的人类"是指现代的无产阶级。这样，马克思就揭示了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说明了新唯物主义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从而明确地阐明了新旧唯物主义根本不同的社会阶级基础和阶级本质。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中，马克思扼要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前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领域中所作的革命变革的实质。马克思以前的旧哲学，不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都脱离实践，根本上把实践排斥在他们的哲学之外，他们至多只能给自己提出解释世界的任务，没有也不可能给自己提出改造世界的任务。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实践作为自己哲学的中心问题，正确地解决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第十一条是整个提纲的总结，在提纲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有一个形成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到

1845年秋和1846年春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正处于这个发展过程之中。它在内容上已经包含了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阐发的许多思想的萌芽。

在马克思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候，他已经在一些主要点上完成了向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这里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人的本质问题上克服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费尔巴哈把人看作生物学上的人，抽象的人，非历史的人。因此，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存在物"，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针对这种观点，马克思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原理。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随着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和生产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变化而变化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是不存在的。这样，马克思就把唯物辩证法应用来理解人类社会，这就是说，把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奠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第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抓住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十分强调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及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作用。关于实践的观点象红线一样自始至终地贯穿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观点应用于认识论，克服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把实践观点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唯心史观；把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看作人类独有的特点，与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

当然，马克思强调社会实践活动的意义，并不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首次提出来的。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

就强调哲学家要参加实际斗争。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已经论证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解决理论上的难题是实践的任务，而且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实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以上的思想基础上，第一次把实践观点当作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范畴。它不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而且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这就把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各个组成部分统一起来了。

马克思的这些天才思想在以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中得到了完善和进一步发展。

# 第八章

# 《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费尔巴哈和德国思辨哲学的唯心史观，全面制定和系统阐述唯物史观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是马克思恩格斯继《神圣家族》以后，共同合作的又一部哲学巨著。它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中，是一部最重要的著作。

这部著作共分两卷，第一卷的主要内容是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的哲学观点。第二卷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真正社会主义"的各种各样的代表。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清算了从黑格尔到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彻底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特别是他的唯心史观，批判了"真正社会主义"和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并且全面制定和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第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恩格斯在四十年以后还认为，这是一部无比大胆的著作，"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4页）。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背景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从1845年春天开始酝酿，到1847年春天全部完成，前后大约花了两年左右时间。该书的主要部分是在1845年11月至1846年5—6月间完成的，用了约半年时间。

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马克思后来谈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情况时指出：“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4页）

当时，“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这样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潮，严重地阻碍了工人运动的前进。摆在马克思恩格斯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彻底批判这些反动思潮，清除工人运动的障碍。

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是指莫泽斯·赫斯和卡尔·格律恩，奥·吕宁，海·克利盖等一些小资产阶级著作家。马克思恩格斯经常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个称号讽刺他们。他们把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混杂在一起，使社会主义学说带上了抽象的、脱离实际的空想的性质。他们抛弃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积极因素，宣扬费尔巴哈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把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尽管他们也批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却用小资产阶级眼光来看问题，对资本主义发展心怀恐惧，害怕和反对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他们反对通

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主张阶级调和，醉心于社会慈善事业和社会改良措施，主张用超阶级的伤感主义的爱的说教来实现人类解放。他们恶毒攻击共产主义制度是“粗暴的”，不能使劳动人民摆脱贫困，是社会衰落的结果。

“真正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否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用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领导力量以代替无产阶级。1844年，赫斯和格律恩等在德国科伦建立了“共产主义俱乐部”，并且通过《社会明镜》、《威斯特伐利亚汽船》、《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等报刊，大肆贩卖“真正社会主义”的货色。于是，“真正社会主义”象瘟疫一样，在德国“有教养的”人们中传播开来。从1845年起，“真正社会主义”思潮在法国和英国的正义者同盟中也开始泛滥起来，严重地危害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德国反动政府非常赞扬“真正社会主义”，并利用它来反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麦克斯·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是德国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变种。施蒂纳原名施米特。青年时期曾研究过哲学和神学。在柏林一所中学当过教员，参加过青年黑格尔运动。他一生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是一个失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个人奋斗、唯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他是德国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代表人物。1844年11月，他出版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这是他的代表作，也是青年黑格尔派最后的、最彻底的代表作。在这本书中，施蒂纳宣扬绝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他反对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利己主义，要求把实际的、实在的我作为出发点，变为世界旋转的中心。施蒂纳反对一切国家，主张建立无政府的、利己主义者的联盟。他宣称，“自我意识”是唯一的创造力量和评判各种现象的标准。他对一切事物都用纯思维的批判来否定，而把兴起的工人运动纳入纯思维的范畴。他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反对共产主义。他竭力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论证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施蒂纳的利己主

义和无政府主义尽管非常荒谬、非常反动，但是他的标新立异的外貌迷惑了一些人，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也曾一度表示佩服。因此，它对工人运动的危害很大。

当时，青年黑格尔派布·鲍威尔等在莱比锡办了一个《维干德》杂志，发表文章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把青年黑格尔派的攻击文章比做宗教徒对异教徒进行审判，因此，决定共同撰写一本《莱比锡宗教会议》的小册子，反对青年黑格尔派。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又给这一著作提出了另一项任务：把“以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样，就不仅要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而且还要正面阐发自己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为了肃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影响，揭露它们理论上的荒谬性和政治上的反动性，并且阐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用新的科学世界观武装无产阶级，推进工人运动。于是，奋力著述，写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产生，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彻底批判费尔巴哈，清算费尔巴哈的思想影响，与费尔巴哈哲学彻底划清界限。

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以后，就开始逐渐摆脱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见端倪。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走出了超越费尔巴哈的第一步。在1845年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第一次公开批判了费尔巴哈的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又进一步批判了费尔巴哈唯心史观，彻底清算了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至此，马克思恩格斯与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打算在威斯特伐利亚请企业家尤·迈耶尔和鲁·雷姆佩帮助就地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但是，由于反

动警察当局的阻挠和该书中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内容，使这两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突然拒绝资助《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在给巴·瓦·安年科夫的信中这样写道："您很难想象，在德国出版这种书要碰到怎样的困难，这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代表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的利益的出版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8页）从1846—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多次寻找出版商出版这部著作。但始终未能成功。因此，这部著作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能够出版。只有其中第二卷的第四章曾经在1847年《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8月号和9月号上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这部手稿落到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手中。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机会主义分子借口"著作没有写完"，"难懂"，不让公开出版。1924年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用俄文发表第一卷第一章（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1932年这部手稿才在苏联第一次全文发表。1955年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3卷，我国根据此本译成中文。1962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又发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新的6页手稿，其中4页属第一章。苏联又重新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发表在《哲学问题》1965年第10—11期上。1966年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单行本。到目前为止，该书还有9张18页手稿尚未找到，有待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批判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进行了集中的深刻的批判。

## 一、彻底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

《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都贯穿着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在第一卷第一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进行了集中的彻底的批判。这一章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最重要的部分。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曾经指出，费尔巴哈"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7页）这个没有做的事情就是继续用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认识人的社会本质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也就是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特征，"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0页）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观上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和对人的问题的重视，把神学归结为人学，这是他的历史贡献。但是，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费尔巴哈进行了批判，在这里又作了进一步的批判。

首先，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直观性的错误，揭露了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认识论根源。费尔巴哈强调从人出发，但是对人诉诸感性直观（对事物的一种消极观察，有静观之意），他不了解实践活动对人的认识的意义；以直观性代替实践性。费尔巴哈提出的直观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普通的直观；哲学的直观，即认识事物本质的最高直观；介于普通直观和哲学直观之间的直

观，这种直观可以认识事物的变化；科学家的直观，自然界的秘密只有通过科学家的直观才能达到。费尔巴哈认为，有一些自然界的秘密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时指出，自然科学不是靠科学家的直观，而是依赖于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他们说："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50页）

费尔巴哈不了解人的认识对象也是实践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的认识不是认识人活动以外的对象，人认识的是自己活动的结果，即已经经过人的认识活动改造了的对象。实践活动不仅改变人的认识，而且改造了人的认识对象。离开实践活动就不可能达到正确的认识。他们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人们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商业的交往方式，并且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他们说："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依靠商业的结果才在我们这个地区出现。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依靠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可靠的感性'所感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页）

其次，批判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错误观点。关于人的本质问题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核心。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进行了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又联系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作了进一步批判。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对人的理解是很肤浅的，他们把人看作自然界的生物，甚至把人比作一架机器。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感性对象，人的本性是受人的感情本性制约的，在这方面费尔巴哈比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进步得多。费尔巴哈反对把上帝作为研究对象的神学和反对黑格尔把绝对观念作为研究对象的唯心主义，提倡把人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人本学，把现实的人作为哲学的基础。这也是一个进步。但是，费尔巴哈所研究的现实的人只是肉体的人，只是有感情、有意志、有欲望的人。他把人的本性局限在人的感性范围内，没有重视人的感性活动，忽视人的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费尔巴哈所讲的人是任何历史，任何阶级的人所共有的共同性，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因此，费尔巴哈所讲的人仍然是抽象的人，在现实中是很难具体把握的。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的人的本质、特征是不同的。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第三，批判了费尔巴哈从抽象的人演义出来的共产主义观点。费尔巴哈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上，需要彼此交往，不能孤立生活。你只有在满足他人需要的情况下，你自己才可能得到满足。因此，人们要互相友爱，这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的共产主义纯粹是从抽象的人演义出来的空洞范畴。它没有任何科学内容，与科学共产主义风马牛不相及。这种共产主义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社会的束缚，亦可以为资产阶级所接受。

马克思恩格斯还批判了费尔巴哈忽视政治和阶级斗争的错误。他们指出，费尔巴哈没有批判现存的社会关系。他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当然这是办不到的。更重要的是他

不懂得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48页）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和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把自己的唯物主义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把自己的共产主义称为实践的共产主义。这既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根本任务就是改造世界。同时，这又同费尔巴哈和形形色色的所谓共产主义划清了界限，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思想。

## 二、彻底批判施蒂纳的唯心史观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对麦克斯·施蒂纳的批判，地位非常突出。通过对施蒂纳的批判，对德国思辨唯心主义，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作了彻底清算。

麦克斯·施蒂纳的利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唯心史观，他为了给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和利己主义提供理论根据，就任意编造历史，大量引证圣经，宣扬对精神的崇拜及精神统治世界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的顺序，对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批判。把该书讽刺地称为"圣经"，并用圣经里的各种名称来讽刺该书中的各个部分。例如，把"人"和"我"两篇变为"旧约"和"新约"等。马克思恩格斯把批判的重点，放在对施蒂纳任意编造历史的剖析上，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德国思辨唯心主义典型的唯心史观。

施蒂纳认为，人类的发展如同个人的发展一样，是一个不断

地“自我发现”的过程，它经历着童年、青年、成年三个阶段。在儿童时期，人“企图洞察事物的底蕴或看看事物后面是什么，这时，人是唯实主义者”。在青年时期，人是唯心主义者，达到了意识自身的意识。但是，人对精神估计过高，没有达到精神与自我的同一。在成年时期，人完全意识到“我”的价值，是利己主义者，发现我是有形体的精神，把精神和我完全统一，从而达到了利己主义意识。

施蒂纳认为，古代是儿童时期，宗教统治的中世纪是青年时期，近代正是实现着由青年向成年的过渡。他发现了人的本质是利己主义。古代人是唯实主义利己主义，中世纪的人是唯心主义利己主义。近代人才是两者统一的真正利己主义。施蒂纳认为，历史应该向无政府状态过渡。他是第一个提出无政府状态的概念的人。他把这种无政府状态称为“人道自由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对于利已主义的我来说，都是不完善的存在方式。正如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把国家看得高于我一样，在“社会自由主义”中又把社会看得高于我之上，只有在“人道自由主义”中才抛弃了一切高于我之上的幻想（观念），直截了当地宣布“我把一切归之我”。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施蒂纳把人的现实发展归结于人的自我发现，这样就把现实关系变为意识关系，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施蒂纳所讲的人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而是抽象的人，他夸大了意识，用人的意识关系来说明人的物质关系和社会关系。同时，他撇开历史时代、民族和阶级关系，这样的人必然是抽象的人。实际上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施蒂纳关于人生阶段的全部虚构，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拙劣抄袭。这种关于人生阶段的全部虚构的原型，早就在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三部中出现过，而它的“各种转变”，也在黑格尔著作其他地方出现过。黑格尔在《精神哲学》

中，把人分为四个阶段，即儿童，青年，成人和老人。儿童处于自然和谐状态，尚未接触精神，没把主观和客观区别开来，还没有自己的精神、思想、意识，这是主客观直接的初级的统一，是必须扬弃的。在青年阶段，出现了主观世界，把主客观分开了，意识到了主客观的矛盾，因此，出现了幻想、理想。但是，黑格尔认为，青年具有主观精神，并把客观精神和主观精神对立起来了。这就决定了青年向成年过渡，即由主观精神向客观精神过渡。成年人认识了客观必然性，并且按照客观必然性办事，因此，成年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他顺从而不是破坏现存秩序。但是成年人还没有从精神阶段上升到主观、客观精神统一而达到客观精神，因此，成年人要向老年人过渡。老年人丧失了对活动对象的兴趣，但又习惯于活动对象，因此老年人最成熟、最富有经验，达到了在更高基础上的主体与世界的和谐，包含了全部人类发展的统一，老年人是整个人生阶段的终点。

黑格尔认为，儿童——肯定；青年、成年——否定，双重地设定自身；老年——否定的否定。黑格尔哲学中有一些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但是总的来说，思想是非常荒谬的。黑格尔还比较尊重现实，没象施蒂纳那样主观任意地砍掉一个阶段来符合自己的"理论"。施蒂纳拙劣地抄袭黑格尔，把黑格尔的人生四个阶段纳入他的三个阶段之中。施蒂纳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庸俗化了，变成简单的形而上学的推理。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施蒂纳历史观的唯心主义实质。他们说，施蒂纳把抽象的观点、思辨的观念变成了历史的动力，因此，把历史变成了哲学史，把思辨的历史当作现实的历史，这是施蒂纳和其他思辨哲学家一样所具有的最突出的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还深刻地揭露了施蒂纳哲学的阶级实质。他们指出："黑格尔总还算尊重经验世界，他把德国市民描写成他们周围世界的奴仆，而施蒂纳却把德国市民看作是这种世界的主

人，这确是德国市民连想也没有想到过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30页）施蒂纳把德国小市民的幻想当作人生。德国小资产阶级相当软弱，仅仅在思想上加入了资产阶级革命，他们不敢象英法等国那样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又要求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因此只能在幻想中来制造口号。施蒂纳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他正是把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人的现实混淆起来，把幻想当成现实。这就是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阶级根源。

## 三、批判黑格尔和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

黑格尔把历史看作是概念的运动，认为历史和自然界都是精神的外化。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认为，世界的本质是自我意识，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形式，开始是犹太教，后来是基督教，到了他们的时代，应该是一种自由主义。他们认为，主宰世界历史的是观念。整个世界是由精神统治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这种反动的唯心史观时，揭露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编造精神统治世界神话的三种手法：

第一，他们把统治的思想和统治者个人分开。如把忠、孝、仁、义等思想和地主、皇帝等个人分开。

第二，他们给统治思想一种秩序、某种自我规定即某种过程。例如，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自我意识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过程，有其内在秩序。因为概念本身有一种自我规定性。在发展过程中，它规定概念体现为犹太教、基督教和自由主义。

第三，他们为了使自己创造的观念成为真实，便使这种观念人格化，使它回到哲学家那里，使人认为是哲学家创造了世界，在德国就是青年黑格尔派创造了世界。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制定和系统阐述唯物史观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第一次全面地制定和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被唯心史观所忽视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把它作为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来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的经验的方法来确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页）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物质生活条件"的科学概念。这就使他们严格地区分了社会的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并把精神现象归结为物质现象，把思想关系归结为物质关系，从而与一切唯心史观划清了界限。

其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制定和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一个最重要的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30页）这就是说，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了社会意识的起源和发展，论述了物质对意识的根源性。指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产物，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无论是正确的意识还是错误的意识，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例如，德国思辨唯心主义哲学这样荒

谬的思想也有其现实根源，它是现实生活中社会关系的狭隘性造成的。能够揭露错误思想的社会根源，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比旧唯物主义高出一筹的地方。

由于批判德国思辨哲学的唯心史观和制定唯物史观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着重强调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忽视或否认意识的反作用。比如，他们指出："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同对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其他的东西。它不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36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存在这个概念具体化了。社会存在就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由各种因素构成的。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和人口繁殖都是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起决定作用的，乃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这是因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首先就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就必须生产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34页）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和研究社会物质生产活动，得出了必须从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中去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的重要结论。这一伟大发现，奠定了唯物史观大厦的基石。

再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从本质上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了生产力的概念，马克思第一次赋予它全新的含意。生产关系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特有的概

念，这一概念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的，表述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辩证运动的客观规律。这个客观规律的发现宛如一颗新升的明星，照亮了整个正在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体系，使人们能够表述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它是一种改造自然的活动，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人们为了进行生产活动，必须联合起来结成一定的交往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力水平决定人们的交往关系。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对生产力也有反作用，制约和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定的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在一定时期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它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并构成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其后又逐渐变为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1页）。历史上的各种所有制就是这样互相更替的。尽管它们具有必然性、进步性，但又都是暂时的、相对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交往关系和社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政治斗争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3、83—84页）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反动的社会制度，是新的生产力与旧的交往形式之间的冲突，并由前者战胜后者的结果。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决不是偶然现象的堆积，而是一个具有客观规律的历史过程：人类社会发展不需要什么"第一动因"，不需要什么精神的创造者，而是一个客观的、不

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人类历史经历了下述几种所有制的形式：

第一，部落所有制。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解体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原始共产主义所有制当作第一种形式，是因为，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所有制实际上是指私有制。

第二，古代社会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这是指奴隶社会所有制。

第三，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这是指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封建社会结构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等级结构表现得十分明显。

第四，资本主义所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必然要被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代替。

还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0、41—42页）他们认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冲突决定历史的发展，是通过交往关系即市民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来实现的。他们所说的市民社会，主要是指人们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所发生的物质关系，以及直接从生产和交换过

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的分工发生变化，人们的劳动资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发生变化，人们在生产、交往中的物质关系、人们的经济组织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国家及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发生变化。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市民社会称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页）。他们要求把“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3页）

马克思恩格斯用“交往方式”、“交往形式”、“交往关系”等术语来表示“生产关系”这一概念。用“市民社会”这一术语来表示“社会经济基础”这一概念。这些术语还不够精确，但是，在这部著作中，他们已经揭示了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基础这些概念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特征。为以后制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这些科学概念奠定了基础。

另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还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国家和社会革命的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和生产相对的不发展、和有限的生产力相联系的。阶级是随着社会分工而出现的，分工促成了人们对劳动资料、工具和产品的不同关系，把人分成不同的阶级。个人屈从于阶级。阶级决定它的成员的生活状况、思想状况和命运。他们认为，过去的历史始终存在阶级斗争。在古代是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在中世纪是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不是永恒的，而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交往方式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普遍的程

度，以至私有制变成了它们的桎梏而必然要消灭之时，阶级就会消灭。大工业就提供了这样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把阶级的形式和发展同物质生产本身的发展相联系，第一次科学地指出了消灭阶级的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还第一次探讨了国家的起源问题。他们指出，国家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矛盾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社会分裂成为对立的阶级，被统治阶级感到自己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相矛盾，统治阶级则把本阶级的利益说成是全社会的利益，于是国家就以公正的全社会的利益的代表的身份出现了。只要阶级统治还存在，国家就会存在下去。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都是各个阶级之间为维护其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国家的实质，特别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实质，说明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所以国家是一种脱离社会并且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它和阶级一样，不是永恒存在的，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也必将消灭。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的著名论断。这是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必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在物质资料生产方面被统治的阶级，也同时缺乏从事精神生产的资料。例如，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忠、孝、仁、义等观念，而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时期则是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剥削阶级思想家为了掩盖其阶级本质，总是竭力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说成是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的唯一合理的思想。而历史上的历次革命，又不过是用一种剥削制度去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因此，这种虚假的普遍性的外观，便得到了不断的修缮，使它在形式上越来越抽象。只有彻底消灭了阶

级，实现了共产主义革命，这种现象与本质的分裂才能结束。显然，在这里已经萌发着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关于两个彻底决裂的深刻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社会革命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性。他们指出，社会革命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矛盾的产物。社会革命的任务是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打倒过时的交往形式的国家和法。社会革命的锋芒是指向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因为这些人维护生产现状，只有社会革命才能推翻统治阶级，建立新社会的基础。他们还揭示了私有制的对抗性矛盾越来越尖锐化，而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上达到了最高点。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在资本统治下，只是承担社会的一切重担，而不能享受社会福利。于是，无产阶级必然产生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意识。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把无产阶级同共产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第一次描述了无产阶级将要进行的共产主义革命的特点，就是要“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6页）。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指出，社会革命需要物质基础，社会变革要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各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4页）据此，他们深刻地批驳了青年黑格尔派否认革命需要物质基础的唯心主义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一步阐述了关于无产阶

级革命的学说。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彻底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唯物史观，对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提出了一些深邃的预见，论述了它的基本特征。他们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看作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人类最高的理想。在那里，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消灭了私有制，财产属于所有的人，完全由人类支配生产工具。在那里，完全消灭了旧式分工，消灭了三大差别，消灭了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自由劳动”、异化劳动，每个人的才能与天资得到了充分的和全面的发展。在这个社会中，克服了社会的狭隘性，人们将自觉地利用客观的经济规律，从而有能力支配生产、交换和自己的社会关系，从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产品的分配方式也由按劳分配变为按需分配。

《德意志意识形态》还对从古代到近代的哲学史作了简要的评述，对唯心主义美学观作了批判，阐述了唯物主义美学观，科学地说明了艺术和每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条件及政治等的依赖关系，科学地说明了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同社会的物质生活及人们的劳动紧密相联系的，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基本原理。

## 第四节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伟大意义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和德国思辨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制定和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一部哲学巨著。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部成熟的著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形成。因此，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主要有下述三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面制定和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

1844——1846年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重要著作，使他们在《德法年鉴》时期的思想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这些著作表明，他们在同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斗争中，如何“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38卷，第386—387页）。

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前的著作中，关于唯物史观仅仅是一些零星的个别的观点，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的历史观。关于唯物史观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原理，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原理都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明确提出来的。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思辨哲学的唯心主义，一般地说明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还没有明确地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接近生产关系的思想。但是，还没有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因此，《神圣家族》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唯物史观的体系。还不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熟著作。

《德意志意识形态》就不同了。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这些重要的发现使他们能够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全面地制定唯物史观，系统地阐述阶级、国家和社会革命等其它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虽然有一些术语、概念还不够精确，但是已经形成了唯物史观的完整体系。

第二，《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清算了过去的哲学信仰，与旧哲学实行了彻底决裂。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彻底完成了对整个德国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彻底完成了对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批判。他们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深刻地研究了政治经济学，把唯物主义原则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唯物史观。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提出和使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科学概念，同唯心主义历史观对立起来，彻底划清了两者的界限。他们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3页）。从此，唯心主义被从它的最后避难所即社会历史领域内驱逐出去了。

第三，《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彻底完成了对共产主义的理论论证。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的形成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具有直接的意义。法国和德国的共产主义，英国的宪章运动，现在不再是一种偶然发生的现象了。这些运动现在已经被看成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运动，被看做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

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少地发展了的形式，被看做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是这一斗争和过去一切阶级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分析，得出了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结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页）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不再把共产主义看作一种道德的要求，而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阐明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且进一步阐明了作为埋葬资本主义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为科学。

# 第　九　章

# 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公诸于世

从1846年夏《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成，到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趋向成熟，并且日益和工人运动实践紧密结合，最后公诸于世。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方面，由于唯物史观的确立直接推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工人群众，从事工人运动，指导工人运动，进一步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另一方面，随着欧洲革命形势的逼近，正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无产阶级，也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是他们的革命领袖。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把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开始着手为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比利时建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他们改组了《正义者同盟》，创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当时，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从思想理论上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他们非常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武装工人阶级，排除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干扰和破坏。因此，他们在从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彻底批判了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等影响工人运动发展的反动思潮。通过这些斗争，马克思恩格斯也正面阐明了自己的新世界观。1847年马克思发表了《哲学的贫困》。1848年2

月，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正式公诸于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9页）

## 第一节　批判魏特林主义和德国真正社会主义，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

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使马克思恩格斯懂得，要使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提供决定性的主观条件，只有同迄今为止还支配着最进步工人的非科学世界观进行论战才能够实现。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内部坚决开展了反对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和德国真正社会主义的斗争。

威廉·魏特林（1808—1871年）出身贫寒，早年当过裁缝工人。1835年，魏特林在法国巴黎参加流亡者同盟，后来转入正义者同盟，并成为该同盟的领导人。他长期住在法国、英国和瑞士等国，过着流亡生活，从事宣传鼓动工作。他的主要著作有：《现实人类和理想人类》（1838年）、《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贫困人的福音》（1843年）等。

魏特林是一个空想共产主义者。他的历史功绩在于他指出了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他认为，要使病态社会复原，必须消灭私有制。他指出，不能等待有产者和统治者自行消灭私有制，必须依靠工人的斗争才能实现。他本能地预料到无产阶级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作用。魏特林主张建立一个人人劳动、产品平均分配、平等、和谐与自由的社会。但是，他认为，新社会制度是某些天才人物头脑中构造出来的，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他自命为是可以解救无产阶级的救世主。虽然他竭力主张用暴力推翻旧制度，但是却寄希望于流氓无产阶级和少数人的密谋活动来实现共产主义。他的空想共产主义在《正义者同盟》中有很大影响。魏特林这种空想的平均的共产主义是当时德国手工业工人的要求和愿望的理论表现，是德国手工业工人正在向无产者转化，现代无产者尚未最终形成的时代的产物。在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深入发展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新的科学世界观已经形成的情况下，这种共产主义就不仅显得十分陈旧、十分过时，而且成了工人运动发展的严重障碍。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充分肯定了魏特林的历史功绩，仍然希望团结他。马克思恩格斯邀请他到布鲁塞尔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并且十分耐心地帮助和教育他，希望他抛弃旧观点，接受科学共产主义，以适应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然而，魏特林固执己见，拒绝帮助，并且同真正社会主义者勾结起来，企图独霸《正义者同盟》，干扰和破坏工人运动。1846年3月30日，魏特林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上主动挑起争论，遭到马克思的坚决驳斥。1846年5月11日，当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对真正社会主义者克利盖进行原则性的批判时，魏特林竟然站起来为之辩解，并反对谴责克利盖的通告。这样，就导致了马克思恩格斯同他彻底决裂。

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德国面临的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只有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进行长期的多方面的斗争，才能实现最后的解放。魏特林坚决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制定的无产阶级的正确的策略。他认为，只要穷人理解了他的共产主义思想，立即付之行动，当时的封建专制德国就可以消灭私有制，建立平等、正义的“千年王国”，进入共产主义。他甚至攻击马克思主张工人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是要使自己富裕起来，或者至少“有权支配有钱的人”，是对于共产

主义信念的叛逆。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貌似革命实则有害的“左”倾思潮极其愤慨。他们认为，魏特林的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的，它迷惑于空想，而否定无产阶级解放的具体条件，脱离现实斗争的人，必然成为一个无知者。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经过科学论证的共产主义是建立在“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8页）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因此，它远远胜过了魏特林的“救世计划”。这就从世界观上划清了科学共产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界限。

“真正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海尔曼·克利盖（1820—1850年）。他原是费尔巴哈的信徒，是一个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侨居美国以后，在纽约德国侨民中组织《正义者同盟》支部，领导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集团”，主编《人民论坛报》。他大肆鼓吹伤感主义的“爱”的梦呓，反对科学共产主义，引诱当地德国侨民脱离革命运动。克利盖的理论和实践成了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主要危险，严重地阻碍着科学共产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因此，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召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主持通过了《反克利盖通告》的决议。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露了真正社会主义理论的反动性。克利盖把资本主义描绘成“利己主义”。他认为，“利己主义”产生出来的结果是“恨”。但是，只要“向妇女们呼吁”，“向出现的鼓动者呼吁”，“向财主们呼吁”，“用爱把人类联合起来”，就能最终导致“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克利盖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浪漫主义的批判，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的。这种批判既针对着资产阶级，也针对着无产阶级。他们指出，克利盖妄图把无产阶级用革命方式改造社会的学说，篡改为

关于“爱”的胡言乱语。这种胡说“大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以及在美洲的声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6页）。克利盖歪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及其产生根源，而空谈所谓普遍的人类之爱。其客观作用，就是要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还揭露了真正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克利盖把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同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混合起来。从而造成了“更高级”的混合物。他攻击法国社会主义者是有名无实的共产主义者，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先驱者的历史功绩，抛弃了过去的优秀文化遗产。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揭露了真正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唯心史观。克利盖认为，社会主义纯粹是从理性中产生的，现实社会的阶级对立，仅仅是理性的对立，而消除这一对立仅仅是理性的任务。他还认为，通过所谓普遍的人类之爱，就可以消除阶级矛盾，实现所谓“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克利盖的谬论时，强调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同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圣西门、傅立叶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评价。这就从世界观上划清了真正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界限。

1847年8—9月，《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发表了马克思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卷第4章。这篇文章批判了真正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格律恩的著作《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指出了真正社会主义的思想缺陷是：阉割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方面，在解释社会现象时极其无力，用“人的真正本质”这种抽象的词句来代替对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

通过反对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和克利盖、格律恩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奠定在现实基础之上，从世界观上划清了科学共产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界限，巩固了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为科学共

产主义世界观的传播和发展扫清了道路。

## 第二节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批判蒲鲁东主义，科学地表述新世界观

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真正社会主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就开展了与蒲鲁东主义的论战。这一论战及其重要成果——《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发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后来，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4页）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他出身于德国勃艮第一个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家庭，当过旅馆雇工，做过排字工人和校对员，与人合伙开过小印刷厂。他没有上过什么学，从排校的书籍中学到了非常庞杂的知识。1837年蒲鲁东写了一本《普通语法论》。1840年，他发表了《什么是财产》一书而出名。在这本书中，他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这样的名言。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蒲鲁东在揭露资本主义私有制方面的功绩，认为这本书是蒲鲁东“最好的著作”。同时也指出，蒲鲁东的这本著作是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批评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科学的历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41页）。

在法国巴黎期间，马克思和蒲鲁东有过交往，曾经对他作过许多争取工作。但是，这个愿望并未实现。他同真正社会主义者混在一起，同马克思越来越疏远。1846年春，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组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时，曾经希望蒲鲁东担任驻法国通

讯员工作，想通过他与法国工人建立联系。但是，5月17日，蒲鲁东从法国里昂给马克思写了一封长信，拒绝了马克思的建议，他在信中说："我认为，为了争取胜利根本用不着这样，因此，我也就用不着提出革命的行动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个轰动一时的手段不是别的，而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我对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经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的组合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换句话说，在政治经济学中，使财产的理论转过来反对财产，以便产生您们——德国社会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而我目下只称之为自由、平等的那种东西，……据我看来，用夕火把私有制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转引自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中译本，序言，第10页）这表明，蒲鲁东的立场与科学共产主义是完全对立的。

1846年8月，恩格斯受马克思和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托到巴黎进行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列宁指出，恩格斯在巴黎期间，"他主要注意的，是最重要的和当时最流行的社会主义学说，即蒲鲁东主义。"早在蒲鲁东所著的《贫困的哲学》一书出版之前，"恩格斯就对当时德国社会主义者格律恩所鼓吹的蒲鲁东那些根本思想，作了严酷无情的异常深刻的批判。"（《列宁全集》第19卷，第561页）恩格斯在巴黎对蒲鲁东的批判，对于后来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1846年底，蒲鲁东发表了《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他"运用经过粗暴歪曲了的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来论证一种奇怪的、完全不正确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企图用形形色色的先验的魔法来论证一种自由工人联合的新社会主义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69页）蒲鲁东在这部著作中，用娓娓动听的语言劝诱无产阶级接受通过和平道路去改造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他反对工人运动和政治斗争，反对共产主义。幻想

可以不触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就能消除资本主义发展中带有的种种残酷后果，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改革计划。当时，由于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大量小生产者纷纷破产，加入到无产者队伍中来。因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象瘟疫一般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工人中间广泛流行起来，这种反动思想严重阻碍着在工人运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

“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8页），马克思着手批判蒲鲁东。他在得到蒲鲁东新出版的著作《贫困的哲学》之后，仅用两天时间浏览了一遍。就给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驻巴黎通讯员、俄国文学家巴·瓦·安年柯夫写了一封信，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蒲鲁东社会学观点的局限性，并且概括地阐述了他自己所发现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同恩格斯共同制定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这里，马克思使用了确切的术语，不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样把生产关系称为“交往形式”，而是称为“经济关系”，“社会关系”，这封信实际上是《哲学的贫困》一书的纲要。

1847年1—4月，马克思集中精力写作《哲学的贫困》。6月15日，又写了一个简单的序言。这部著作于7月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印数为800册。马克思针对蒲鲁东的书名《贫困的哲学》，讽刺地把自己的这部著作叫做《哲学的贫困》，副标题是：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

在哲学上，《哲学的贫困》是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比他先前的著作更加深入地论证了唯物辩证法，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本质特征，进一步划清了唯物辩证法和唯心辩证法的界

限。

马克思首先揭露了蒲鲁东的方法论的错误。蒲鲁东企图把黑格尔的辩证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构造他的经济学体系。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体系的顶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页）但是，由于他不懂得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不了解科学地运用辩证法分析社会经济现象，必须先揭露现象本身所固有的实际矛盾，而人为地用政治经济学的抽象范畴凑成一些经济矛盾，结果把辩证法弄到了极其“可怜的程度”。蒲鲁东到处谈论“辩证运动”，谈论“矛盾”，但是他却认为，辩证法的本质在于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辩证法的任务就是要消除坏的方面，保存好的方面，而不是向新质的革命转变。显然，蒲鲁东不想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只是想消除商品生产的“坏的方面”。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语”，他的辩证法“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1页）。实际上，蒲鲁东仍然是一个形而上学者。

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唯心主义，阐述了辩证法的客观性质。蒲鲁东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制定的如分工、信用、货币等经济范畴当作研究的出发点，并把这些范畴看成是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源。他完全颠倒了经济范畴和客观经济过程的关系。蒲鲁东对价值论、分工和交换关系的理解具体地反映出他的学说的唯心主义实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加图等很早就对价值论作了研究，建立了劳动价值论。但是，蒲鲁东却把他自己的价值论吹嘘为最科学的。他把交换价值的起源说成是由于各个个人没有办法用自己的产品满足生活的多种需要，不得不向他人相约分工和交换产品，于是产品才变成了商品进行交换，才有了交换价值。蒲鲁东不用生产过程中社会分工的发展来解释人类需求的多样化，而是从人类主观需求的多样化中引申出分工，把社

会生活的客观过程与主观需求完全弄颠倒了。蒲鲁东还认为，经济范畴是“社会天才”的头脑的产物。从此出发，他力图由一个范畴引出另一个范畴，在思想上构造范畴的体系。他把一切社会存在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把发展过程归结为观念的自我运动。马克思在揭露蒲鲁东经济理论的唯心主义实质时指出，他“把人们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充满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象这些范畴单凭辩证运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页）。马克思指出，社会经济的各种范畴，只不过是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和科学抽象。脱离了社会生产关系，经济范畴就成为空洞的毫无意义的东西。而蒲鲁东对事物的理解是颠倒的，认为现实关系只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里的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蒲鲁东这样主观地运用范畴，是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翻版。

马克思反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及其三段论，但是，他丝毫不怀疑包括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内的辩证发展观。在《哲学的贫困》中，他指出，黑格尔三段论在反映客观现实辩证关系时是正确的方法，而纯粹出于体系需要构成的三段论式则是唯心主义虚构，把它们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改造过来，就形成了科学的辩证方法论。这就清楚地揭示了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形成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的思想的萌芽。他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1页）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在形成过程中的重大发展，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重大突破。马克思正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社会发展所固有的辩证运动的规律性，通过对立双方的共存和斗争，以达到融合成一个新范畴，从而把社

会不断推向前进，这就是客观事物辩证运动的实质所在。同时，马克思研究了矛盾双方的制约性，研究了矛盾双方的不同地位和作用。马克思认为，矛盾双方是又统一又斗争的，"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11页）并且指出，正是这一坏的方面、否定的方面，反对好的方面、肯定的方面的斗争，才促使事物的发展。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蒲鲁东抹杀对立面的斗争，调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二元论。他指出："蒲鲁东先生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完全象一个政治上的空论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做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做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而这些力量的平衡正是表现于其中的各个力量时胜时败的现代运动。""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粹理性范畴放在一边，而把人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以许多形式重复表现出来的二元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29—330页）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科学地阐发和更加明确地论述了他所发现的并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同制定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蒲鲁东认为，历史是永恒理性或普遍理性的自我表现。人不过是永恒理性或普遍理性为了自我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而已。蒲鲁东把分工、竞争、垄断等范畴当作普遍理性。现实的历史不过是社会天才们所发现的范畴的实现。所以，在蒲鲁东看来，"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29页）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历史观时，极其科学地表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由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的变化，生产方式的更替不可避免。“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具有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思想。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辩证法。首先，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生产力”这一科学概念的内容。他指出，生产力不仅包括生产工具，而且包括生产者本身。马克思还深刻地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页）从革命阶级是一种最强大的生产力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来评价革命阶级的社会地位，这就科学地阐明了革命阶级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为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学说提供了有力论据。其次，马克思第一次制定了“生产关系”这一科学概念，已不再使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交往形式”、“交往关系”、“所有制关系”等不确切概念。另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论述基本“所有制形式”等等已经十分接近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依次更替的学说。在《哲学的贫困》中这个学说得到了相当明确的表述。虽然这里还只是使用“社会形式”“生产方式”这些词，而没有“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术语。

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卷，第477页）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社会关系变为人的关系和自然的关系，由于资产阶级关系本身终究也要从地面上消失，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丧钟敲响的日子不可避免也要到来。由此可见，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自然的和历史的过程。至于每一种社会形态，在一定物质条件下都是客观的必然的，它们都是人类向前发展的合乎规律的阶段。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最鲜明地提出了把社会进化看做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根据唯物史观，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家的学说。他指出："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7—158页）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反对工人运动，企图保存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时，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社会现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的阶级对立和斗争，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革命作用，阐明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系列理论和策略。马克思

指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对抗性矛盾的存在是必然的。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它们之间的对抗，就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成为最大的矛盾，将导致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8页）马克思还指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了阶级对立，才能消除社会矛盾的对抗，“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8页）继《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国家随着阶级消灭而消逝的思想”，即国家消亡的思想。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第一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分析了主要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指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因此，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哲学的贫困》也是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正因为《哲学的贫困》进一步发展了《神圣家庭》、《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思想，在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纲领的同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纲领，恩格斯才亲切地把它称之为“我们的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09页）。

## 第三节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胜利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的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正式党纲，写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1848年2月底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比较完整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列宁对《共产党宣言》评价极高，称它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等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列宁全集》第19卷，第2页）一百多年来，《共产党宣言》被翻译成了70多种文字，1000多种版本，在全世界广泛地传播着，成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指南。

《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划时代的纲领性文件。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全部形成过程的基础上，进行艰巨的理论创造的结果，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加无产阶阶革命斗争的实践，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产物。《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光辉结晶。

当时，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主要途径是通过马克思恩格斯改造“正义者同盟”而实现的。“正义者同盟”是1836年由德国流亡者中的革命分子在法国巴黎成立的秘密的国际性工人组织。它在许多国家设有支部。它的大部分成员是工人和手工业者，它的主要领导人有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约瑟夫·莫尔等。“正义者同盟”的纲领和章程有浓厚的空想和密谋性质，它主张以少数英雄人物的起义来推翻反动统治，直接在德国建立“共产主义”。它的口号是超阶级的“人人皆兄弟”。由于其理论和路线是错误的，虽然进行过多次起义，都遭到了失

败。马克思恩格斯当时都没有参加这个组织，他们对“正义者同盟”的错误理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且用通俗的形式帮助“正义者同盟”的成员认识其理论的错误性质及其在实践上的危害，向他们指明，“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465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正义者同盟”逐渐摆脱了秘密的阴谋家团体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克利盖和格律恩的“真正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的改良主义的批判和斗争，深刻地教育了“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和广大成员，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使他们大多数人逐步摆脱了蒲鲁东主义、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以及“真正社会主义”的反动影响，逐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莫尔等先后从伦敦和巴黎写信给马克思恩格斯，表示支持和拥护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内部开展反对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的斗争，而且他们也不再想同魏特林打交道了。恩格斯指出：“所有这些情况都促进了同盟中，特别是伦敦领导者当中不知不觉发生的转变。他们越来越明白，过去的共产主义观点，无论是法国原始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还是魏特林共产主义，都是不够的。……过去的理论观念的毫无根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上的错误，愈来愈使伦敦的盟员相信马克思和我的新理论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50页）

1847年1月21日，“正义者同盟”伦敦总部派出全权代表约·莫尔前往布鲁塞尔和巴黎去会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式邀请他们参加“正义者同盟”，并且授权让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同盟的组织工作。同盟正式声明：确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同意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作为同盟的指导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我们以前认为是同盟的缺点的地方，现在同盟代表们自己承认，并且已经消除；甚至还邀请我们参加改组工作。我们能拒绝吗？当然不能。于是我们加入了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51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赞同和支持下，"正义者同盟"于1847年2月发出了"实行全面改组同盟"的文告。1847年6月2—8日，"正义者同盟"在英国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恩格斯和沃尔弗代表马克思参加了代表大会。大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提议，按照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对同盟进行了彻底的改组。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口号，代替了"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开除魏特林分子出盟。代表大会还决定由恩格斯和沃尔弗起草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这个章程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审查通过。章程明确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51页）这样，共产主义者同盟便真正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

1847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组织了德国工人协会等革命团体，作过《雇佣劳动与资本》、《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问题》、《波兰问题》等讲演。马克思通过这些讲演在工人群众中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帮助工人群众与同盟领导人注意研究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又把《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改变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利用它来进行共产主义宣传。9月间，马克思恩格斯又组织国际民主协会。通过这些公开的、群众性的组织教育工人群众和知识分子，把其中最先进、最积极的分子吸引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中来。

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1847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领导人沙佩尔等人提出了一个具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共产主义问答》的纲领草案。真正社会主义者赫斯提出了一个“修正草案”。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郊区支部委员会上批判了这个纲领草案。这就是以问答形式写成的《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1月23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出抛弃问答方式，把《共产主义原理》改为《共产党宣言》。1847年11月29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亲自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会上，马克思恩格斯阐述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大会经过十来天的热烈辩论，接受了马克思提出的新原则，并且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宣言，这个宣言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正如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的，“《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32页）《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它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摆脱了旧的传统观念，诞生了自己成熟的世界观。

列宁指出，《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使命的理论。”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78页）这段话精辟而深刻地阐明了《共产党宣言》的理论意义，特别是哲学意义。

《共产党宣言》以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有的哲学家们在自然观方面也能够达到唯物主义。但是，他们的唯物主义不能贯彻到底，尤其一涉足到社会生活领域，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马克思恩格斯在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中，在批判德国唯心主义思辨哲学过程中，认识到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以及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他们第一次发现了在社会生活领域和自然界一样，也存在着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了生产关系这一科学概念，并在一切社会关系中，区分出生产关系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把每一时代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看作这一时代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去解释社会生活现象，用社会的物质关系去说明社会的思想关系，从而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

从彻底的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恩格斯用物质的原因，即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说明了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共产党宣言》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2页）《共产党宣言》还指出，随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也发展起来，一方面，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日益革命化。

从彻底的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在评价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流派的时候，总是从它们同生产发展的关系，从它们同阶级的关系来衡量它们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作用。如果它们符合生产发展的需要，符合先进阶级的利益和要求，那么它们就起历

史进步作用，推动社会发展；反之，它们就起历史的反动作用，阻碍社会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封建社会主义是在法国1830年7月革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中被打败的封建贵族的理论表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明显的旧的封建纹章。这种社会主义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从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立场去反对资产阶级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因此，也是反动的。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为了资产阶级利益去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同样是反动的。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映了早期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乃是无产阶级还不够发展、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样一种历史条件的产物。

从彻底的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指出，资产阶级观念本身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资产阶级的法律不过是资产阶级意志的表现；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了资产阶级意志的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共产党人的理论原则，决不是以改革家发明或发现的思想为根据的，而是以现存的阶级斗争，以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为根据的。恩格斯曾经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通过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唯心主义错误，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特点。他说："海因岑先生以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以此进一步做出结论的学说。海因岑先生大错特错了。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1—312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驳斥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般意

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各种责难时指出，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1页）他们认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社会制度虽然变化了，但是，有些意识形态却保存了下来，仿佛独立存在似的。这是由于过去历史上各个世代都建立在私有制、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基础上的形式上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态，都是维护少数剥削阶级利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种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灭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然而“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1、271—272页）

从彻底的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们指出，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建立和扩大，以及大工业的兴起，结果，“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能再同已经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应了。这种关系已经不是促进生产而是阻碍生产了。它们已经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们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和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即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1页）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现在，在我们眼前又发生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用来推翻了封建制度的那个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

了。”（同上书，第471、472页）资产阶级所有制也反过来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了。“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同时它还造就了将运用这个武器来反对它自己的人——现代工人、即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2页）因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共产党宣言》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辩证法这一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社会现象，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性。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在封建社会内部通过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变革基础上同时产生的。随着封建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资产阶级日益强大，引起资产阶级革命，封建主义制度就被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因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决不是什么永恒真理的体现，而是现实世界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思想政治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反作用。他们指出，共产党人必须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敌对对立，必须到处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他们还阐明了反映现实的理论和学说本身发展的辩证性质。他们指出，反映早期无产阶级要求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在其产生之初，有革命意义，起过进步作用，但是，由于矛盾斗争向前发展了，旧的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因此，它们就越来越成为反动的了。这种理论意义的转变，乃是客观的社会历史发展的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全面地、发展地、辩证地考察社会现象，

反对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他们既看到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又看到它们的衰落和灭亡；既看到它们在上升时期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又看到它们在衰落时期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破坏作用；既看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揭露得非常深刻，又看到了它维护陈腐的旧的生产关系的反动性；既看到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一面，又看到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

《共产党宣言》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分析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第一次对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作了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他们明确指出，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0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回顾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各个社会中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情况时，揭示了阶级斗争的根源以及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他们指出，在过去的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的内部又有各种特殊的等级。在古罗马的奴隶社会中，有贵族、骑士、平民和奴隶；在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中，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和农奴。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阶级对立和阶级结构为森严、繁多的等级制形式所掩盖。但是，奴隶和奴隶主、农奴和领主之间的斗争，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斗争，农民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隐蔽的。一般说来，它们经历了一个从隐蔽到公开的发展过程。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与阶级之间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历史，就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对压迫剥削阶级的斗争从隐蔽到公开的历史，也就是被剥削被压迫阶级为争取生存权利和夺取政权

而斗争的历史。这就深刻地揭示了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性。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是社会日益分裂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对立的阶级，因此比起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来，阶级对立简单化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在封建社会里，封建地主占有生产资料即土地，而农民没有或只有很少量的土地和农具。封建地主采用地租的形式对农民进行剥削，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抗租、逃跑、起义等是农民和封建地主斗争的主要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工人一无所有，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罢工、游行、示威、组织工会和政党、武装斗争等是工人反对资本家斗争时采取的主要形式。他们还指出，阶级斗争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阶级社会里的必然表现，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奴隶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推动了奴隶社会的发展和灭亡；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灭亡；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灭亡。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阶级斗争的结果总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则根本不同，它不仅要推翻旧的剥削制度，而且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创立一个崭新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说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3页）。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也是彻底

的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共产党宣言》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历史使命的学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叙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前发表的其它著作比较，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方面的阐述，达到了一个完全成熟的新高度。在这里，德国古典哲学、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没有了，“交往方式”等一些不确切的术语没有了，完全应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马克思恩格斯非常紧密地联系大工业的发展来阐明无产阶级的发展前景，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兴起和资产阶级的灭亡、共产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失败同样都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页）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决定了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定性，它负有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伟大历史使命。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第一步就是要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彻底消灭私有制，彻底改变传统观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宣言》提出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著名论断。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各种斗争，都要以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即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忘记了这一点，无产阶级求解放的斗争就是一句空话。《共产党宣言》提出了“无产阶级使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即关于用无产阶级专政去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这一伟大号召。在这里，马克思虽然还没有

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但是，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统治（专政），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思想是十分清楚的。列宁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共产党宣言》，已对这个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7页）

当《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资本主义还处在上升时期，资产阶级还统治着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们正在竭力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总结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敲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钟，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

# 第十章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哲学领域中的伟大革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崭新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不是哲学长期发展过程中的简单延续，而是它的根本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领域中实现了一次真正的伟大革命。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8—279页）。这一伟大的革命变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这一伟大的革命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公开申明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哲学领域中伟大革命的一个主要标志。

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中，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无不带有阶级的烙印。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它总是隶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其服务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一般说来，都是反映少数剥削阶级利益的剥削阶级哲学。但是，剥削阶级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属于少数。他们的利益是和多数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对立的。这就决定了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们不敢公开承认他们的哲学的剥削阶级性质。资产阶级当着它还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时候，为了动员广大群众，使之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反对封建主义，他们就把自己的哲学打扮成超阶级、超党派的。现代

资产阶级哲学为了蒙蔽劳动群众，更是突出地宣传哲学的超阶级性、超党派性。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无党性不过是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统治者的政党、剥削者的政党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列宁全集》第10卷，第58页）所谓"无党性"、"超阶级性"，正是资产阶级反动哲学的党性、阶级性的表现，是资产阶级利益所要求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们不敢声明自己哲学的阶级本质，才不得不打起纯学术、客观主义的幌子，来欺骗广大群众，掩盖其反动本质。如果他们公开声明自己哲学的阶级本质，那就等于唤醒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肉体的和精神的奴役，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一切旧哲学，尽管它们无不代表着一定阶级的利益，与之血肉相联，却没有不是以超阶级的面目出现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根本不同，她公开申明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公然申明自己的阶级性和党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1页）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要公开申明自己的阶级性和党性，就是因为它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担负着在思想上武装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并使他们从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即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他们的思想家们无需掩饰自己哲学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坚决反对并揭露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宣扬的所谓"纯科学的哲学"、"无党性"和"客观主义"的滥调。指出，"客观主义"、"无党性"和"纯科学的哲学"，都不过是掩饰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哲学的阶级性的一种虚伪形

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结束了以往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独霸哲学领域的时代，使社会的真正主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了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哲学。不仅如此，她的创立，同时也无情地揭下了以往旧哲学尤其是资产阶级哲学自我粉饰的“超阶级”的标签，使哲学的阶级性昭然于世，并且公然申明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哲学，把自身和无产阶级紧密联系起来。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的确不是哲学史发展的一种简单延续，而是一个划时代的根本变革。

第二，高度的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哲学领域伟大革命的另一主要标志。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都是不科学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们都有一种狂妄的企图——想把一切具体科学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到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内，把自己的哲学说成是凌驾于一切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他们都标榜自己的哲学是包罗一切的绝对真理的体系。黑格尔是这样，费尔巴哈也是这样。这些“科学的科学”实际上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没有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把其它科学研究的对象，统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没有如实地反映世界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用主观想象的联系代替客观现实的联系；它没有正确处理哲学和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而把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说成是全体和部分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以后，这种作为“科学的科学”的旧哲学终结了，在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唯一科学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所研究的是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问世以后，哲学不再是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不再是没有自己专门研究对象的空洞的学问了。研究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具体规律的任务不再由哲

学所包揽，而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去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给各门具体科学以指导，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就和新材料又不断地证实、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地解决了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的关系，不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它都用事物之间的本来联系，去代替过去哲学家的头脑中幻想出来的联系，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从此，哲学的发展就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旧哲学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分离的。古代具有朴素辩证法性质的自发唯物主义，由于没有实验科学做根据，只是单凭笼统的直观猜测，因而没有真正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它在描述现象的总体时，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似乎浑然一体地统一在一起。但是，一旦对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就结合不起来了。在近代的资产阶级哲学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始终处于分离状态。近代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如费尔巴哈和十七、十八世纪英法唯物主义）。近代资产阶级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如黑格尔的辩证法）。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种分离状态，不仅使旧唯物主义具有片面性，而且使它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特别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不能不陷入唯心主义。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也总是不能把辩证法坚持到底，并且最终陷入形而上学。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吸取了过去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一切积极成果，尤其是吸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机械性和不彻底性，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消除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长期分离状态，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唯物主义发展到辩证唯物主义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历史观，虽然也包含有某些合理的因

素，但是，总的说来都是唯心主义的。列宁指出，“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86页）马克思恩格斯则不然，他们第一次把唯物主义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8页），不仅运用于自然界，而且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使“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43页）这样，就把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避难所里驱逐出去，使人们有可能形成对社会历史现象的科学认识。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一个崭新的科学的哲学体系。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哲学领域内的伟大革命时指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里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3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高度的科学性而区别于一切旧哲学，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一方面同样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的确不是哲学史发展的简单延续，而是一个划时代的根本变革。但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旧哲学中尖锐对立着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却能和谐地统一起来呢？这是由旧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各自所反映的那个阶级的利益和

要求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之间适应或违背的不同情况所决定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们，在观察和研究各种问题（尤其是社会问题）时，常常因为他们的阶级偏见而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同时，为了维护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又常常不能如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甚至有意地歪曲和颠倒事实。当然，当着剥削阶级处于上升时期，还是一个革命的阶级的时候，他们是会在一定程度上追求科学、追求真理的。但是，随着他们由进步转向保守以至成为反动以后，他们的阶级利益便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严重地相背离了，他们愈是感到自身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就愈是拚命设法维持自身的存在，也就愈来愈对科学不感兴趣，愈来愈不加掩饰地用谎言和欺骗代替真理。这样，在他们的哲学中，出现阶级性排斥科学性的情况就是必然的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是一个彻底革命的阶级，它要求根本改造旧社会，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就需要不加任何歪曲地、如实地认识世界，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不但与科学性没有矛盾，而且完全一致。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高度的科学性正是它的阶级利益所要求的。因为只有这样的哲学，才能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恩格斯说得好，“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4页）

第三，强调实践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哲学领域伟大革命的又一主要标志。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本质上都是脱离实践的。他们的哲学体系的中心和基础，不是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活动，而主要是精神活动。唯心主义哲学是如此，旧唯物主义也同样不了解实践活动的意义。例如，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是战斗的唯物主

义，曾经对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起过重大促进作用。但是，他们的哲学学说也仅仅停留在对于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理性的批判上面，他们不敢也没有提出改造世界的任务。他们把资本主义的原则，说成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他们不仅不敢承认、而且害怕提到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劳动群众对社会制度的改造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前的进步哲学包括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哲学学说中，虽然从理论上论证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显露了使哲学为解放运动服务，进行社会改造的倾向。但是，他们终因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束缚，未能发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不出改造世界的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丰富实践经验基础上，明确地提出，哲学的任务不只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在于改变世界。他们第一次把社会实践纳入认识论，把实践作为认识论的基础，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应当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为实践服务。这样就消除了旧哲学与社会实践相脱离相对立的状况，要求哲学家对世界进行解释的同时，创造出改造世界的理论，在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使哲学成为自觉地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理论武器。从这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的确不是哲学史发展的简单延续，而是一个划时代的根本变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科学性和实践性三者是有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按照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三个主要特点的排列次序，应当是阶级性、科学性和实践性。从历史上和逻辑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的前提。没有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出现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必须先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然后才能谈得上它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的基础。无产阶级

的革命斗争只有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才能取得胜利。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科学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有机统一。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列宁选集》第一卷，第81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实现了哲学领域里的伟大革命。但是，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2页）。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继续同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斗争，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不断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它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指导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发展。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经验，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她提高到列宁主义阶段。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捍卫和发展方面，也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在反对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潮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斗

争中，概括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就，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2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将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不断进步而向前发展，永无止境。